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6

一九六四年

“綜合經濟基础論”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	孙 孺 (1)
評杨献珍同志所謂“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观点	严克柔 (10)
就紅专关系駁“合二而一”論	王致远 (18)
“合二而一”論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哲学	刘 嶸 齐 云 (26)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根本道路	李又华 (31)
——讀《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的筆記	
半工(农)半讀应当成为我国一种根本的教育制度	刘美藩 (37)
生产价格与社会主义經濟不相容	何宇同 高天放 (44)
——与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商榷	
論稳产高产农田建設問題	廖建祥 (52)
略論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的起源及其在 馬克思价值理論体系中的地位	萧步才 (61)
刘节先生的历史研究是为誰服务的?	杜式文 (68)
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歪曲?	张其光 (78)
——評刘节先生的所謂“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及精义”	
历史唯心主义的又一次破产	史集思 (83)
——試論罗尔綱等同志研究和評價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	
資产阶级美学观点的艺术标本	萧 殷 蓝 宜 (96)
——《北国江南》的思想实质和美学理想解剖	
《指物論》譯释与批判	林振环 (106)

动

广东史学界討論关于評價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 (67)

态

广东經濟学界就生产价格論問題举行討論会 (114)

“綜合經濟基础論”是 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

孙 孺

—

杨献珍同志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路綫、方針、政策，由来已久。他长期以来，一貫頑固地、有意識地企图用他的反动的資产階級世界观来反对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每当我国革命和階級斗争进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的时刻，他都根据他的腐朽的資产階級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提出一套哲学“理論”，充当資产階級的代言人，同党唱对台戏，站在資产階級的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站在資本主义那一边，反对社会主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規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时杨献珍同志就开始不断宣扬他的“綜合經濟基础論”的观点，到一九五五年就写成了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問題》的文章（未发表，本文引用他的論点均見《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的材料），代表反动的資本主义势力起来叫喊，坚持在我国保存資本主义經濟，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

杨献珍同志提出的“綜合經濟基础論”，是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論的思想体系在階級斗争的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具体运用。我們知道，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期間，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也是階級斗争很激烈的时期，是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綫的指引下，进行着将我国社会当时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資本主义經濟和个体經濟的复杂的經濟結構，改造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經濟結構的革命时期。当时，在我国社会上存在的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势力，他們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資本主义，或者企图把革命停頓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資本主义經濟的現狀，企图使“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长期共存”。归根到底，是要求建立資本主义社会，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杨献珍同志的“綜合經濟基础論”，正是适应这种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反动“理論”。

杨献珍同志的“綜合經濟基础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归結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他认为,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在“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基础’上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农民经济的“综合性”的基础。他还断言:“否认过渡时期的‘基础’的综合性,是没有根据的。”

(二)他认为,应当“把国民经济的各部门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要求各种经济成分(如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之间,“能够平衡地相互衔接地发展”。他还硬歪曲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依据他的这个原则制定的。

(三)他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上层建筑是管整个社会‘基础’的”,“不是为某一单一的经济成分服务,而是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他批评不同意他这种意见的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个思想上层建筑的作用限于极其狭小的范围”。在这里,他把自己的思想,装扮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以上,就是杨献珍同志根据他的“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对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在这里,经济基础是一个“综合”体,上层建筑也只有一个,其中没有对立的斗争,没有矛盾。这种“理论”的政治目的,是要求资本主义长期保存,而且还要和社会主义经济一道“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则要为资本主义长期存在和发展服务。

我们用唯物辩证法,即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观点来考察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基本完成这一个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得出的是和杨献珍同志完全不同的结论。下面分别论述。

二

一般地说,任何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都会遇到存在着社会经济的几种基本形式的情况,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我国建立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初期,社会经济也同样存在这三种基本形式。由于我国革命的特点,还存在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成分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这些是客观的存在。问题是我們怎样看待这五种经济成分?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我国无产阶级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陆续解放了的城市中,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的资产而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它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我国无产阶级就牢牢地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了我国工业资产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我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力量和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还在农村中建立了劳动人民

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两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及由于它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就决定着它将不断增长和壮大。

此外，还有正在从个体经济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中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正在由资本主义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中的公私合营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们的比重当时还不小，但都已含有社会主义性质，它们的趋向是发展和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

（二）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我国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剥夺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允许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这样，我国在过渡时期初期，就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但是由于我们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它的趋向将是逐步消亡。

（三）经过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并把它分给农民，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关系，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使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此外，还存在着在工业中占相当比重的手工业经济。这些经济仍然是分散落后的私有制的个体经济。所以在我国过渡时期初期，还存在着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重很大的个体经济。我们怎样看待这种个体的小商品经济呢？《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了个体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并说：“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里指出了：对于个体经济，无产阶级如果不把它引向社会主义，它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列宁在分析苏联过渡时期初期的经济成分时也指出：这种个体的小商品经济，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又说：“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这是在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中保留和复活起来。”^①所以，归根到底，个体经济如果不改变或还未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它就还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自己的阶级专政，引导个体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个体经济的趋向，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也是逐步衰亡的。

从上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可以认为，我国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期中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或四种所有制，最基本的还是三种经济形式，即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它们后面，站着三种基本力量，即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它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同时，又还存在它的对立物，即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它们组成矛盾的对立面，彼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30卷，第89页。

此之間進行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勝誰負的鬥爭。這種矛盾的階級表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個體經濟是處在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有兩種發展可能，要嗎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把它爭奪過來，引導向社會主義道路，使廣大農民階級成為自己的同盟軍。要嗎是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使個體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使農民成為資產階級的附庸。所以，實際上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兩條道路的鬥爭中爭奪農民的問題。歸根到底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鬥爭。

我們黨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就曾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國內存在的基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我們知道，列寧在分析蘇聯過渡時期存在的經濟成分時，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徵。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① 列寧這一理論分析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個時期我國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一分為二的，既有成為主導力量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也有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它們是對立的統一，彼此互相對立，互相鬥爭。無產階級正是通過自己的階級專政，採取正確的政策和步驟，逐步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擴大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使它成為我國社會唯一的經濟基礎。我們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一條革命的總路線，是消滅資本主義的總路線。而資產階級則用反限制、反改造的方法，企圖保存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這就不能不引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

由此可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這個時期的經濟基礎所得出的結論，決不是楊獻珍同志所說的，是五種經濟成分匯合的“綜合經濟基礎”，它們之間不存在相互鬥爭，沒有一方戰勝一方地長期共存。

楊獻珍同志的“綜合經濟基礎論”，正是抹煞了這個時期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的重要實質，抹煞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任務。他“一視同仁”地把五種經濟成分都看作構成我國過渡時期的一個統一的經濟基礎的各個部分，力圖調和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調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否定了階級鬥爭的存在。正如列寧當時所批判的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一樣，他們“每次談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候，總是把這個不言自明的真理完全置諸腦後”，他們“根本就厭惡階級鬥爭，幻想逃避這種鬥爭，力圖緩和、調和和鈍化這種鬥爭”。所以他們“或者根本不承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或者認為自己的任務是設法把相互鬥爭的兩種力量調和起來，而不是領導其中一種力量進行鬥爭”^②。楊獻珍同志正是

①② 分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87、88頁。

由于根本厌恶阶级斗争、幻想逃避阶级斗争，而宣扬这种阶级调和论，成了当时“新民主主义万岁”论者的代言人，来和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相对抗，企图在中国保存资本主义。一句话，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所以，它的本质是反动的。

三

杨献珍同志从他的阶级调和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引导出他的经济发展“平衡论”。他要求我国在过渡时期，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必须“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只不过是布哈林的幽灵在杨献珍同志躯体中还魂，散发出早已进了坟墓的“均衡论”的臭气而已。

杨献珍同志公然歪曲我党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原则。他说：“党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依据的原则，就是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要求……各种经济成分之间，……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事实果真是这样吗？不！这是杨献珍同志的捏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当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这个计划草案的决议，“认为这个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绪言》中明确提出首先要“保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同时还指出：“我国现在还有着下列的事实：第一，小农经济在农业经济中还占有绝对的优势。这种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相矛盾的，必须逐步地以合作化的农业代替分散的个体的小农业。同时，个体手工业在城市和乡村中都有很大的数量，必须逐步地把它引向合作化的道路。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暴露出它同生产力的增长相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是相对立的，必须逐步地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的所有制。因此，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①我们看，这个正式写在文件上的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依据的原则，和杨献珍同志说的各种经济成分“平衡地相互衔接地发展”的“原则”，那有一点共同之处？当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各种经济成分，要作统筹兼顾的安排，但是，它必须服从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个体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服从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结果也证明，由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已打下了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工业和农业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绝不是各种经济成分平衡地发展，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通过党的赎买政策，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个体的小农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版，第15页。

济和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结果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大大地巩固和扩大，基本上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已经基本上被改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粉碎了杨献珍同志的“平衡论”。

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的经济发展“平衡论”的要求，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包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厚的基础的个体经济）“合二而一”，“求同存异”，平衡发展，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第一，我们知道，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是以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目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目的。社会主义生产要求整个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以无政府的盲目活动作为它的经营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在这些根本的方面和社会主义经济相对立，障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将促使小商品生产不断地自发成为资本主义，从而障碍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次，就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来说，它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严重地障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的“平衡”论，让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则所有上述矛盾就会日益尖锐起来。其结果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得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不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障碍，从而不能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这方面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工人阶级要长期受着剥削，这样我们党就要脱离工人阶级，农民也将为资产阶级争夺过去。这样，实际上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共同发展，而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遭受失败，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杨献珍同志的经济发展“平衡论”，实际上是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反动理论。

第二，在这个时期中，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农业也存在着矛盾。首先，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和落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其次，个体农民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相适应的。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让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平衡地发展，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长期建筑在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这两个不同的基础上？绝对不能！正如斯大林曾经说过的：“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①同时，如果不把小农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小农经济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129页。

的自发趋向就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如《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宣传提纲中所指出的那样：“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有的人因天灾人祸而穷困破产，有的人却利用做投机买卖、放债、雇工的办法来剥削穷人；如果不对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成为富农剥削者，而多数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①这样，无产阶级就会失去农民这个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失去了巩固的基础。这些情况，都只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所以，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的原则，其实质也是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杨献珍同志口头上也说什么“要逐渐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缩小资本主义成分，变我国复合经济为单一的经济形态”，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幌子，他的各种经济成分平衡发展的“理论”，实质上是要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合二而一”，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

四

杨献珍同志从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出发，还歪曲了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他说：

“……上层建筑不是为某一单一的经济成分服务，而是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的。”

“我们的上层建筑是管整个社会‘基础’的，不是仅管现存‘基础’中的某一种生产关系，例如说仅管社会主义关系的。”

什么是“我们的上层建筑”呢？杨献珍同志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杨献珍同志显然是以否认我国过渡时期既存在着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又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这一观点为前提的。而事实上，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是不能抹煞的。杨献珍同志抹煞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客观存在，不管他是企图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装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让它合法化，还是企图否定客观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都是他的“合二而一”的观点的具体表现。而要求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各种经济成分服务，则更是荒谬的，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每一个基础都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必然为它所由以产生的基础服务。所以，上层建筑是基础的反映，但它又反过来为基础服务，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有一段话是很正确的，他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②

①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篇），人民出版社版，第358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我国过渡时期初期的情况是怎样呢？在那时期，我国工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形成了在全国占统治地位的为这个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在我国过渡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但是，既然我国当时还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互相对立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必然还有它所反映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同志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①这种旧的意识形态，要比它的基础更长期地残存下来。因此，我们对于上层建筑的观点也是一分为二的，认为我国在过渡时期初期，既有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存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互相对立、互相斗争。这里还须说明的是我国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今天虽然有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不能成为指导我们政权的思想的一部分。我们的政权，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所以，我国过渡时期初期的上层建筑，决不是由各种生产关系的综合经济基础所产生的综合（或叫复合）的上层建筑，也不能是只有一种上层建筑，而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与它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对立的统一。同时，也决没有一个可以同时为各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了自己的上层建筑，它就反过来对自己的基础起积极的作用，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而斗争，推动自己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我国在过渡时期初期，正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动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改造，在全社会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这之后，还须继续推动自己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②所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这方面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决不是替各种经济基础服务，如果说，我们的上层建筑要“管”各种经济成分，也正是表现在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决不是为了使它们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平衡发展，使它们永久千秋。同时，还须指出：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而存在于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资本主义思想，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就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表现于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的存在，也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也是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正是在这种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

^{①②} 分别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9、12页。

同志指出：“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①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之后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②我国解放以来所进行的历次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运动，不断地“兴无灭资”，都是这种斗争的表现。这种斗争也是过渡时期正在生长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正在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生死斗争的反映。这种斗争，就是在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也还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存在。毛泽东同志早就教导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③最近在思想战线上展开的大争论，包括同杨献珍同志在哲学问题上的这场大争论，都是两个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表现。

杨献珍同志认为我国过渡时期只有一种上层建筑，抹煞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事实，抹煞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互对抗着的矛盾，这就勾销了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所以是极端错误的和荒谬的。我们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要去占领，真空地带是没有的。两种对立着的意识形态和平共存是不容许的。杨献珍同志否认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还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同样也是幻想逃避阶级斗争，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打掩护，实际上也是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一方面的表现。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观点，是他的“合二而一”思想在当时的表现形式。他的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合二而一”思想是一贯的。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不但在理论上，而且早已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实践彻底粉碎而破产了，但是杨献珍同志这种反动的世界观的“阴魂不散”，在有机会时总企图“借尸还魂”，在近几年来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化的条件下，他的思想也就发展成为更完整更系统的“合二而一”论，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挑起目前这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这正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①②③ 分别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6、26—27、27页。

評楊獻珍同志所謂 “兩種範疇的同一性”的觀點

嚴克柔

楊獻珍同志一貫堅持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反對革命的唯物辯證法，有意識、有目的地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攻。十多年來，他先後挑起了三場哲學戰綫上的論戰，即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問題的論戰、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論戰和關於“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戰。哲學戰綫上的鬥爭，總是經濟戰綫和政治戰綫上的階級鬥爭的反映。楊獻珍同志在這幾場大論戰中，都是適應階級敵人的需要，給他們提供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武器。他的“同一性”的觀點，就是這樣的“理論”武器之一。

(一)

楊獻珍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寫了一篇題為《略論兩種範疇的同一性——唯心主義範疇的同一性和辯證法範疇的同一性》（未發表）。他在文章中說：

“唯心主義的同一性，即‘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和辯證法的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乃是兩種範疇。”

“……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當作唯物主義的命題來理解……，……把它當作思維與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根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來提……。這是完全錯誤的。”

“思維能夠和存在一致、符合，但思維與存在畢竟不是‘同一’。”^①

“恩格斯在闡述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根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的时候，明明指出思維與存在是對立的，列寧還說，在決定什麼是第一性，什麼是第二性的範疇內，這種對立還是絕對的。可是，按照上述幾位作者們的理解，恩格斯在跟着闡述這個哲學根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又說思維與存在不是對立的，而是同一的。難道恩格斯在闡述哲學根本問題上竟這樣輕率隨意，連起碼的形式邏輯也沒有了嗎？”^②

楊獻珍同志的觀點，歸納起來就是：第一，對立的东西不能是同一的，同一的东西也就不能是對立的。思維和存在不是一個東西，是對立的，而且是絕對對立的，因此，思維和存在不能是同一的。第二，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義的範疇，承認思維和存

① 轉引自成玉慶、王一丹、孫延齡：《楊獻珍同志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係也是“合二而一”的》。載《光明日報》1964年11月27日。

② 轉引自周景方：《堅持什麼同一性？反對什麼同一性？》。載《光明日報》1964年11月6日。

在的同一性，就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是不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的。要吗就是矛盾的同一性，要吗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两个根本对立的范畴。第三，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里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里反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怎么恩格斯反而这样轻率随意地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呢？他认为经典作家只能肯定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而不能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杨献珍同志杜撰出来的两种范畴的同一性，是违反哲学的一般常识的。谁都知道，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一对矛盾，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一对矛盾。说到同一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只是指出有辩证法的同一性和形而上学的同一性的对立，而没有象杨献珍同志所杜撰的所谓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的对立。同样，在哲学上也有两种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种是思维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思维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用形而上学作解释的。但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是用辩证法去解释，就是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解释为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这两种对立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杨献珍同志拚命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要你一谈到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时，他就给你戴上一个唯心主义的帽子。在他看来，唯物辩证法的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同一性是不能应用于思维和存在这对哲学上的最高范畴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呢？这是因为杨献珍同志心目中的同一性和我们所理解的辩证法的同一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杨献珍同志看来，所谓同一性，就是在对立双方找出一个共同的东西来。他认为思维和存在是绝对对立的，找不到任何共同之点，因而不可能有同一性。这就是说，对立中没有同一，同一中没有对立，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观点吗？这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呢？毛泽东同志说：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①

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②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卷，第315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8卷，第111页。

非常清楚，唯物辯證法的同一性，就是指的互相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着，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而又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轉化。我們不应把对立面看做是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看做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暫时的、相对的东西。这 and 楊献珍同志說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同的。虽然楊献珍同志照抄了列宁的这段話开头的一句，但是却歪曲、篡改了列宁这段話的内容，把自己的錯誤观点硬續在列宁这句话的后面。楊献珍同志还說：“根本对立根本排斥的东西就沒有同一性”。根据这个观点，不仅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就是任何矛盾的双方都談不上有什么同一性了。因为任何矛盾的双方都是根本对立，根本排斥的，沒有任何調和的余地的。楊献珍同志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它宣传的同一性是排斥矛盾、調和矛盾、否认轉化、反对革命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

在楊献珍同志看来，既然存在是第一性，思維是第二性，它們是根本对立、根本排斥的，如果承认了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意味着不仅要承认思維依賴于存在，沒有存在就沒有思維，而且还要承认存在依賴于思維，沒有思維也沒有存在。这样，就不能和“原則同格”論划清界綫。他沒有看到思維和存在的复杂的联系，沒有看到虽然一般地說存在是不依賴于思維的，但是存在之作为实践上被認識、被改造的对象，是以有意識的人的出現为条件的，打上了人的智慧和意志的印記的那个“第二自然”，离开了人的有目的活动是不能被說明的。因此，怎能說思維和存在这对矛盾沒有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关系呢？

在楊献珍同志看来，思維是思維，存在是存在，是不能互相轉化的。他只承认“思維与存在相一致”，而否认思維和存在的互相轉化。楊献珍同志的所謂“思維能够和存在一致、符合”，就是形而上学地承认思維和存在絕對同一，只承认思維反映存在，主观符合客观，而否认思維反作用于存在，否认主观反作用于客观。即是否认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論，否认精神可以变为物质。也就是否认我們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須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的辯證唯物主义的原則。

至于讲到在哲学史上为什么恩格斯在《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中肯定了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而列宁又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反对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涉及到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历史問題。修正主义的哲学总是跟着資產階級的哲学教授走的。馬克思死后，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修正主义已經露头，它的中心是在德国，是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那时，資產階級的哲学是以康德的不可知論为主流的，因而德国的修正主义就跟着康德跑，宣传康德的不可知論。他們說：现实是不可知的，一切理論都是虛構的，和现实沒有关系的，因而馬克思主义也是虛構的。他們拿这种理論来反对馬克思主义。恩格斯为了反駁他們，在理論上粉碎康德主义，維護馬克思主义，因而在《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中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論，从而肯定了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恩格斯肯定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当然是用辯證法去解釋的，就是在承认存在第一性、思維第二性的前提下，肯定思維可

以反映存在，而且思維会对存在起反作用。恩格斯的論点当然是正确的，完全符合邏輯的。到了一九〇五年俄国出现了第一次革命高潮之后，形势改变了，革命的中心移到了俄国，俄国的修正主义是以孟什維克为代表的，其哲学思想是跟着奥国的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馬赫跑。修正主义大力宣传馬赫主义，宣传馬赫的“原則同格”論，也就是思維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思維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他們拿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反对辯証唯物主义。列宁为了批判馬赫主义，維護馬克思主义，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了馬赫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当然，列宁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因为恩格斯肯定的是唯物辯証法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而列宁批判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两种同一性是不能混淆的。杨献珍同志不是用辯証法的历史的观点，而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观察問題。这就在事实上，既反对了恩格斯，又反对了列宁。

由此看来，不論在哲学史上，还是在实际斗争中都存在着两种同一性的对立，一种是唯物辯証法的矛盾同一性，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这两种对立的同一性和杨献珍同志提出的两种范畴的同一性——所謂“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辯証法范畴的同一性”是沒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杨献珍同志主张的同一性是为反动的統治阶级服务的反对革命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唯物辯証法的同一性。因此，我們必須和杨献珍同志相反，坚持唯物辯証法的同一性，反对形而上学的同一性。

(二)

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維和存在有辯証法的同一性，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論。这也就是反对把“一分为二”的辯証法应用到思維和存在的关系上去，而他則是用形而上学作为反对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武器的。因此，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論战，实质上是革命的辯証法与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的論战。我們承认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坚持認識过程中“一分为二”的辯証法，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坚持他的思維和存在的“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我們承认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是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辯証法去分析它們两者的关系的。我們认为，思維和存在的关系是对立統一的关系，它們既是对立的又是統一的。我們既反对思維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的“等同論”的思想，也反对思維和存在各不相干的“二元論”的思想。而杨献珍同志虽然故作姿态地反对思維和存在的“等同論”，事实上是反对思維和存在的辯証关系的。因为他把思維和存在的矛盾作为絕對的对立，絕對不能同一的，这就把二者看作是两个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实体，借口說思維和存在不是一个东西，就否认它們受唯物辯証法的对立統一規律的支配。这就使他自己滾到二元論的泥坑里去。

杨献珍同志否认了思維和存在的对立統一关系，也就否认了根据这对范畴而产生的

一系列的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例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理论与实践，观点与材料，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经济，虚与实，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等等。这些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都被一笔抹煞了。既然把它们看做是互不联系的，也就根本排斥它们内部的矛盾斗争了。这就从另一个极端宣扬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也好，反对思维和存在的矛盾的同一性也好，都是从根本上反对了矛盾普遍性，反对了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同志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① 杨献珍同志正是针锋相对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承认思维和存在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说，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这种转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也就是“一分为二”的过程。我们认为从物质变为精神，也就是思维反映存在，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人们在实践中，最初引起的只是感觉和印象，而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有矛盾的，我们不能把现象当作本质，必须“一分为二”，看作是有差别的东西，但是，从现象到本质，即把感性认识变为理性认识，还要有一个“一分为二”的过程。即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在这里，要把感性材料分为两个部分，把重要的材料留下来，把不重要的材料去掉，把真实的材料留下来，把虚伪的材料去掉。同时又把它的联系分为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抓住它的内部联系，抓到事物的主要矛盾，同时，又把这个主要矛盾一分为二，分为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这样，就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把人的经验总结起来，上升为理论了，这不是十分明显的“一分为二”的辩证过程吗？但是杨献珍同志反对认识是一个辩证过程，即是“一分为二”的过程。

杨献珍同志不仅否认物质变精神的辩证过程，而且也否认精神变物质的辩证过程。认识世界，就是物质变精神，改造世界，就是精神变物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比认识世界更为重要。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 又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③ 为什么要更加重视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即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不仅是因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且是因为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才能检验我们的理性认识是否正确。在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中，又必须运用“一分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②③ 分别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卷，第280—281、281页。

为二”的方法，就是把理性認識拿到革命实践中去检验，凡是工作有成績的，一般地証明人的認識比較正确，凡是工作有缺点的，一般地証明人的認識是不够正确的。通过实践的检验，把不正确的認識去掉，而使認識更加正确。許多时候，还需要反复失敗过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达到和客观过程的規律性相符合，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預期的結果。因此，認識上的正确与錯誤，实践中的成績与缺点，都是不断的一分为二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說：“一个正确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認識，由認識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①但是杨献珍同志是根本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的，否认認識是一个从物质变精神，从精神变物质不断反复的辯証过程，不承认認識从浅入深，从低到高，从不正确到正确，乃是思維发展的規律。

由于杨献珍同志坚持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反对“一分为二”的唯物辯証法的世界观，就从根本上歪曲了思維和存在的正确关系，根本不能解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任务，而只能破坏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任务。

(三)

杨献珍同志为什么一会儿宣传形而上学的絕对的同一性，一会儿又反对辯証法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呢？这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論战中，杨献珍同志从正面反对唯物辯証法的同一性，而从反面传播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从一九六三年到現在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問題的論战中，則是以正面传播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而从反面反对唯物辯証法的同一性。杨献珍同志的这种做法，不是无缘无故的，而都是配合当时的階級斗争形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

在一九六三年以来的这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問題的論战中，杨献珍同志大肆宣扬所謂在对立面中找出共同的东西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說什么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它联系起来；說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跟現代修正主义是“同中之异”；說什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团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和团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基层干部就是找共同点、求同存异。这不是很明显地在当前的国际国内階級斗争非常激烈的形势下，迎合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义的要求，来反对无产階級的革命斗争、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嗎？当我們要強調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的时候，杨献珍同志却強調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有个共同的东西而联系起来，这不是明明以階級調和来反对階級斗争嗎？当我們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的

^①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下同），第3頁。

时候，杨献珍同志却主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是“同中之异”，应该“求同存异”，这不是明明帮助了現代修正主义，而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嗎？当我们强调开展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批評与斗争，“兴无灭資”，以达到重新教育人、重新組織革命的阶级队伍的时候，杨献珍同志却出来取消批評与斗争，而要求“求同存异”，这不是明明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嗎？在这方面因为已有許多同志的文章进行过批駁，所以不再詳細論述了。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的論战中，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們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三面紅旗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深入发展的产物，而三面紅旗的提出又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杨献珍同志挑起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論战，其政治目的就是反对三面紅旗。

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他反对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轉化，尤其是反对从精神到物质的轉化，反对充分發揮主观能动性来革命地改造世界。他說，如果誰承认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誰就是传播主观唯心主义。而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恰恰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而制定的。总路綫的精神，就是强调按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客观規律，充分發揮人的主观能动性，發揮革命干劲和革命精神，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人們只要政治挂帅，只要发扬革命精神，就能在阶级斗争中掌握正确方向，在生产斗争中坚强有力，在科学实验中勇往直前，在胜利面前，再接再厉，不断革命，在困难面前看清主流，敢于斗争，任何艰巨的任务都可以完成。中国人民在总路綫的指引下发扬起来的这种最可宝贵的革命精神，却是杨献珍同志攻击的对象，他說，这是“发高烧”，“升虛火”；①誣蔑为“实际上丟掉了客观規律”，“片面地讲主观能动性”，犯了“唯意志論”的錯誤。②不錯，人們的主观应该反映客观，应该努力按照客观的規律办事。但是重要的問題是怎样才能反映客观規律。如果象杨献珍同志那样，反对把辯証法应用于反映論，反对發揮人們的主观能动性，难道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規律嗎？

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通过实践而認識世界，又通过实践而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說：“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項实践中来。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③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革命群众的实践活动，

① 轉引自王跃文：《杨献珍同志是怎样歪曲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載《光明日报》1964年10月30日。

② 轉引自馬清健、卢国英：《評杨献珍同志的認識論》。載《光明日报》1964年11月13日。

③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1頁。

他认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①但是杨献珍同志极力反对革命的群众实践，极力贬低革命群众实践的意义。他宣扬“到处都是实际”，“学校里面就是实际”的论调，以阻止人们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去。这也是实际上反对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火朝天的革命群众运动。

由于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否认人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反复的辩证过程，所以杨献珍同志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凡是主观不符合客观，凡是缺点和错误，都是唯心主义。因此，他对于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革命群众运动百般挑剔，对于运动初期所产生的一些缺点，拼命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一个伟大的新生事物，对于一个这样的崭新的、史无前例的几亿人的伟大社会运动，我们是缺乏经验的，是不能一下子就全部认识清楚的。我们只有经过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能逐步地取得经验，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认识上的某些片面性，因而可能出现一些这样的或是那样的缺点，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这些片面性和缺点一定会在实践中得到纠正。而且，在实践中，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成绩和缺点，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主流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这就应该首先加以肯定，而对次要的、非主流的缺点，则须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加以纠正，我们党正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断总结经验，及时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从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使三面红旗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杨献珍同志顽固地反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顽固地坚持他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并以这些观点作为攻击三面红旗的哲学武器，和党大唱对台戏。我们党认为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杨献珍同志则诬蔑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是唯心主义。其实，正是杨献珍同志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去反对党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形而上学的观点去反对辩证法的观点。两种对立的同一性的斗争，既是哲学战线上的斗争，也是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赢得胜利的，肯定不是抛弃真理，为国内外反动阶级服务，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杨献珍同志，而是那些坚持真理，坚持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①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乙种本），人民出版社版，第56页。

就紅专关系駁“合二而一”論

王 致 远

当杨献珍同志大肆宣扬其形而上学的“合二而一”論，以反对唯物辯証法，同党大唱对台戏，从而挑起哲学战线上的新論战的时候，却有些人出来为杨献珍同志的观点辯护，姚伯茂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七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淺評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討論》的文章，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說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如紅与专的矛盾要“合二而一”。这实质上是用一种迷惑人的手法，来宣扬“合二而一”論。本文就从紅专問題，来駁斥“合二而一”論。

不容許用“合二而一”的观点来歪曲紅专关系

姚伯茂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装作不偏不倚，对“合二而一”論者和反对“合二而一”的人，各打五十板。其实，从他对紅与专等具体矛盾的分析来看，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一种“合二而一”論，不过是采取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讓我們先来看看姚伯茂同志是怎样歪曲紅与专的矛盾关系的。

第一，他认为“紅与专是完全統一的，而不是針鋒相对，水火难容的”。这就否定了紅与专的矛盾斗争。虽然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說：象紅与专这种“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对立面双方并不是針鋒相对，水火难容，根本相反，全面排斥的，而只是局部排斥的关系”。在这里，他似乎沒有完全否定紅与专的互相排斥，但实际上並沒有改变他上一句話所說的紅与专是完全統一的观点。因为說这类矛盾只存在着“局部排斥的关系”，实际上就否定了矛盾斗争的絕對性和普遍性。毛主席說：“对立的統一是有条件的、暫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則是絕對的。”又說：“矛盾的斗争貫串于过程的始終，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轉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絕對的。”“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争性就沒有同一性”。^①这些話說明，矛盾的斗争性是絕對的、无条件的；对立面双方的同一，是貫串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同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而不是絕對的同一。沒有斗争，就沒有同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下同），第1卷，第321頁。

一。姚伯茂同志认为紅与专的矛盾是“以同一性为主”的，对立面之間只存在“局部排斥的关系”，这就是說，矛盾的斗争性只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是有所不在，而不是无所不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就否定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矛盾的斗争性。我們知道，所謂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統一的关系。任何事物的矛盾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种属性，否定了矛盾的斗争性，也就是否定了矛盾。既然姚伯茂同志把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认为紅与专的矛盾双方只存在“局部排斥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說，只有同一性，沒有斗争性，这就否定了紅与专的内在矛盾性。这样，在姚伯茂同志的观点里，紅与专的内部矛盾不見了。

第二，姚伯茂同志认为“解决紅与专……等矛盾，并不需要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进行針鋒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应该把两者結合起来，統一起来，联系起来，‘合二而一’”。什么是“針鋒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呢？从哲学意义上來說，任何矛盾的斗争都是“針鋒相对，你死我活”的。矛盾决不能調和。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属性和趋向。社会領域的阶级斗争、革命、战争等固然是斗争，人民内部的批評与自我批評、討論、爭論等也都是斗争；自然界中的弱肉强食、炸弹爆炸固然是斗争，吸引和排斥、阴电和阳电的互相作用，也同样是斗争。在这里，只是矛盾斗争形式的不同，而不是斗争性之有无。姚伯茂同志认为，解决紅与专的矛盾，并不需要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进行“針鋒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应该“合二而一”，这就否认紅与专的矛盾需要通过斗争求得解决。这不正是杨献珍同志所謂的“学对立統一規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的具体运用嗎？毛主席說：“無論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①又說：“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②这是說，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在姚伯茂同志那里，紅与专的矛盾，只須对立双方“結合起来”，“統一起来”，“联系起来”，“合二而一”就得到解决，把“結合”、“統一”看作事物发展的动力。这样，在姚伯茂同志的观点里，紅与专这对矛盾的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見了。

第三，姚伯茂同志认为紅与专这类矛盾“对立面斗争的結果，并不是一方消灭、战胜、克服另一方，而是互相促进，共同得到发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难道世界事物中果真有这样一种永远不分勝負的“斗争”么？（这里又証明姚伯茂同志否定了紅与专的矛盾的斗争性。）既然矛盾双方“斗争的結果”是“互相促进，共同得到发展”，而不是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战胜一方，自然就不会有統一物的分解，从而也就不会有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轉化。这种把矛盾双方看作永远結合在一起，万古长存的观点，同杨献珍同志的“矛盾的統一，只是說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頁。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9—10頁。

思”的說法，又有什么實質上的區別呢？毛主席說：“客觀事物中矛盾着的諸方面的統一或同一性，本來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暫時的、相對的東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着。”^①毛主席還強調指出，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的互相轉化，是更重要的事情，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於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姚伯茂同志卻認為有一類矛盾，如紅與專的矛盾，對立面雙方是永遠共存，不會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這不正是把矛盾雙方的統一看作是死的、凝固的嗎？這不正是徹頭徹尾的形而上學嗎？這樣，在姚伯茂同志的觀點里，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鬥爭的結果導致舊統一體的破裂和新統一體的產生，舊事物要為新事物所代替，這些也都不見了。

由此可見，姚伯茂同志在紅專關係上所持的觀點，實際上是否定矛盾，否定鬥爭，否定轉化的矛盾調和論。從思想實質來說，這同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並沒有什麼區別。

必須歷史地、具體地分析紅專關係

正如其他事物的矛盾一樣，紅專關係是“一分為二”的，而決不是“合二而一”的。姚伯茂同志既然認為紅與專是“合二而一”的，而這又與客觀事實不符，於是，他就採用一種詭辯的手法來“分析”紅專關係，以論證他的“合二而一”論。這種手法就是：離開一定的歷史條件，離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抽掉紅與專的社會內容，空洞地、抽象地談論紅與專兩個概念的關係，從而在實際上否定了紅與專的矛盾。

例如，當他否定紅與專的矛盾鬥爭時提出：“試問：在紅與專的矛盾中，究竟是紅代表新生的一方、專代表沒落的一方呢，還是專代表新生的一方、紅代表沒落的一方呢？紅與專鬥爭的結果，是紅‘戰勝’、‘消滅’、‘克服’專呢，還是專‘戰勝’、‘克服’、‘消滅’紅呢？如果是前者，就成為空頭的政治家；如果是後者，就成為不願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專家’。”在這裡，他完全抽掉紅專關係中存在着的兩個階級、兩種思想、兩條道路的鬥爭，否認紅專關係是個世界觀的問題。他從概念出發虛構問題，以此詬難反對“合二而一”論的同志，以為這樣就可以把對方難倒了。其實，這只表明他用抽象的概念遊戲來代替對矛盾的具體分析。在另一個地方，他又武斷地說：“‘紅’與‘不紅’是矛盾，但這並不排斥紅與專也是矛盾；……如果承認多快與好省、紅與專、高度的革命精神與嚴格的科學態度是矛盾的話，那麼就得承認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就是要把對立着的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聯繫起來，統一起來，‘合二而一’。”這是什麼邏輯？承認矛盾，就得否定鬥爭？承認矛盾，就得用調和矛盾的“合二而一”論來解決矛盾？這不正暴露姚伯茂同志的觀點就是矛盾調和論嗎？姚伯茂同志在紅專問題上，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法，不具體分析在不同階級、不同思想的人身上，紅與專雙方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

^①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18頁。

具何特点，而是孤立地、抽象地来看待紅与专的矛盾，把紅与专的矛盾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完全割裂开来，这怎么不陷入反唯物辯証法的泥坑？！

毛主席教导我們：“我們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結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① 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我們研究紅专关系，必先弄清这个問題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个矛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矛盾双方各有何特点，解决这个問題，关键在哪里，只有弄清这些問題，才有可能对矛盾双方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辯証分析，从而提出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

大家知道，又紅又专，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問題，是我們党和毛主席一贯坚持的方针。解放以后，特别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前后，正确解决这个問題，更具有迫切性。刘少奇同志說：“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須有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学家、新聞記者、文艺家、法学家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家的队伍。这个队伍，也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經過改造的、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識分子在內。中国是一个大国，建設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事业，因此，工人阶级必須有一个宏大的知識分子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培养和壮大这样一支队伍，是我們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历史任务。”^②

又紅又专，就是要求专业知識和技术，掌握在革命化的人手里，使专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求党員干部都懂得业务，以保証党对一切业务的绝对领导；要求无产阶级知識分子，按照这个方向来培养。但是，实际情况却同这个要求有距离。比方，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数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其中少数人真正經過改造，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大多数人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处于中間状态，大多数人存在专而不紅的問題。要使他們为社会主义事业發揮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改造他們原来的世界观，不断提高他們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又如，在党員干部中，許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新崗位上，不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改造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而且，經過刻苦钻研，已成为內行人，既能掌握政治领导，又能实行业务领导。但是，也还有一些人，身居领导崗位，而对于該单位的业务，却还不熟悉，领导不能深入到业务中去。为了保証党对一切事业的领导，就要求这些党員干部，不但要懂得政治，而且要学会掌握新崗位上的新的业务。再如，在党培养下的青年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按照又紅又专的道路，已培养成为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具有一定水平的专门人才。但是，还有許多人，对于如何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紅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識分子問題，还没有解决好或基本上沒有解决。为了使他們走正确的道路，就不但要使他們学好专业，而且，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頁。

② 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講話》。

更重要的是必須使他們革命化、勞動化。這些情況說明，提出又紅又專，正是由於實際生活中存在“專而不紅”、“紅而不專”、“先專後紅”等問題。特別是“只專不紅”問題，更為突出。這些問題不但一九五七年前後存在，而且一直到现在還有類似情況。黨強調提出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為培養幹部和知識分子提出正確的方向，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幾年來執行黨的這一正確的方針，我們已自力更生地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科學技術方面的許多重大的、複雜的問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最近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再一次雄辯地證明黨的這一方針的正確性。

解決又紅又專的問題，在國內外階級鬥爭極為複雜、尖銳的今天，更具有重大的意義。安子文同志說：“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大批的又紅又專的新人材。這是很清楚的。老的革命者總是要交班的，需要有革命的接班人。這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僅僅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認識這個問題，是很不夠的。還必須把革命接班人的問題，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防止產生修正主義，確保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堅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爭取共產主義的勝利，保證我們黨和國家永遠不改變顏色的問題聯繫起來，才能深刻認識它的重大意義。”^①從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經驗教訓看來，這確實是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如果知識分子走只專不紅的道路，變成脫離勞動、脫離勞動人民的“精神貴族”，變成高薪階層，就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黨和毛主席總結了我國和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提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十五點理論和政策，其中第九點就是集中地正確解決這個問題的理論和政策。這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在科學、文化、藝術、教育隊伍中，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也是長期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我們要經過文化革命，經過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革命實踐，建立一支廣大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②

由此可見，同特定的歷史條件聯繫起來，同各個時期的階級鬥爭形勢聯繫起來，紅專關係是具有多么活生生的、豐富的內容。紅與專的矛盾，是一對極其複雜的矛盾，絕對不能孤立、抽象地來看待它。紅與專是一分為二的，在紅與專的矛盾中，紅與專每一方，又都是一分為二的。不但有紅與不紅、專與不專等不同情況，而且，紅與專也都有各種不同的水平，在專業上，還有正確與錯誤、先進與落後等不同情況。這些不同的情況，互相交錯，就形成特定的人的紅專關係。這說明，紅與專的矛盾，是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等等矛盾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只有從這些活生

① 安子文：《培養革命接班人是黨的一項戰略任務》。載《紅旗》1964年第17—18期。

② 《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乙種本），第54頁。

生的具体内容出发，来分析紅与专的辯証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才能真正找到紅与专这对矛盾运动发展的規律性，从而正确領会和执行党在这个問題上的方針，正确解决紅与专的矛盾。象姚伯茂同志那样，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抽掉紅专关系中所包含着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内容，把紅与专变成两个抽象的、干枯的、僵死的概念，在那里，沒有矛盾斗争，沒有紅与专这两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轉化，因而也就沒有运动发展，这就必然要歪曲党在这个問題上的方針、政策。

实现又紅又专，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既然紅与专的矛盾是在我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那么，应该怎样联系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来具体分析紅与专的辯証关系及其矛盾运动呢？

紅与专的矛盾，首先表現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或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拒絕或不愿意以其专业知識和技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专业必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专必須服从紅，为紅所指导。专脱离了紅，就会迷失方向。这就是說，在紅与专的矛盾中，紅是統帅，是占主导地位的一方。但是，专不是自然而然地就服从紅，为紅所指导的。专业知識和技术的掌握，一般地总是表现为个人的才能，因而它既可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可以被用来为个人名利服务。专业有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識和技术本身沒有阶级性，它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識和技术的人，如果他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把专业知識和技术当作个人求名求利的“私产”，不愿意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以其专长向党向人民翘尾巴，要求党和人民服从他的需要。这样，就必然发生紅与专双方的矛盾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搞和平演变的一个方面的斗争。知識分子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的各种方式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进行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在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条件下，克服了为个人名利而搞专业、而学专业的个人主义思想，以紅統率专，使专在紅的指导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就实现又紅又专，专不服从紅的矛盾轉化为新的条件下出現的新矛盾。另一种斗争的结果，如果具有专长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抗拒党的领导，拒絕接受社会主义教育，那矛盾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本来是有用的专长，也就变为对党对人民无用的东西。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識和理論观点，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的理論观点，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显然不能用它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須通过斗争，批判、否定资产阶级的理論、观点，逐步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才能实现紅专相结合。

作为专业知識、技术，不論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属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除为谁服务这个問題外，都还有一个正确与錯誤、先进与落后的問題。凡属錯誤、落后的东西，也都不可能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必須經過斗争，使錯誤的东西变为正

确，使落后的东西，变为先进，才能真正适应无产阶级的需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从而实现红专相结合。

红与专的矛盾，还表现在一些革命干部业务水平、业务能力较低，不能适应无产阶级政治发展的需要。这些革命干部，虽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也决心坚持革命到底，但是，他们大多数不是先有专门知识和技术，再参加革命，而是参加革命以后，根据革命形势和党的需要而学习某一方面的业务，从事某一方面的业务活动的。在革命战争的岗位上，他们学习打仗；在根据地后方，他们则学习和从事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业务。他们根据革命形势和党的需要而从事业务学习和业务活动，并在实践中学习。每当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需要，把他们调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在开始的一个时期里，他们就总会暂时地出现业务水平落后于客观形势需要的矛盾，特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许多问题和任务，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新的、生疏的。他们决心要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但由于业务水平低，或者业务不熟悉，一时摸不到门径，而感到力不从心，事与愿违，或者事倍功半，成绩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专业能力就不能适应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他们除了继续提高政治觉悟外，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在这里，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斗争，如端正对新的业务和业务学习的态度，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重新学习，克服业务学习和业务活动中的许多困难等等。斗争的结果，在党的领导、帮助和个人发挥革命干劲、深入实际、刻苦钻研、虚心学习的条件下，矛盾转化了，外行转化为内行，达到新条件下的又红又专。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对党的指示漠不关心，害怕艰苦或盲目自满，专不下去，则变成空头“政治家”。

在基本上实现了又红又专以后，是不是矛盾就彻底解决了，红与专再也没有矛盾斗争了？不是。在新的条件下，又会产生新的矛盾。资产阶级思想毒菌是无孔不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又会侵蚀人们。比方，在一个人的专业获得一定的成就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防止和清除骄傲自满、求名求利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就会出现新的矛盾，进行新的斗争。另一方面，专也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或在新的情况下出现新的不适应。错误的东西，当然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专业的研究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也不能切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群众的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停滞不前，没有提高，相对来说，也会形成新形势下的落后，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客观需要，……这一切新出现的问题，也都需要经过斗争求得解决，绝不能“合二而一”。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红与专在更新的水平上统一起来，在新的条件下，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斗争。由于红与专都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红与专的矛盾运动也是不会停顿的。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从而解决矛盾的方法有所不同了。

综上所述，可见实现又红又专，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是不断克服资产阶级道路、克服各种错误和落后的倾向的过程。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确实是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

革命实践，决不是“合二而一”。在当前，由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正在同我们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同我们激烈争夺年青的一代，这种斗争特别显得复杂、尖锐。而且，斗争又是长期的、曲折的，有反复的，并不是一次斗争就能完全解决问题。“合二而一”论是极为错误而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红与专双方“完全统一”，“不可分离地联系着”，“万古长青”，既没有斗争，也没有变化发展。人们只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把红与专“合二而一”，就可以解决红与专的矛盾，这不是调和矛盾，取消革命，又是什么？而既然红与专双方本来就是“合二而一”的，那党提出向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前进的号召，岂不成为多余的了？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革命干部和知识青年，岂不是也可以不必重视自己的思想改造，不必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不必开展思想斗争，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向又红又专的道路吗？这种论调，实质上是要人们取消在红专问题上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维持红专关系的现状，并为坚持“只专不红”、“先专后红”的道路的人提供论据。在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合二而一”论者这样来歪曲红专关系，歪曲党在红专关系上的方针，是和我们党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战略方针相对抗的，这本身就是争夺青年一代的阶级斗争的一个表现。我们决不允许“合二而一”论者在红专问题上调和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决不容忍他们对党的方针的任意歪曲。批判在红专关系上的“合二而一”论，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1964年10月28日

“合二而一”論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哲学

刘 嶸 齐 云

这几年来,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在我国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些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面临着这样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我们党加强了“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和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为我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以适应斗争和革命的需要。伟大的革命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伟大的革命的物质力量。“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极大地提高了广大革命人民的觉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胜利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面,一切腐朽的反动的社会势力,为了逃脱他们面临的被灭亡的命运,总是千方百计地在群众中散布改良主义的毒素,宣传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谬论,妄图抹杀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腐蚀革命群众的阶级意识,取消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合二而一”论,正是阶级敌人的利益和要求在哲学上的概括。杨献珍同志有意識地与我唱对台戏,針鋒相对地提出和大力宣扬“合二而一”论,用调和矛盾、阶级合作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革命人民的革命意志,磨灭革命人民的斗争精神,正是适应现代修正主义、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反抗革命大风暴的需要。

列宁說:“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議、措施等等辯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誰有利?’的問題。”^①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尽管有些用語比較抽象,比較隱晦,并且还假扮成唯物辩证法,說“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可是我們只要联系到阶级斗争的实际来考察,并且提出“对誰有利”的問題,这种“合二而一”论的反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为反动阶级服务的阶级实质,就会暴露无遺。

下面我們就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論中大力宣扬的三个論点,作一些分析。

(一) 杨献珍同志說,“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面是怎样同一的(統一的)。求同存异。”又說,“这就是要求研究对立面是怎样能够同一的。此‘同一’是指的共同要求。”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19卷,第33頁。

很清楚，在楊獻珍同志那里，对立同一就是对立双方的“共同要求”，就是对立双方“求同存异”。辯証法研究什么？为什么要研究辯証法？就是要从对立面双方找出共同要求，就是“求同”。不同的东西呢？他說，“不同的就存起来”，这就是不要斗争。在这里，矛盾着的双方的绝对的斗争性不見了，被抹煞了。矛盾着的双方由于斗争而引起的，在一定条件下的轉化，也不見了，被抹煞了。“合二而一”論者把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又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轉化，歪曲为无条件的“共同要求”，“求同存异”。这正是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和“是則是，否則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話”这一形而上学的公式，毫无区别。

“合二而一”論把辯証法荒謬地归結为“共同要求”、“求同存异”，是对一分为二的革命辯証法的全面篡改和歪曲。沒有斗争，沒有轉化，就沒有革命，就沒有发展。“合二而一”論就这样閹割了辯証法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合二而一”論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按照楊獻珍同志“合二而一”論的观点，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会得出什么样的結論呢？

社会主义社会，跟任何客观事物一样，也是“一分为二”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革命知識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一方，敌視社会主义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資產阶级右派分子以及貪污盜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为一方，界綫分明。試問楊獻珍同志，在这两个对立面之間，有什么“共同要求”呢？如果离开阶级观点硬要在这两者之間去找出什么“共同要求”，那不正是現代修正主义宣扬的資產阶级人性論的貨色嗎？这两个对立面之間的“异”，却是十分鮮明的，一个是热爱和拥护社会主义，一个是敌視和反对社会主义，按照楊獻珍同志的观点，“不同就存起来”，那末，就是說，我們党不要领导人民去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資產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要去进行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不要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一句話，不要去搞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他們无时无刻不梦想回到那已被推翻的“天堂”，如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坚决的进行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其結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由此可見，楊獻珍同志的“求同存异”論，其政治目的何在，对那个阶级有利，不是很清楚的嗎？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就是在人民中間，也是一分为二的。在人民中間，在我国現在的条件下，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資產阶级之間的矛盾，等等。在現阶段的条件下，人民中間存在着共同的根本利益，但这里所說的根本利益，是有条件的，是人民内部的，与斗争相联系的；而楊獻珍同志的所謂“共同要求”，是无条件的，是抹煞阶级界限，排斥斗争的。它們是有原則区别的。前者是“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別

和变化”，后者是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①何况人民内部仍然有阶级、阶层之分，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间，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异”，是决不可“存起来的”。按照“合二而一”的观点，只要研究“共同要求”、“求同存异”，那么，必然取消阶级界限，必然取消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阶级路线；至于什么阶级斗争，阶级教育，批评或斗争，通通是多余的了。斯大林同志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②。杨献珍同志的所谓“求同存异”，“不同的就存起来”，不正是反对不调和的阶级政策，执行调和阶级的妥协政策吗？

（二）杨献珍同志说，“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 思想 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 思想 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杨献珍同志所说的学习辩证法的目的，是和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教导的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公开对抗，针锋相对的。毛主席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③又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④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着，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着。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两种对立的思想，背后站着两个对立的阶级。在今天，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无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中间的、超阶级的思想。按照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分析两种对立思想的矛盾，就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统一只是相对的，而斗争则是绝对的。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一方克服一方，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克服无产阶级思想。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要在思想领域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首先就要划清两种思想界限，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斗争，并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无产阶级思想。可是，杨献珍同志却要人们学会这样的“本事”：“把两个对立的 思想 联系在一起”。而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中所讲的“联系”，是“不可分离的联系”，这就非常清楚，这个所谓“本事”，实质上，不过是模糊思想界限，取消思想斗争，取消思想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事”；是把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永远“和平共处”的本事。

按照“合二而一”论的主张，“把两个对立的 思想 联系在一起”，那么，无产阶

①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8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80页。

③④ 分别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卷，第292、318页。

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界限模糊了；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被抹煞了；更不必說要在科學、文化、藝術、教育隊伍中，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文化革命了。同樣，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想界限模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被抹煞了；更不必說要求“革命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起來粉碎現代修正主義的進攻，並且在鬥爭中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各個學術領域中都得到新的發展”。^①

嚴重的問題還在於：思想陣地和其他任何一個陣地一樣，如果社會主義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必去佔領。向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思想的任何退讓，就是意味著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思想影響的加強，正如列寧所說：“對於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加強。”^②

目前，正當階級敵人千方百計採取和平演變的手段，用修正主義理論、資產階級思想，從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進行滲透，企圖腐蝕和溶化我國國內某些不堅定的分子的時候，正當國內階級敵人，一方面對他們的子女灌輸反動思想，要他們的子女繼承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衣鉢，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腐蝕和毒害我們的革命幹部和廣大青年，力圖挖社會主義的牆腳，栽修正主義的根子的时候，楊獻珍同志卻大講特講“學會把兩個對立的思想聯繫在一起的本事”，不正是要解除人們的思想武裝，為階級敵人腐蝕、溶化我們的幹部、人民和青年，實行“和平演變”的陰謀當“開路先鋒”嗎？

（三）“合二而一”論宣揚“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的時候，要把兩個對立着的兩個方面聯繫起來，結合起來”，要“合二而一”；還捏造說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都是按照他們的“合二而一”的觀點制定的。

“合二而一”論硬說，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是按照他們的“合二而一”的觀點制定的。他們還說，“這條總路線已經基本實現”。看來，他們想借此證明“合二而一”論的“正確”。事情果真是如此嗎？

大家知道，一九五三年，黨中央公布了我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革命內容，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完全消滅城鄉資本主義。它是根據過渡時期存在着五種經濟成分（或四種所有制）的矛盾運動和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來制訂的。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進行着“誰戰勝誰”的鬥爭。鬥爭的結果，必然是矛盾的一方克服矛盾的另一方，不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黨的總路線就是使社會主義戰勝和消滅資本主義的路線，而不是使它們“合二而一”的。

我們也知道，就是在黨中央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之後不久，楊獻珍同志提出了他的“綜合經濟基礎論”，主張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是由五種經濟成分構成的一個綜合

① 周揚：《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人民出版社版，第36—37頁。

② 《列寧全集》，第5卷，第352頁。

經濟基礎。這種“理論”，否認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鬥爭，否認通過鬥爭逐步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逐步消滅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而是要它們“平衡地互相銜接地發展”，長期共存。這種“理論”的實質，就是保存資本主義經濟、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是與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相對立的。完全可以看出，楊獻珍同志的“綜合經濟基礎論”和後來提出的“合二而一”論，都是矛盾調和論和階級調和論，二者之間是一脈相承的。

我國偉大的革命實踐，完全證明了“綜合經濟基礎論”的破產。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在一九五六年，我國取得了經濟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伟大勝利，基本上完成了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合二而一”論者竟妄想以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勝利來證明“合二而一”論的“正確”，真是絕大的荒謬！

“合二而一”論還把“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作為一個例子，說它是“把對立的方面統一起來、結合起來”的。可是，誰都清楚，“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最重要內容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儘快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楊獻珍等同志的看法，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按照“合二而一”的觀點制定的，那麼，如上面已經分析過的，什麼“團結——批評——團結”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階級界限，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文化革命，技術革命等等，都要從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中刪除掉。這樣一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不斷革命、徹底革命的內容和精神，就被刪除得一干二淨了。

黨的政策是黨的生命。能否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能否採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政策，是能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為將來逐步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決定性條件。列寧說：“向前發展，即向共產主義發展，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決不能走別的道路”。^①“合二而一”論者別有用心地篡改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革命內容和革命精神，勾銷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企圖把廣大人民、幹部、青年從革命的道路引向右傾機會主義的道路，把人們拖到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去。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毛主席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②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是對革命人民的腐蝕劑，是為反動階級服務的哲學，是哲學領域內的一株毒草，必須進行嚴肅的批判。

①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448頁。

②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頁。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根本道路

——讀《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的筆記

李 又 華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不久前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講話里，着重論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識分子問題。毛泽东同志強調指出，参加階級斗争的实践，密切同工农群众結合，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根本道路。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講話，对于指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这里，談一点学习的体会。

—

我們党向来是重視知識分子問題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不但民主革命时期，需要吸收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尤其需要吸收知識分子。早在一九三九年，党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伟大的抗战力量，組織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統一战綫。沒有知識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我們党正确地执行和有效地实施了这个决定，团結了大批的知識分子参加工作，并且不断对他們进行教育改造，帮助他們走上革命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識分子实行了团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們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識分子对于我們这样一个大国來說，是太少了。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区团結他們。”^②解放后，党对于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除少数現行反革命分子外）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針，絕大多数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負責的工作，对于原来失业的知識分子也努力帮助他們就业，或者給予其他的适当的安排。在政治方面，党給了許多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党还采取了許多措施，帮助知識分子在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受到鍛炼和改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下同），第2卷，第611頁。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下同），第5頁。

毛泽东同志說：“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識分子，現在轉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們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們如何帮助他們适应新社会需要的問題。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①

大家知道，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就大多数來說，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資產階級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階級服务。为旧中国、为資產階級服务的知識分子，現在轉过来为新中国、为无产階級服务，存在着站在什么立场上来服务，如何服务的問題。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多数是非工农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农家庭，但在解放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就这方面來說，是属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用資產階級世界观，站在資產階級立场，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这必然要发生矛盾。由于党的领导和帮助，实际生活的教育，知識分子的努力，許多人有了进步，但对許多知識分子來說，距离世界观的根本轉变还很远，矛盾仍然是客观存在着。到了一九五七年，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銳了。一九五七年，我国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上完成，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毛泽东同志說：“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②面临着这一场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广大的知識分子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不大习惯。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許多新問題如何了解，怎样对待，还不不清楚，或存有怀疑。这种情况正是說明了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世界观与社会主义經濟制度不相适应的矛盾。

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建立，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会促进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斗争中，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世界观的改造，有着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說：“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我們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們的文学艺术家，我們的科学技术人員，我們的教授、教員，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們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們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③毛泽东同志还說：“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务。”^④

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經起了根本变化，資產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础已經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动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講話中，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資產階級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階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我們知識分子就能逐步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做出更多的貢獻。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頁。

^{②③④} 分別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第2、6、7頁。

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是思想领域内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长期的、反复的、复杂的。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并不是讀了几本馬列主义的书，就算解决了問題。知識分子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讀了一些馬克思主义的书，并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过一些問題，就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了，已經改造好了，只有提高的任务，沒有改造的任务了。这显然是极为有害的。这是因为沒有認識到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毛泽东同志批評了这些认为不需要繼續进行改造的人。他說：“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轉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学习，都應該改造。”“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馬克思主义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①

学习馬克思主义，对于确立知識分子的革命的科学的 worldview，具有决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对当时（一九五七年）我国知識分子对待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了分析，这就是大約有百分之十几的人，是比較熟悉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的。这些人是少数。多数人想学习馬克思主义，也学了一点，但还不熟悉，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搖摆。还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馬克思主义、对馬克思主义抱着仇視态度的。但学习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从书本上学习。毛泽东同志說：“学习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②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設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項伟大的革命运动。阶级斗争是三大革命运动的綱，是促进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动力。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将考验一切人，改造一切人。知識分子在学习馬克思主义书本的同时还要亲身参加到这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馬克思主义学到手，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最根本的，是要参加阶级斗争。因为只有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才能真正懂得革命，才能真正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学会阶级斗争的本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主义时期还有阶级、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只有在参加阶级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同工人阶级和貧下中农共命运、同呼吸，产生革命的阶级感情。也只有在参加阶级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促使自己用无产阶级思想同各式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逐步地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一切在思想改造方面取得显著成績的人，都是經历过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鍛炼和考验的。

①② 分別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第6—7、9頁。

毛主席是当代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把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創造性地发展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指南，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我們来说，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理論和实际結合的典范。我們学习它，必須坚持理論和实际結合的原则，才能学到手，用得上，才能达到学习理論，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包括主观世界）的目的。这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工作实践过程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这些年来，我們已有許多知識分子，开始重視理論和实际結合的原则，活学活用的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提高了認識，改造了思想，这是很好的现象。对于知識分子来说，理論和实际相結合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的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立场、观点、方法的改造。毛泽东同志批評那些讀了馬克思主义的书，並沒有联系改造自己思想感情的人：“有些人讀了一些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學問了，但是並沒有讀进去，並沒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①这实际上是如何对待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态度問題。这个态度不改正过来，虽然可以背誦許多馬克思主义的詞句，但还是不懂得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样就經不起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我国的文化革命的高潮正在形成中。在文化革命过程中，一切旧的腐朽的思想将受到批判。毛泽东同志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們自由泛滥”。毛泽东同志还說：“长時間以来，人們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我們現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②文化革命是意識形态領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的自觉的参加这场大革命，在斗争中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样，我們就会得到极大的鍛炼和提高。在这个講話里，毛泽东同志这样指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給了新的保証。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評，就可以通过辯論，进一步闡明自己正确的意見。如果你写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們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③

三

知識分子必須同工农群众相結合。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貫強調的問題。还在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就尖銳地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

^{①②③} 分別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第6、20—21、16頁。

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① 知识分子只有愿意接近工农群众，了解和研究他們的问题，和他們密切联系，才能很好地为他們服务。知识分子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关键在于同誰結合，同誰脱离，同誰有感情，同誰沒有感情。如果知识分子不同工农結合，和占全国人口絕大多数的工人、貧下中农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感情不同，就不可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唤起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結合，希望知识分子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或者到工厂、农村去“走馬观花”看一看，轉一轉；或者到工厂、农村“下馬观花”，向工人农民做調查，交朋友；或者是“安家落戶”，即长期生活在工人、貧下中农里面，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总之，要把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有更多的人去接近工农。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知识分子脱离了工农群众，也就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实践，脱离了生产斗争的实践，这样，知识分子的知識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說，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或者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經驗，主要靠讀書，但是光讀書，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从书本上学来的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② 只有同工农群众結合，才能体验到他們的阶级感情，改造自己的旧的阶级感情，才能爱工农群众之所爱，恶工农群众之所恶。也只有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斗争的实践，并在这些斗争中受到教育和改造，才能正确地树立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否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将仍然是一种“紙上談兵”的东西。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党号召我們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工业为主导，沒有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大力搞好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党和国家号召在城市的知識青年到农村去，和貧下中农結合，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做一个新型的农民。这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不仅为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为国民經济基础所需要；也是广大知識青年和工农結合，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一条最寬广最彻底的道路。

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和工农打成一片，“和他們变成一体”，必須坚定地实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方向。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对延安知識青年广泛参加劳动生产，給予很高的评价，表扬了延安的知識青年、学生青年，不但学习革命理論，而且和工农結合，参加生产劳动，认为这是历史上所沒有过的。就打从这时起，从延安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級领导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許多人都参加了生产劳动。这就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結合；促进了知识分子革命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頁。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9頁。

列宁說，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逐步消灭阶级，就不应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相反要逐步缩小这一差别。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实行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千年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脱离。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以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对抗，作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一个社会条件，从而使广大知识分子脱离体力劳动，轻视工农群众。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决心同剥削阶级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决裂。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又提出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体力劳动不但为社会主义所必需，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必要的。因此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知识分子，都应参加一部分生产劳动，培养劳动观点，逐步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根本上解决同工农结合的问题。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也就为下一代知识分子劳动化做出了样子。这样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也就更大了。

毛泽东同志說：“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①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路线，这就是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的路线，即按照无产阶级方向使知识分子积极地参加阶级斗争，参加劳动，和工农群众密切结合，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条无产阶级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脱离实际斗争，脱离劳动人民，使知识分子成为高居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这是一条资产阶级的路线，修正主义的路线。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就将会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9—10页。

半工(农)半讀应当成为我国一种根本的教育制度

刘 美 藩

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我国教育事业中，陸續出現了一些新型的学校——各种形式的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学校。这些学校，一面讀書，一面劳动，讀書与劳动并重，能够真正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密切結合，理論与实践的密切結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密切結合。

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学校的兴办，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光輝胜利。它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深入发展的产物；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行教育革命的产物；是进一步貫徹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针的产物。这种新型的学校，經過几年来的調整、巩固、充实、提高，已經有一部分胜利地坚持了下来，并且开始显示出它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現在这种学校的数目虽然还很少，但是代表着我国教育今后发展的方向。

半工半讀、半农半讀，是我国一种新兴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与全日制学校的教育制度，构成了我国的两种教育制度。为了保证我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并且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积极創造条件，在教育工作上，除了要对現行的全日制学校教育繼續进行改革外，还要积极地有計劃地在我国城乡推行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教育制度，建立起半工半讀、半农半讀教育的体系，使它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教育的主体。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种根本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

一

我国是一个在原来“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在我国普及教育，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只有推行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教育制度，才能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多快好省地得到发展，使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貧农、下中农及其子女有更多的入学机会，使广大儿童和青年的学习要求得到充分滿足，真正做到普及教育，逐步实现工农群众知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对于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无疑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但是现有的全日制学校，还远不能满足广大青年、儿童入学升学的要求，还未能普及教育。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而且要进一步普及中等教育。在将来，还要争取普及高等教育。但是，今后如果指望依靠多办全日制学校来普及教育，势必会遇到两个不好解决的矛盾。一是办全日制学校花钱多，国家负担有困难。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的任务都很重，用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的财力、物力，只能占适当的比例，不能用过多的钱来大量举办全日制学校。一是学生上全日制学校费用多，家庭负担有困难。在目前我国条件下，广大工人、贫农、下中农的生活，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要把子女都送去全日制学校读书，特别是那些多子女的人，也还是负担不起的。因此，要普及教育，就一定要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就是这样一种最有效的办法。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教育单位，又是制造产品的生产单位。学生边读书、边劳动，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他们在上学期间，始终不脱离劳动，既学到文化知识，又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通过他们的劳动，既可部分或全部解决自己的生活费用和学习费用，还可部分或全部解决学校的办学费用。目前一批已经巩固下来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大量提供了办这种新型学校，可以减少国家和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的具体事实。从国家负担这方面看：在广东省新会县，国家教育经费用在全日制初级中学一个学生身上的，每年平均是七十六元左右，而用在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一个学生身上的，只需六元左右。（即使加上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对农业中学的一些经济补助，计算起来，花在农业中学每个学生身上的钱，也比国家用在全日制初级中学每个学生的钱少得多。）天津市一般的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一个学生，一年要由国家开支四百多元到五百元，而半工半读的中专学生一年只要三百元左右。学生直接参加工厂生产，还可以为国家创造大量物质财富，有的半工半读学校，学生为工厂每年创造的产值，就超出办学开支的钱的几倍以至十倍、十多倍。再从家庭负担方面看：新会县古井公社一个贫农家庭，如负担一个子女读全日制初中的全部费用，每年大约需要一百三十元左右；如负担一个子女读该公社的崖山农业中学的费用，却只需十四元左右即可。（崖山农中目前已经实现经费自给，所以学生家庭只需负担一些零用费。但是即使送一个子女到另外一些目前还只能减少部分费用的农业中学学习，家庭负担的费用比读全日制初中仍然要少得多。）天津市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一般都有生活费发给，学生家庭可以不用负担学费和生活费用。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国家可以少花钱，学生家庭可以减轻负担，这样，广大儿童和青年就有了更多的入学和升学机会，他们要求读书的正当愿望就可以更好地得到满足。

普及教育，实质上就是解决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学习的问题，是工人、贫农、下中农文化大翻身的问题。我们知道，工人、贫农、下中农占了我国城乡人口的绝大多数

数；同时他們又是我們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依靠力量。他們在旧社会被剝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現在渴望受教育的要求最为迫切。建国十五年来，虽然有了大量的工人、貧农、下中农及其子女入学，但是由于过去办的学校絕大多数是全日制学校，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人、貧农、下中农的子女（特别是女孩子），由于种种困难，无法入学。这种情况，妨碍了在教育方面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利的，对于保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进行是不利的。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四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革命根据地时就談到：“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維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①。斯大林也說过：“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沒有文化的状况，……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②。因此，所謂普及教育，其关键是在于坚持阶级路綫，使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的子女都能入学。

实行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教育制度，正是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綫，彻底解决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子女的入学、升学問題，促进教育普及的可靠途径。新会县古井公社崖山农业中学的学生，有百分之八十八是貧农、下中农的子女，而女生又占到一半左右。在办了这間农业中学之后，古井公社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人数的比例，就从百分之三十增长到百分之五十。在今年增办了两間农业中学之后（連崖山农中在內，古井公社一共有三間农业中学），就不但使应届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入了初中，而且还吸收了一部分往届的小学毕业生。由于办学方向明确，群众热烈欢迎，今年秋季招生时，古井公社的小学毕业生投考半农半讀的农业中学的共达六百多人，比投考全日制普通初中的还多一百人左右。古井公社农业中学的创办和发展，既为发展高一級的半农半讀的学校創造了条件，又大大促进了小学教育的普及。（目前古井公社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經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七。）新会县解放以来，先后开办了全日制普通中学十二所，中級师范学校一所，但是仍然远远不能滿足高小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愿望，同时，学生中，貧农、下中农家庭的子女所占的比例也还不很大。但自从兴办了半农半讀的农业中学以后，情况就起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全县共有二十六間农业中学（十四間是有了几年历史的老农中，十二間是今年新办的），今年秋季招生人数共达二千五百人，比全日制普通初級中学所招的新生还多四百人，而且农业中学的学生又絕大多数是貧农、下中农的子女。天津电子仪器厂在1958年以前，相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只占全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自从举办了半工半讀学校以后，現在已經增长到百分之七十。全厂有将近四百五十多人經过半工半讀，在五年当中，使文化程度提高了一个学程或两个学程。由此可以預見，随着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学校的发展，我国城乡劳动者及其子女将有愈来愈多的人通过这条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途径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水

①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引自《毛泽东同志論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頁。

②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1卷，第64頁。

平，普及教育的目标就能逐步得到实现。

二

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同阶级办教育，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孔子办学，要培养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儒者”。资产阶级办学，要培养的是“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而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毫无例外地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要以“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原则，来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高居于劳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办学的目标，与一切剥削阶级的办学目标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的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培养坚强可靠的，能够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能够担当得起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任的革命后代。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①这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革命后代，必须是又红又专，能文能武，能上能下，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能够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高度结合，它为我们培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培养革命后代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世界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对青年说：“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們的。”又说：“世界是属于你們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們的”。^②这几句话，指明了我們的革命事业，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却妄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他们知道，在当代久经考验的中国革命者手中实现“和平演变”是没有希望的，他们无可奈何地也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的年轻一代身上。因此为了把我們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使敌人的妄想永远落空，我们培养革命后代，就必须有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用革命的精神来教育和培养年轻一代。

参加劳动锻炼，对于培养年轻一代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③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说过：“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④从事社会主义体力劳动，不仅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必要手段，而且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条件。我們的年轻一代只有在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中间进行艰苦的锻炼，和工农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才能保证彻底革命，永不变质。只有让年轻一代投入到劳动锻炼中去，投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才能够把他们培养成经得起风雪的参天大树，而不是温室里的小花小草，才能使他們走上劳动化、革命化的道路。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就是要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

② 《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人民日报出版社版，第14、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

④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265页。

使我們的年輕一代在求學期間便開始受到必需的勞動鍛煉。

實行半工半讀、半農半讀，不但大大有助於促使受教育的年輕一代在德育方面，而且在智育、體育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毛澤東同志說得好：“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一種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①只讀書不勞動，或者只勞動不讀書，都不會獲得完全的知識，只有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既讀書又勞動，既勞動又讀書，才能使人們避免兩種片面性，獲得比較完全的知識，才會使人們逐步實現真正的知識化。

事實證明，由於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學校一面讀書，一面勞動，能夠做到教育與生產勞動的高度結合，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因此培養出來的學生一般具有如下一些可貴的特色：第一，他們培養了體力勞動的習慣，培養了熱愛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培養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的勞動觀點，培養了積極參加集體勞動的精神，他們沒有知識分子輕視體力勞動的架子。天津市一些半工半讀的中等工業技術學校，幾年來已有畢業生二千多人，工廠分配他們干什么，他們就干什么。他們當中，絕大多數被分配當技術工人，都是勤懇工作，毫無怨言。他們當中有些是定為三級或二級工，實際上是作技術員工作，也從不爭名譽、爭待遇。人們反映：“半工半讀的學生，在思想上沒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的框框，沒有知識分子的架子”。新會縣各公社辦的農業中學已有四屆畢業生共二千六百多人，縣辦中級農業技術學校已有三屆專班畢業生三百三十七人，縣辦圭峰勞動大學已有畢業生二百零四人，這些半農半讀學校的畢業生，絕大部分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參加生產和工作，農村里需要他們干什么，他們就干什么，既不挑肥揀瘦，又能積極勞動。人們稱贊：“半農半讀學校的畢業生，勞動好，思想好，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第二，他們既學到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又懂得實際生產技能。因此他們就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天津市一些半工半讀學校的畢業生，既是工人，又能做技術員的工作，在生產上發揮了顯著作用。他們成了生產中的骨幹力量，並且為提拔中等技術幹部提供了充分的來源。新會縣各種半農半讀學校的畢業生，既能拿筆杆，又能拿鋤頭，既能當一般社員，又能當幹部，因此群眾稱他們是“能耕會做，能寫會算的多面手”，是“能文能武的新農民”。第三，他們所學到的知識更能結合實際，更能“學以致用”。他們邊學習，邊應用，既把學到的知識迅速用到實踐中去，又以自己的生產經驗來豐富教學的內容，這樣就能夠更好地做到學用一致。天津市許多半工半讀學校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就熟悉生產，就培養了獨立完成生產任務的能力。新會縣許多半農半讀學校的學生，他們的體會是，這樣的學習，“讀得活，學得快，懂得透，記得牢”，到了生產崗位，就能把學到的東西很快用得上。總之，通過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培養出來的年輕一代，既不同於一般的知識分子，又不同於一般的工人、農民，他們既是有科學文化的勞動者，又是能夠從事體力勞動的知識分子；他們能夠

^①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840頁。

成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新人。馬克思曾經肯定这样一种看法：未来的教育，“对一切已滿一定年齡的儿童來說，都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增进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唯一的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①通过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制度的推行，馬克思这个光輝的預言，正在逐漸成为现实。

三

随着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制度的大規模推行，促进工农群众知識化和知識分子劳动化，就大大有利于促进城乡差別、工农差別，特别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別的逐步消灭。

在几千年来的階級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被迫专门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剝削階級則享有垄断科学文化的特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在資本主义之下达到了特別尖銳的程度。在剝削制度的基础上，体力劳动一直被鄙視，这种腐朽的观念，传播很广，流毒很深。不仅脑力劳动者鄙視体力劳动，甚至连体力劳动者自己也在剝削階級的影响下产生自卑感。于是，鄙視体力劳动便成为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关系虽然改变了，但是两者之間的差別还存在。鄙視体力劳动的习惯势力，也还相当頑固地盘踞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有些人讀了初中就看不起农民，讀了高中就看不起工人，讀了大学就什么人也看不起，他們讀書愈多，知識分子的架子愈大，也愈想摆脱体力劳动。这种思想正是剝削階級鄙視体力劳动、鄙視体力劳动者的腐朽观念的表現。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們的任务是要逐步縮小以至最后消灭城乡差別、工农差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們絕對不应扩大这个差別，也不应束手等待这个差別的自然消灭。我們必須努力为逐步消灭这个差別創造条件。为此，我們党曾經先后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而推行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制度，就是为了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而作的一种重要的、有效的努力。曾經有一种糊涂观念，仿佛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只是把体力劳动者提高到工程师、技师的文化水平，可以不必考虑脑力劳动者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思想的問題。这是对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的一种錯誤的理解。如果按照他們这种主张办事，即使受教育的人大为增加了，但是培养出来的知識分子又将有相当多的人走上脱离体力劳动的老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不但縮小不了，甚至还可能扩大起来。

为了逐步縮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我們應該使更多的青少年走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道路。青少年时期，是长身体、长知識、长思想的时期。从一定年齡起，就讓他們半工半讀、半农半讀，这对于培养他們成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人，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卷，第522頁。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馬克思說过：“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①又說：“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他必須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②让青少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边讀書，边劳动，既学习用脑来劳动，又学习用手来劳动，这样經過若干年的熏陶、鍛炼，就有可能使他們比較直接地逐渐培养成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結合的新人。反之，如果让一个人从小学讀到大学毕业，十几年的漫長時間內，一直脱离生产劳动，那就只能培养成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体力劳动、脱离实际的知識分子，到了那时候，才讓他們再去参加劳动鍛炼，就要困难得多。

我們逐步推行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制度，大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結合的新人就将源源不絕地培养出来。当他們在社会上成为占有压倒优势的大多数的时候，脑力劳动就不再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品，体力劳动也成了社会的风尚和共同的习惯，这样，社会主义的力量就极大地增强，封建主义、資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和腐蝕就受到更有力的抵制。那时即使还有一些人要想阻挠和抗拒縮小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挖掉了产生修正主义的一条重要的根子。防止資本主义复辟，保証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也就更加有把握了。

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学校是我国教育領域中的一项新生事物。毛泽东同志說过：“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經過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經過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③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学校在創办、成长过程中，曾經而且还会遇到种种的阻力和困难，决不会一切都很順利，一切都很好。事实上，近几年来，我們城乡中一些坚持下来并且得到巩固、发展的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学校，就是人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才在广大群众中扎下根来的。沒有敢于冲破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束縛和旧教育框框的勇气，沒有和种种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学校是办不起来的，即使办了也是成长不起来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半工半讀、半农半讀学校这一种新生事物在前进过程中，由于經驗不足，因而不免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我們对待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学校，应该抱着满腔热情去支持它們，去扶植它們，帮助它們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使它們认真办好。

目前，半工半讀、半农半讀的教育制度还处在萌芽阶段，但是我們相信，由于它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只要我們坚持这个正确方向，积极地而又扎扎实实地进行試驗，經過不断总结經驗，逐步推广，它就一定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花結果。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35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第216—217頁。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17頁。

生产价格与社会主义經濟不相容

——与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商榷

何宇同 高天放

关于生产价格論的論据

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經濟中，价格形成要“以生产价格为依据”^①，或者說“价格应当直接以生产价格为基础”^②；社会主义經濟必須有平均利潤的范畴。他們从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化大生产对生产价格形成的所謂制約作用，直到生产价格对社会主义經濟的种种“积极作用”的多方面的論証，就我們看来，归根到底不外是想說明如下两点：

一是只有以生产价格为根据，計量資金利潤率，以平均利潤为尺度，才能从“全社会的观点”来評價資金的使用如何才最節約有利。用杨坚白同志的話來說就是：“为了節約使用社会資金，使同量資金發揮更大的經濟效果。”（第48页）用何建章、张玲同志的語言来表述，則是“社会需要了解每一元投資所带来的經濟效果，并提高每一元投資的經濟效果。这一点反映在价格形成上，就要求以生产价格作为制訂价格的直接基础。只有这样做才是从全社会的观点来評價各种产品和投資的經濟效果，更加符合于投資对发展国民經濟的实际作用。”（第14页）“生产价格能够把生产单位的經濟效果同社会的經濟效果結合起来，从而有助于人們合理地选择生产和投資方案，提高經濟效果。”（第15页）

二是只有采用生产价格才能公平合理地以一个統一的尺度来衡量各部門、企业对社会的貢獻，来評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优劣，促进企业改善經營管理和技术进步。杨坚白同志讲得很明白：“只有計量垫支資金的盈利率，以平均利潤为尺度，才能正确衡量各部門对社会的貢獻，才能把各部門置于对等地位，才能使各部門的經濟效果成为可比，从而才能正确处理各部門之間的經濟关系。”（第45页）何建章、张玲同志則說：“为了評比經營管理成績，提高所有部門和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提高資金使用效果，也要

① 见杨坚白：《国民經濟平衡和生产价格問題》。載《經濟研究》1963年第12期，第43頁。以下有关杨坚白同志的言論，均引自此文，不另作注，只在正文中注明該期《經濟研究》的頁數。

② 见何建章、张玲：《試論社会主义經濟中的生产价格》。載《經濟研究》1964年第5期，第12頁。以下有关何建章同志的言論，均引自此文，不另作注，只在正文中注明該期《經濟研究》的頁數。

求按生产价格来訂价，因为生产价格可以提供一個评价各单位經營管理水平的綜合指标——資金利潤率。……企业利潤越多，意味着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愈高，对社会的貢獻愈大。”（第14页）“采用生产价格，按照部門成本加平均資金利潤来規定价格，可以使不同部門进行投資采用新技术，得到应有的社会评价，使各个生产部門乐于采用新技术，进行技术革新，从而促进技术进步。”（第16页）

上述两点，簡而言之，就是節約問題和正确处理各部門間的經濟关系問題^①。关于這個問題，杨坚白同志自己也作了明白的概括，他說：“在社会主义經濟中，价格形成是否以生产价格为依据，这是由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以人們的主观意志为轉移的。……如果违反了这个客观要求，它就将反显示其作用——具体表现为各部門間經濟关系的不正常并造成社会生产上的浪費。”（第43页）我們要指出的是：生产价格論者的所謂从全社会的观点来看的節約問題，是以他們的正确处理部門間的經濟关系为基础的，因为他們对是否節約的评价，是要計量資金利潤率，而以平均利潤率为尺度的。平均利潤率之所以能够作为这样一个从全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否節約的尺度，是以各个生产部門必須按資金占用量的比例取得相等的利潤为根据的，而这正是生产价格論者所強調的所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正确处理各部門間經濟关系的最核心的思想。可見，生产价格論者的整套論証，都建筑在他們的所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必須正确处理部門間的經濟关系这么一点上。因此，杨坚白同志认为：“生产价格这个范畴，……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它是反映社会与部門、部門与部門之間的經濟关系的。”（第47—48页）

我們认为，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的主张，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对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实践是极为有害的。下面就来談談我們的意見。

生产价格論违反社会主义經濟关系的性質

生产价格論者的論据是否正确呢？首先要从它的理論基础，即从他們所強調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必須正确处理部門間的經濟关系这一点来作根本考察，才能看出他們的各个具体論据的謬誤。

生产价格論者对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部門間經濟关系怎样才算正确的看法，杨坚白同志在其“从社会分工深化、部門联系密切和价格的关系上来考察”所作出的說明，很足以概括他們的观点。因为不仅他的其他有关論述，例如“从社会資金和价格的关系上来考察”等等，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来闡发这一观点，而且何建章、张玲同志关于社会

^① 因为他們所主張的以一個統一的尺度来评价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并非以部門內部的范围为限，而是可以作超部門的企业評比标准的，因此，这种主張，必然要以正确处理部門之間的經濟关系为前提，所以可以归納为正确处理部門之間的經濟关系。

主义經濟中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化大生产对生产价格形成的制約作用的分析，也不过是杨坚白同志这个观点的翻版。杨坚白同志这个观点，大体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规模經濟的条件下，每个单位的产品都是社会主义生产总体系中的产品；一种产品的价值，由于部門間的連鎖联系，除包括本单位投入的活劳动外，还把其它一系列有关产品的价值作为一个組成因素。但是，各部門的劳动技术装备程度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程度却是不相同的。这种技术构成的不同，必然表现为資金有机构成的不同。同时，各部門的周轉時間不同，因而它們所需要的資金数量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即：从各部門产品按原始的价值出售的观点来考察，将表现为有的部門利潤率高，有的部門利潤率低；而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察，按原始的价值出售所实现的利潤，又未必全是本部門所創造的。在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分工不断加深，各部門的联系日益密切的条件下，一个部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常常是由于另一些部門生产資料的价值或費用的减少而得来的，因而这个部門的利潤率提高，不过是分享了另一些部門生产力发展了的成果，并非这一部門所独有的功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就引起剩余产品的增加，因而在上述的情况下，对于剩余产品的分配，就不是某一单位、某一部門的問題，而是由社会进行統一的再分配，以使之符合于社会利益和各部門間相互利益的問題。这样，也就要求有一个共同的、統一的社会尺度。这种尺度只能是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因为只有計量垫支資金的贏利率，以平均利潤为尺度，才能正确衡量各部門对社会的貢獻，从而才能正确处理各部門之間的經濟关系。而且为了进行合理的国民經济平衡，也要有一个全社会平均条件下的劳动消耗定額。这种全社会平均条件下的劳动消耗定額，只有以生产价格为依据，才符合于社会化大规模經濟的客观要求。（參見第44—46页）

据此可以看出，他們所要求的部門間的正确經濟关系，不外是：通过按資金占用量来分配社会总剩余产品的办法，使各个生产部門对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貢獻，从而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加的貢獻，得到社会合理的承认，各部門彼此誰也不冒領別人的功績，誰也不占別人的便宜，并使各部門間能够有符合于它們对社会貢獻的等价值交換。归根到底，是要求社会主义整个国民經济的各个生产部門都能按資金占用量来平均分配社会总剩余产品价值。

这样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民經济各个生产部門之間的經濟关系，能否說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呢？不能。我們知道，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国民經济各个生产部門，根据由国家統一制定的国民經济計划来組織生产，以滿足社会需要为生产目的，并不需要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服从于利潤。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各个生产部門，無論它們所創造的純收入是多是少，都是国家的財產，除一小部分以企业奖励基金的方式归企业掌握，按国家規定的办法自行支配外，其余都要集中起来統一归国家掌握，由国家有計劃地使用，而这种使用又絕非只限于用来发展本部門。即使目前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农业部門，其所創造的純收入基本上归集体所有制所有，可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經濟

与集体所有制經濟之間的关系并非資本家之間爭奪利潤的关系，所以它們之間并不发生要求按資金額平均分配社会总純收入的問題。至于国家需要农业部門提供一部分建設資金，可以通过农业稅和一定的价格政策或其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与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并存以及按劳分配等社会經濟条件相适应，国家根据一定的經濟政策，通过計划价格，对各生产部門創造的純收入作有計划的調节，有意識让某些生产部門例如属于輕工业的卷烟、制糖等工业部門提供較多的純收入，而让某些生产部門例如属于重工业的农业机械生产部門提供較少純收入，以便在整个国民經济範圍內統籌兼顧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計划經濟最重要的优越性之一，也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民經济各个生产部門之間这种无私的經濟关系，才能提供实行这种計划經濟的可能性。在統一的社会主义国民經济計划下分工协作地进行經濟活动的各个生产部門，它們并非各自为政追逐利潤的私有者，根本不需要以等量資金取得等量利潤的形式来衡量它們的貢獻，只要它們按国家的要求，全面完成国家計划（其中也包括了利潤上繳任务），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做出了应有貢獻。按照国家有根据地制定的計划价格来实现部門間的产品交換，就保證了部門間的价值補償，实现国民經济部門間价值与产品的平衡。統一的國家計划保證了各个經濟部門的发展符合滿足社会需要的目的和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决不会由于不按照生产价格論者那样主張的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等价值交換，而自发地出現某些部門畸形发展和某些部門萎縮的現象。相反，如果采用生产价格来訂价，各个生产部門按資金来平均分配社会总純收入，以求得什么社会公平合理地承认各部門对社会的貢獻和符合这种貢獻的部門間的等价值交換，就根本排除了采用計划价格的可能性，当然談不上实行計划經濟。由此可見，生产价格論者的所謂正确处理部門間的經濟关系，是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經濟关系的性质的。事实上，国民經济各部門按資金来平均分配社会总剩余价值，从而生产价格的形成，只能是資本追逐利潤的要求在自由競爭条件下的結果，是資本在各个生产部門間自发地流动而盲目形成的一种社会均衡。問題在于“商品不是單純当作商品来交換，而是当作資本的生产物来交換。它們要求在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得到与它們的量相比例的一份，如为等量，就得到相等的一份。”^①在这里，我們看到了生产价格論者提出的最基本的論据之一，即他們所主張的从全社会的观点来評價資金的使用如何才最節約有利，只能是資本家看問題的观点，是資本主义衡量節約的尺度。他們所強調的，所謂用計量資金利潤率来評價資金的經濟效果，既考虑了資金的消耗，又考虑了資金的占用，能把生产单位的經濟效果和社会的經濟效果結合起来，这种全面性，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資本主义的东西，与社会主义各部門間經濟关系的性质，是不相容的。当然，社会主义經濟是要讲究節約的，这首先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經济的有計划按比例发展，对于資本主义的盲目競爭所造成的社会劳动的浪費，就是一种极大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199頁。（着重点是原有的）。

節約。所以我們要的是在執行國家以發展社會生產滿足社會需要為目的、統籌兼顧地制定的統一經濟計劃的前提下，對生產資金既定投放方向的建設事業，厲行節約，精打細算，力求以比原定計劃更少的資金辦計劃所規定的事業，就是說要努力使每一項新投資的生產建設事業都能節省投資，使每個現有企業更能節約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或使用同樣多的生產資金而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來。這種精打細算的考慮每一元投資的經濟效果，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在這個意義上，計算資金利潤率才有意義，而以價值為直接基礎的價格，是完全能夠進行這種核算的，根本不需要什麼生產價格。

從以上的分析，已足以證明生產價格論者向我們推薦的處理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各部門經濟關係的標準及其方法，並以此為基礎向我們推薦的“從全社會的觀點”來評價社會資金的使用如何才最節約有利的主張，不過是想要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按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套原則和標準辦事，要求社會主義再生產以價值規律為基礎，按生產價格形成的要求，讓價值規律自發地進行調節，這實際上是不要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計劃，取消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因而他們的這套理論實際上是主張經濟自由化的理論，是會導致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蛻化變質的。

現在，我們進一步考察一下楊堅白、何建章等同志關於採用生產價格對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的主張。生產價格論者認為必須使各部門採用新技術得到合理的社會評價，使各部門認為投資採用新技術在經濟上是合理的，這樣從經濟上鼓勵各部門的積極性，從而促進技術進步。怎樣從經濟上進行鼓勵呢？楊堅白、何建章等同志強調要採用生產價格，以平均利潤為統一的尺度，計量資金利潤率以衡量經濟效果。何建章張玲同志還這樣說：“從經濟上鼓勵各部門進行技術革新，就能更好地調動各部門的積極性，自覺地努力採用新技術，使技術革新工作具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促進技術進步。”（第17頁）這些主張，不外是說，如果各部門投資採用新技術得不到起碼的平均資金利潤率，就算得不到合理的社會評價，就是在經濟上沒有得到鼓勵，勞動群眾對採用新技術的積極性就受到了限制。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各個生產部門必須積極地進行技術改造，但大規模地進行技術改造，必須由國家根據需要與可能有計劃地安排，根本不是由各個部門自身考慮是否能獲得不少於平均資金利潤率的利潤來自發決定的。在黨的教育下，廣大勞動群眾思想覺悟不斷提高，各生產部門的勞動群眾對採用新技術的積極性，根本不以有沒有得到不低於平均資金利潤率為標準的所謂合理的社會承認為轉移，他們一貫積極響應黨關於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號召，力爭多快好省地完成國家計劃任務。而就部門和企業的盈利與物質鼓勵之間的聯繫來說，至多也只是與企業獎勵基金有一定聯繫，而企業獎勵基金的確定，決不是以什麼平均利潤為根據的，所以根本扯不上和平均利潤有什麼關係。把勞動群眾這種政治熱情，與為爭取所謂社會按平均利潤來承認本部門對社會的貢獻或與爭取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掛鉤，是十分錯誤的，這不過是生產價格論者想把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技術改造放置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指望通過經濟上的自發調節來實現而製造出來的一種“理論”而已。

至于各部門采用新技术的經濟效果的評價問題，無論采用怎樣的評價方法，都不需要采用生产价格。因为看采用新技术是否在經濟上有利，归根到底是要看体现这些新技术的机器在制造时所耗費的劳动，是否少于在使用它时所節約的劳动。因此，只有尽可能使价格接近于实际劳动耗費，才能进行比較确实的經濟評價，而采用生产价格，一般地說就会使机器的价格高于价值，因而是不利于进行正确的經濟評價的。特別要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革新虽然要考虑經濟效果，但并不完全取决于經濟效果。例如一些对減輕劳动强度、保証安全生产、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等方面有重大作用的項目，即使經濟效果不大，也是要办的。特別是一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改革項目，尤其不能只从經濟效果的角度来作是否采用的考虑根据。所以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在技术改造的問題上片面強調經濟效果，并且以此来推銷他們的生产价格論，显然是十分錯誤的。

实行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张，就要取消計劃經濟

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采用生产价格，就根本排除采用計劃价格的可能性。現在讓我們进一步指出，如果实行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张，就必然取消計劃經濟。

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是一个有机的統一體，必須有由国家制定的統一的經濟計劃来組織和指导經濟活动，才能使社会生产的各个不同部門、不同企业单位以及国民經济其他各个領域的經濟活动彼此銜接和配合，保証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地暢順发展，以实现发展社会生产和滿足社会需要这个目的。国家掌握着全民所有制的全部生产資金和純收入以及一部分由集体所有制提供的純收入，根据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經濟任务，統籌兼顧地、有計劃地安排社会生产和国民經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絕不能因为某一部門所能提供的純收入少而不投資或少投資，也并不因某一个部門能获得較高利潤而片面扩大。这又是社会主义計劃經濟的最重要的优越性之一。这样制定出来的統一的国民經济計劃，是有指令性的，各个經濟单位必須堅決执行。可見，社会主义的計劃經濟，是由两个方面相互配合而得以實現的：一方面是由国家集中領導国民經济活动，根据发展生产滿足社会需要的原則，統籌兼顧地統一安排生产，決定投資方向，确定国民經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組織国民經济的平衡；另一方面則是由各部門、各企业单位根据国家下达的計劃任务来組織具体經濟活动，力爭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国家計劃。如果这两个方面都不按社会主义原則办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計劃經濟。

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主张，采用生产价格为价格形成的直接基础，以平均利潤为尺度，从全社会的观点来評價資金的使用如何才能最有利，并据此来制訂国民經济計劃，指导整个国民經济的活动，就是說，用資金利潤率来作为決定投資方向的标尺。何建章张玲同志說：“在整个国民經济範圍内进行投資，也是如此，即运用生产价格可以幫

助我們判明資金投在哪些部門或者建立哪些新部門能够帶來最大的效果，以使用尽可能少的資金，办更多有利于整个国民經济发展的事。当然，国家确定投資計劃不仅仅从經济上是否有利来考慮問題，但是从經济上考慮是否有利，总不失为是一个重要根据”。

（第16页）这样，他們眼睛只看到哪里可以获得較高的利潤率，自然看不到在具体使用价值上如何才能全面滿足社会需要的問題了。而所謂国家确定投資計劃不仅仅从經济上是否有利来考慮問題云云，由于这是不能加以否认的現實，因而才不得不附帶說一声而已，他們的真正意图却是要求以資金利潤率大小为序来安排生产和决定投資方向，即是让整个社会主义再生产由价值規律来自发調节。这不正好是从国家如何制訂統一的国民經济計劃这一方面来取消社会主义計劃經济么？虽然他們也确实說过要有統一的国民經济計劃，包括了各部門的技术革新也都要由社会統一計劃来指导，可是他們所說的計劃，只能是以資金利潤率为指导的計劃。其实，以資金利潤率为指导和計劃經济是根本不相容的。如果以資金利潤率为指导来安排国民經济，結果一些利潤大的部門就会盲目地膨胀，一些利潤小而为国民經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部門却呈萎縮状态，到头来社会生产方面和生活方面的需要都不能得到滿足，物資供应不能解决，产品銷路发生困难，整个国民經济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可見，生产价格論者所說的“統一的国民經济計劃”，乃是取消社会主义計劃經济的“計劃”。

說到用資金利潤率来作为評價企业經營管理水平的綜合性指标問題，如果真的按生产价格論者那样的主张做去，就会从另一方面，即从企业这个方面来取消社会主义計劃經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职能，首先是把企业的生产經营活动納入国家的計劃軌道，保証企业内部的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与整个国民經济的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的統一。同时，要通过企业的管理活动，充分挖掘企业的潜力，充分利用現有的人力物力財力，来完成和超額完成国家下达的計劃指标。因此，社会主义企业既不能允許无計劃地盲目进行活动，更不允許按照同国家計劃相抵触的計劃进行活动。国家对企业經營管理水平的考核，必須是全面的計劃完成情况的考核。与此相反，生产价格論者特別強調說，采用生产价格，資金利潤率这个指标就基本上排除了客观条件对企业經济活动效果的影响，因而能够評價不同部門、企业的經济效果，并据此要求把資金利潤率作为評價企业对社会貢獻大小、企业經營管理好坏的标准。为此他們甚至不惜要求对社会主义价格形成制度作一个根本的改革，也就是要求对所有产品价格作一次全面的根本性的調整。他們把資金利潤率的作用抬得这样高，看得这样重，当然也就从根本上貶低了以至根本否定其他計劃指标考核的意义，实际上否认其他指标考核对評價企业經營管理水平高低的作用。事实上，資金利潤率并不能完全或基本上排除不同部門、企业客观条件对經济活动效果的影响，因为即使假定企业所占用的資金与其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但对企业經济活动有重要影响的原材料的质量、品种与供应情况，以及生产任务是否飽滿等等因素，也都会对企业的盈利发生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又往往不是完全取决于企业本身的主观条件，而是取决于国家的有关計劃的。因此，认为資金利潤率能基本上排除客观条件的影

响，足以作为衡量主观努力情况的标准，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企图以利润评价来代替具体的计划管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下达企业的计划，虽然除平均资金利润指标（或以平均资金利润率为根据而制定的利润指标）外，还有其他各种指标，但那也不过是虚有其名而已，因为这个先验的平均资金利润率指标，除非巧合，否则不可能和其他各种具体计划指标相衔接。在以资金利润率为衡量企业的先进与落后的条件下，其他各种所谓计划指标一定会被企业弃置不顾，并且为利润而争原料、争市场等等直接冲击国家全盘计划的情况也一定随之出现。这样就根本谈不上企业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因而也就从企业这个方面来破坏国家计划，取消计划经济。相反，国家根据企业具体情况，经过调查研究下达的全面计划，对企业上缴利润指标的规定不是以先验的平均资金利润为标准，而是以具体情况为根据，配合其他各种有关的重要指标制定的，这才能使上缴利润指标与其他各种指标相衔接，有利于计划的全面执行与实现。所以国家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考核，必须是全面的计划指标考核。如果上缴利润指标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而其他一些重要指标还未能完成任务，就还要要求企业在其他方面努力争取完成任务。只有这样全面地对企业实行计划管理，才能巩固和发展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使国家计划的全面贯彻有比较可靠的依据，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全面执行。

用资金利润率来作为评价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最高标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找差距、赶先进，不能不归结为比资金利润率，赶资金利润率。这样把追求利润作为生产的目的来指导企业活动，只能助长盲目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向的发展，其实质是以资本主义原则来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把企业引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与社会主义的企业经营管理原则直接相违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企业经营管理中来。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反对片面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向。我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广泛地深入地开展比学赶帮运动，但决不是以比资金利润率高低为主要内容，而是要进行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政治和业务相结合的全面的社会主义竞赛。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开展着的五好企业、五好职工竞赛正是这种社会主义比学赶帮运动的表现。一个企业是否先进，要看它的政治工作、完成国家计划、企业管理、生活管理和干部作风这五方面的情况。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完成国家计划任务是一项根本任务；计划完不成，就很难说是先进。而所谓完成国家计划好，则应包括了国家计划的各项重要指标的完成，不能主要看利润指标，更不是以资金利润率的高低为唯一标准。这才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比学赶帮的现实，它必然将促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更好实现。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国民经济迅速地发展，并不因为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中的资金投放不以资金利润率大小为序来安排，企业的经营管理不以资金利润率为主要考核标准，物价不按生产价格来规定，而受到什么不利的影响。生产价格论在这种铁的事实面前，还有什么立脚的余地呢！

論穩產高產農田建設問題

廖 建 祥

自從在我國提出建設穩產高產農田以來，已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和討論。本文着重從物質生產條件的改變上，探究穩產高產農田建設問題。旨在拋磚引玉，不妥之處，希同志們加以指正。

—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使農業產品的產量穩定地不斷地增長，才能更好地滿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農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農業發展水平制約着工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但是，我國現階段的農業生產趕不上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矛盾。幾年來我們貫徹“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農業擺在第一位，工業生產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國家經濟建設計劃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進行安排，等等，大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全面好轉。當前提出的建設穩產高產農田，是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更好地促進農業發展的一項戰略性的重大任務。

何謂穩產？何謂高產？所謂穩產、高產，是和產量不穩定、低產相對而言的。要達到穩產和高產，就要消除農業生產不穩定和低產的因素，創造穩產、高產的條件。什麼是產量不穩定的因素呢？這必須從農業生產過程的特點來加以理解。農業生產是經濟再生產過程和自然再生產過程的結合，土地作為農業的主要生產資料，人們要有效地把它用於生產，就必須對它進行加工，并把植物和動物（畜牧飼養業）當作勞動對象；人們對它進行栽培和飼養的過程，同時又是它的自然生長過程，這些都要受到自然力的影響。在這方面，造成農業產量不穩定的最根本、最普遍性的原因，是水旱自然災害。因此，對生產不穩定的地區，進行抗禦旱、洪、澇災害的基本建設，消除生產不穩定的因素，就能實現旱澇保收，達到穩產。所謂高產，是指土地單位面積上較高的收成。這是比較而言的。就現階段說，產量達到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指標的，就算是高產。我國現在的農田，按其產量高低和是否穩定來分類，有既穩又高、穩而不高、高而不穩、不穩不高等四種情況，其中達到既穩又高的僅占少數，沒有達到穩產、高產的占大多數。因

此，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建設穩產高產農田，是非常迫切和重大的任務。

穩產和高產之間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從長遠看來，沒有穩產，就不能保證高產，穩產是高產的基礎；沒有高產，就不能有效發揮穩產的作用。在建設上，首先要考慮穩產問題，同時又要大力推行各項增產措施，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以實現高產。至於已經或基本上達到穩產的地方，則主要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實現高產、再高產。

將產量不穩定的地區改變為產量穩定的地區，是改造自然條件，戰勝自然的偉大鬥爭。各個地區的農田所處的自然和地理條件不同，所受自然力的影響不同，農業生產不穩定的具體因素也不完全相同。如廣東農業上所受自然災害的威脅主要有旱、洪、澇、潮、咸、風等等。由於自然地理條件不同，有些地方主要的威脅是旱災，有些地方則既受洪、澇威脅，也受旱、風、咸等的不同程度的威脅。要消除這些威脅，就要從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出發，摸清當地旱澇災害發生的規律，從當地水利氣象的歷史資料中，找出科學的數據，提出達到穩產的標準。例如根據目前廣東的情況，實現旱澇保收達到穩產是否可以考慮這樣的標準：防旱——能抗禦十年一遇的災情，需水季節期間灌溉條件足以應付九十天至一百二十天不下雨的旱情，或者以能抗禦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三年旱情為標準。防澇——能抗禦五年到十年一遇的災情，按不同地區達到日降雨量二百至三百公厘不成災。防洪——江河堤圍按護衛一萬畝、五萬畝、二十五萬畝以上面積，分別達到防禦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一遇洪水為標準。防潮——海堤按護衛五千畝、一萬畝、五萬畝以上面積，分別達到抗禦暴潮加八級、九級、十級台風浪高。總之，穩產的標準，要考慮到能以抗禦至少五年到十年期間的旱、澇、洪、潮災害，即保證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年分中，保持生產的穩定，才能認為達到了穩產。雖然這樣的穩產也只是相對的，但作出一個在一定時期內的穩產標準，仍然具有重要意義，這可以作為我們具體進行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的組織工作時考慮問題的標準。在一定時期內，穩產的標準要從實際出發，根據需要與可能，定得恰當，不能過低或過高。標準過低了就不能保證必要的抗禦旱、澇、洪、潮災害的能力；如果標準過高，超過了一定時期內進行建設的能力，則建設無法實現。因而，要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穩產的標準和要求。在經濟建設不斷發展和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的狀況下，我們控制自然的能力，也將不斷加強，農業產量必然要逐步地提高。

二

穩產高產農田建設，是全面發展農業的途徑，是逐步實現農業“四化”的過程，又是系統地、全面地貫徹農業八字憲法的綜合性措施。從農業生產的物質條件看來，決定農業產量能否穩定和高還是低的，主要有四方面的因素：生產的自然條件、勞動手段條件、勞動力條件、栽培技術條件等。這些生產諸條件的質與量及其相互結合，決定着農業的產量。

第一，改善作為生產的自然條件的土地，是實現農業穩產的先決條件。這方面，首

先要解决农田的水利问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稳产首先必须立足在水利化的基础上，才能有根本的保证。解放以来，广东和全国一样，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从全面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小、土、群）为主，整治堤围，到以兴建大、中型骨干工程为主，同时开展小型水利和继续巩固堤围，再进一步发展到大搞电动排灌网等。水利建设由小到大，大中小结合发展，使全省水利条件大为改善，初步建设了一批稳产农田。广东全省耕地五千一百多万亩（农业用地五千五百多万亩），其中水利设备的面积达三千四百万亩，其中保证灌溉面积近二千万亩，已初步达到稳产（高产的仍属少数）。一九六三年许多地区在特大旱灾的情况下取得丰收，是和水利条件的改善分不开的。

水利化既是稳产的保证，又是高产的条件。许多地区由于水利条件改变，就能相应地进行一系列耕作技术的改革。据南海县经验，水利条件改变后，提早了春耕季节；提早灌水漚田消灭虫害；有利于多犁多耙促进土壤肥力；实行了科学排灌及时晒田；对落后田通过挖深加阔渠道和电动排灌等降低地下水位，加上其他措施改良了酸性土壤，获得显著增产；此外，节约了大批车水的劳力，用到积肥和精耕细作方面，等等。南海县由于建立了大批电动排灌站，改善了水利条件，并推行了各项增产措施，一九六三年全县水稻亩产平均达到九百七十二斤，比上年增产二百二十斤，一举跨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标，走上了稳产高产的道路。

在稳产高产农田建设中，只有搞好水利建设，才能保证稳产高产农田建设成功。不仅对于新列入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而水利基础较差的地区需要大办水利，解决水利问题；即使原来已有相当水利建设基础的地区，也还要继续巩固。对于已经建设了一定水利工程的地区，还要进行续建配套工程，同时要加强管理，许多水利工程还可以在原有基础上挖掘潜力，扩大受益面积。这样少花钱，多办事，是最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原则的。对于新建的水利工程，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特别要注意把主体工程 and 配套工程联接起来，一气呵成，以达到迅速收效的目的，避免拖延和旷日持久，影响全面生产的发展。

改良土壤，也是改善农田生产的自然条件、实现高产的重要因素。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客观物质基础。要实现高产，必须有适于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较良好的土壤。由于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下，农民无力改善经营，加上佃权不稳定，贫佃农民也不愿加工加肥，因而土壤越耕越瘦，落后田的比例很大。在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中，改良土壤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这方面包括改进土壤肥力、增加有机质、改良土壤团粒结构、消除土壤毒质、加深耕作层等等，都必须根据各地区土壤的特点，经过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不同措施，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

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等，都是改造农田的自然条件的重要措施。从长期说来，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重要方面，是防洪、防旱，保证农业稳产高产的有效的治本措施。广东地处亚热带地区，气温较高，降雨量多，许多尚未绿化的山岗荒地，水土流失很严重，因此这些地区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工

作显得十分重要。必須把治山、治水、改土和水土保持等工作結合起来，才能使稳产高产农田建設取得巨大的效果。

“水”和“土”是建設稳产高产农田，改造自然条件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貫徹农业八字宪法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建設稳产高产农田，首先就要有计划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設，改造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使农业生产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

第二，改进劳动手段集中，主要是在解决“水”和“土”这些基础問題的同时，逐步改进农业生产手段的质与量，把“肥料”和“工具”更好抓起来，这是实现高产的又一重要条件。“水利”、“土壤”是稳产高产的基础，有了这些基础，如果不把“肥”和“工”的条件跟上去，就不易实现高产。“肥料”和“工具”既是实现稳产高产的重要条件，也是农业八字宪法中两项重要的内容。对实现高产有重要意义。

增施肥料是促进高产的重要措施。俗語說：“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稳产需要一定的肥料，高产则需要更多的肥料。据科学計算，亩产稻谷八百斤，需有二十斤純氮，八斤有效磷，十六斤鉀。目前产量較高的农田，也都是施肥水平較高的。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內，还不可能有大量化学肥料来满足农田生产上的需要，提高肥料施用量的主要出路，还是要靠大量积集农家肥和土杂肥，大力发展綠肥，并逐步增加化学肥料。发展养猪积肥是增加农家肥的最重要方法，据計算，每头猪一年的粪尿以二千斤計，含氮量就相当于五十斤硫酸銨。推广綠肥种植可以固定空中氮素，提供大量氮肥，增加有机质，是实现“以地养地”的良好措施。以冬种綠肥紫云英計，如亩产二千斤，其含氮量就相当于硫酸銨四十八斤，并且有大量有机质。在目前阶段，依靠人工积肥（包括养猪）为主来解决肥料，是实现高产的重要方法。今后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使用化学肥料的比重将逐渐提高，进而达到以化学肥料为主，农家肥、自然肥为輔，走向化学化。

由工具改革和不断增加机械，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是一个較长的过程。在目前阶段，仍須大力改进生产工具，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高产。改良工具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消耗。机械化、电气化更有难于比拟的高功效。在稳产高产农田建設中，既要注意解决各种大、中型改良农具的需要，同时又要尽可能地逐步增加农业机械。如在广东的大沙田区、大粮产区等耕地較多劳力相对不足的地方，就需要满足农艇、屙泥艇、脱粒机等工具的供应，同时尽可能逐步增加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械。这些地方使用拖拉机不仅大大加速了翻土耙田的进度，解决人力畜力的紧张，赶上季节，促进耕作制度改革，而且也提高了工作质量，使产量显著提高。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畜力和手工农具将主要地和逐步地为机械动力和农业机械所代替；而农村电力网的发展，还将积极发展农村电力的綜合利用。稳产高产农田建設，将使水利化和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更好結合起来，使建設获得更大的成果。但目前阶段在建設上还須“机、牛結合”，半机械化、机械化、改良农具相結合，而以半机械化、改良农具为主，这是由当前工业生产水平所决定的。因此既要有长期努力的

目标，首先把建設稳产高产农田地区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点，但又不能好高骛远，离开了現阶段的实际条件放松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不努力进行工具改革，只是追求高标准的物质技术条件，这样就不能迅速达到建設的目的。稳产高产农田建設中物质生产手段不断改进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农业建設逐步向“四化”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农业集約化的过程。

第三，改进农业耕作技术，提高栽培技术水平，是实现高产的重要因素，也是貫徹农业八字宪法的“种”、“密”、“护”、“管”的中心措施。在改造“水”和“土”的农业自然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肥”和“工”的条件，同时又提高“种”、“密”、“护”、“管”的全面的栽培技术水平，使农业八字宪法得到系統的全面的貫徹，将使稳产高产农田建設得以胜利实现。

因此，稳产高产农田建設，必須把提高栽培技术水平摆到一个重要地位，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提高栽培技术水平，不仅是运用已經掌握的作物生长規律的过程，而且有效地运用物质技术条件，向自然界索取更高产量的技术过程。客观物质条件要通过人們善于处理运用，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化学肥料是重要的增产条件，但是如何施用化肥，才更能促进作物的生长以达到較高的产量，則是重要的技术問題。不同的稻田上施用同样多的化学肥料，但是由于施用方法不同，如在作物生长前期或后期施用，用作基肥或追肥等等，效果会不相同。有的显著获得增产，有的增产不多甚至出現倒伏。在同样水利化的条件下，如何掌握作物生长的用水需要，实行深灌、浅灌、晒田等等，对作物的生长发育都十分重要。这些栽培技术問題，对产量的提高有着重大的影响。

栽培技术是人們从生产斗争中掌握作物生长規律的結果，是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我国在农业生产上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一套精耕細作的經驗。但是，原有的栽培技术虽然具有許多优点，却是在小农經濟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帶有很大的局限性。解放后特別在农业走上集体化道路以后，在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条件下，一方面继承了精耕細作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在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对农业增产起了很大作用。广东省水稻产量最高的潮汕平原地区，也是全省和全国水稻的栽培技术水平較高的地区。那里不仅有着精耕細作的传统，而且在以良种为中心的栽培技术改革方面也有比較全面和成熟的經驗。

提高栽培技术水平，必須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推广現有的先进的栽培技术經驗，这是提高栽培技术水平的中心环节，对提高产量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如广东省各地在学习潮汕地区水稻的先进技术上，在育种、排灌晒田、施肥、田間管理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差距，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是促进高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农业四化也要和提高栽培技术密切結合起来。四化是为农业增产服务的，因此机械化、电气化都要有利于精耕細作；随着农业生产物质技术条件的改善，人們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条件，来进一步提高栽培技术水平，更好地促进农业的耕作栽培技术改革，以促进产量的提高。

第四，改进劳动力的条件，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作用，是稳产高产农田建设取得胜利的极端重要的因素。劳动力是生产力当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建设稳产高产农田最重要的条件。要实现稳产高产，就要改造生产的自然条件，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都需要投放大量的劳动力才能实现。要实行精耕细作，就要在土地上更细致地进行加工，要有更多的劳动量来从事耕作。

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下较多的活劳动，就可以获得较高的产量。农业生产上所谓“加工加肥”，所指加工就是在作物栽培中投下较多的劳动量，把耕作搞得更细致，实行精耕细作。广东水稻种植在不同地区所花的劳动量有很大不同。有些地区每亩水稻一造的生产从播种育秧到收割，包括秧田管理、犁田耙田次数、中耕施肥、田间管理、排水灌水等等，用工在三、四十个劳动日，而有些地区物质技术条件相同，用工只二十多个劳动日。通常用工较多的地方，也就是耕作较细致、农业技术水平较高、产量较高的地方；用工少的地方，也就是耕作粗放而产量较低的地方。当然，不同地区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种植某一种作物投放劳动量的多少，是由多种原因所决定的。在同样物质技术条件下，它首先由当地现有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的多寡（还包括劳动力在农林牧渔副各种项目的分配使用），来决定投放劳动量多少的可能性，同时对种植某种作物的历史习惯和栽培经验有极大的关系。我国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全国每人平均耕地只有两亩多，而广东全省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多耕地。目前农业生产上用工较少、耕作粗放的地方，有些是由于耕地较多，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面积较大；但大部分是没有充分挖掘现有劳动力的潜力，或者是由于落后保守思想的障碍，不去改变原有的粗放的耕作方法，不更多地在地上进行加工，因而产量难于提高。

稳产高产农田建设，必须妥善地处理基本建设和当年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和安排。为了使农业的生产条件获得根本的改善，一定要因地制宜地、尽可能地投放适当数量的劳动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但是用于基本建设的劳动力，也不能过多，以免影响当年农业再生产的进行。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挖掘劳动力的潜力，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健全生产责任制，保证农活质量，使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起来。广东省许多有名的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是从原来贫困落后的状况，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充分发挥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人们长期的辛勤劳动，改造了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从而改变了生产和经济面貌，走上了富裕和先进的道路。

当然，从长远看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四化的实现，农业生产的“技术构成”将显著提高，手工劳动将更多地被机械化、电气化所代替，生产过程中活劳动量和过去劳动量比较，比重将显著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条件就不重要了，而只是对劳动力的质量要求更高了，需要具有操纵新的生产工具掌握电气化、机械化的技术水平，才能胜任农业的生产操作。需要不断培养训练大量有文化和有技术知识的新的农民，以适应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这也有利于逐步地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

別。与此同时，随着物质技术装备的完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力的消耗）将逐渐减少。

综上所述，稳产高产农田建设，是全面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工作。必须把改善农田的自然条件，和改进物质技术设备条件，以及提高栽培技术水平，改善劳动组织挖掘劳动潜力，发挥劳动力的作用等方面，全面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生产条件的作用，收到稳产高产的效果。在建设进行上，首先要解决自然灾害的问题，实现旱涝保收取得稳产；在实现了稳产的地区，则必须逐步改进物质技术条件和提高栽培技术水平，对于已经实现稳产而且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地区，尤其要把提高栽培技术水平摆到重要地位，以达到高产、更高产。

三

把我国现有十六亿亩耕地的绝大部分都建设成为稳产高产农田，是更好地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措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必须采取分期分批建设的方针，建好一批，再发展一批，有步骤地去完成。如果不分主次，齐头并进，就难于达到建设的目的。目前我们投入稳产高产建设的农田，只能是少数的农田，一般农田仍占多数。因此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和一般农田，是点和面的关系，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列入建设稳产高产的农田是先行部分，一般农田是后续部分，一般农田将分期分批地或先或后地转为稳产高产农田，因此，必须妥善处理稳产高产农田和一般农田的关系；要从全局出发，在种好管好全部农田的基础上，建设稳产高产农田。我们的生产方针是多种、高产、多收，不是少种、高产、少收，因而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就决不允许放松种好管好一般农田的工作，否则就不能达到农业总产量不断增长的目的。有人把稳产高产农田与一般农田的关系看作“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关系”（见《江汉学报》一九六四年第五期第十一页），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社会主义农业必须不断实行扩大再生产，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如果绝大部分的一般农田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仅靠稳产高产农田实行扩大再生产，那就很难实现农业的全面增产，而且这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我认为稳产高产农田和一般农田，在扩大再生产上，应该理解为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大小的不同，不能看作是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关系。在处理稳产高产农田和一般农田的关系时，要从全局着眼，在财力、物力、技术力量的分配使用上，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这样才能既达到全面增产，又能把稳产高产农田分期分批建设起来。

稳产高产农田建设是从小到大、由少到多地发展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只是部分地方和少数公社的任务。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是一切地方和一切公社的任务。每个地方、每个公社以至每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要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从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规划和指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建設。而國家的投資，必須重點使用，首先要選擇條件較好、生產潛力較大、經過建設能夠較快地成為提供較多的商品糧食、工業原料和副食品的基地，作為國家建設的重點。這樣才能達到投資小、收益大、見效快的目的。對於那些雖然不高產、但潛力大、商品率高的地區，也應該考慮作為建設的重點。至於那些困難較大，需要長期進行較大規模的建設才能收效的地區，則應該首先摸清情況，擺到後期進行建設。這是發展農業生產和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最正確的原則。

穩產高產農田建設必須採取集中兵力打歼滅戰的方針。首先要選擇好地區，然後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有計劃地進行建設，不能把面鋪得太廣。分散力量，則不能達到“全歼”、“速決”的目的。如廣東抓住水利條件較好或已有相當基礎（如已建設水庫或電站）的地區、潛力較大的商品糧基地和主要經濟作物產區作為建設的重點，對全省農業情況有決定性的影響，是符合打歼滅戰的精神的。

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地建設穩產高產農田，是多快好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路線和方法。我國現階段的農業主要立足於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國家全民所有制經濟必然會大力支援農業以促進農業的發展，但國家的建設資金有限，而要興辦的事情又很多，對農業建設的投資，只能把主要力量放在重點的水利骨干工程、電站建設，以及在農業機械、化學肥料、農藥和其他生產資料的製造與供應方面。發展農業的資金、人力等等，主要依靠集體經濟本身的力量，依靠集體經濟的內部積累。因此，發揚自力更生精神，以集體經濟本身力量為主，國家支援為輔，是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的正確道路。廣東各地有着許多依靠群眾力量，經過多年艱苦奮鬥，終於徹底改變了惡劣的自然條件走向穩產高產的動人事例。如東莞縣的茶山公社，原是“十年九不收”的老災區，由於充分發動群眾，依靠自身力量，由一九五八年起一連六年艱苦奮鬥，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和一批電動排灌站，建設了穩產高產農田，一九六三年取得大豐收，由缺糧社變成余糧社，交售國家稻穀達一千一百萬斤，幾乎等於一九六〇年的總產量；而且隨着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社員每人平均分配收入達到一百五十一元，成為由窮到富的典型。四會縣清塘公社芙蓉大隊原是個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低產大隊，水土流失嚴重，周圍都是禿山崩岡，山水沖刷紅土淤塞河道，河床高於農田一兩公尺，稻田還有鐵銹水、冷泉水、酸性水等毒質，危害很大，因而產量很低，收入很少。一九五七年較好的年成仍要國家統銷糧食。經過五年來群眾的艱苦奮鬥，治山、治水、治土，改造低產田，進行了大批的基本建設工程，如開渠道，筑攔河壩，修谷坊，開山塘，挖魚鱗坑、品字溝、環山溝，改良土壤等等，已經戰勝了窮山惡水，改變了地瘠人窮的面貌。這些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改變自然條件，達到穩產高產的例子很多，舉不勝舉。

因此，建設穩產高產農田，必須掀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使廣大幹部和群眾深刻認識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的重大意義，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建設。每個生產隊根據本身自然條件和特點，具體規劃，分批分片進行建設，建設好一塊田，就是一塊田，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要做好這個工作，一方面隨着集體經濟的發展，集體單位要逐步積累資

金，用以发展农田基本建设和增添、更新生产资料和设备；另一方面，主要是充分发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以劳动力去解决积累问题，进行基本建设。我国是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许多地区劳动力有剩余，农闲季节劳动力的潜力更大，群众具有勤劳勇敢的特性，这正是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最有利的条件。而且我国原是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水平仍然不高，因此生产建设上就不能过分强调物资技术设备的条件（当然这是不可少的条件），而应该充分发挥我们双手的作用，用人们双手的辛勤努力，改造自然，战胜自然，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稳产高产农田建设，必须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精神，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建设工作顺利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伟大革命运动，是紧密相结合的。阶级斗争的胜利，是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这样一个艰巨而伟大的生产斗争，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一个由贫农、下中农组成的阶级队伍作为依靠，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基础，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改造自然条件是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需要发挥干部和社员的坚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才能实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投资和进行扩大再生产，都关系到积累与消费，关系到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必须有热爱集体和长远打算的思想，才能正确处理积累与分配的关系，使建设工作更好地推向前进。耕作技术改革必然引起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之间的斗争，不通过深入的思想工作，同时使先进技术方法经过试验、示范和推广，克服落后保守思想的障碍，技术改革工作就不容易胜利进行。总之，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必然会在群众中展开一场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同时还有先进思想与落后保守思想之间的斗争，这些都只有在坚强的领导核心底下，树立起贫农、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并在这基础上认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思想第一，抓活思想，活典型，才能既保证两条道路斗争中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又在技术改革和生产斗争中克服落后保守思想的障碍，使先进思想占居上风，正确的建设措施变成群众性的自觉要求。阶级斗争促进生产，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目前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社会主义道路将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将大大提高，集体经济将益趋巩固和壮大，稳产高产农田建设必然将取得日益丰硕的战果和取得胜利的保证。

略論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的 起源及其在馬克思价值理論体系中的地位

萧 步 才

关于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有过一个很明确的說明：“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則是用社会現有的标准生产条件，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時間。”^①但学术界有一些人认为，商品价值量决定于上述这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以下簡称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只是馬克思把社会对商品的需要量加以含象时的規定，如果把社会需要量和商品的供給量这些因素加以考虑，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就不能只以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为限了，还要看为了把社会所需要的、某一部門（例如麻布）产品的社会需要总量生产出来，在社会总的劳动時間中按比例必須分配到該生产部門去的必要劳动時間（以下簡称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尽管持这样主张的人并不直截了当地說商品的价值就是决定于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而是說什么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統一决定价值等等，但实际上所謂統一决定与只由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来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沒有区别的。关于这个問題，駱耕漠同志在《光明日报》1964年5月11日的文章中已有指出，在此不贅。

以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来决定价值的主张，和以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来决定价值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举个例子來說，那就是：假設社会对麻布的需求为十亿公尺，每生产一公尺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为一小时，那么社会必需分配去生产麻布的总劳动時間就應該是十亿小时。如果社会对麻布的需要沒有变化，但麻布的总供应量增加了一倍（变成二十亿公尺了），那时麻布的总价值到底是多少呢？依第一种涵义的来决定，它應該等于二十亿小时，因为既然假定生产一公尺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为一小时，那么生产二十亿公尺麻布，当然就需要二十亿小时。但若依第二种涵义的决定，則因需求沒有变化，把麻布的社会需要总量（十亿公尺）生产出来所必須分配到麻布生产部門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十亿小时）仍然不变，所以麻布的总价值并不会增加到二十亿小时，仍然为十亿小时，于是每一公尺麻布的价值就相应下降为半小时劳动量。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10頁。

馬克思曾經在多处論述过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①，但是他有沒有用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来决定部門产品的总价值呢？這個問題，从上个世紀末起，几十年来是断断续續有爭論的。爭論的焦点过去是，現在仍然是：供求这一因素在馬克思主义价值理論体系中摆在什么位置？供求对价值量的决定到底有沒有关系？本文仅仅想探索有关這個問題的一个方面，即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在学說史上的起源，以及它在馬克思主义价值理論体系中所占的地位。

—

在政治經濟学說史上，第一个提出相当于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的內容的，是法国古典政治經濟学創始人布阿吉尔貝尔。他曾經这样說过：“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須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協調，才能使它們共同存在，时时刻刻能互相进行交换，时时刻刻能互相重新生产……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貧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謬誤。”^②馬克思在論述商品分析的历史时写道：“布阿吉尔貝尔就他这方面來說，虽然不是有意識地，但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結为劳动時間，因为他用个人劳动時間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門間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說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③布阿吉尔貝尔在这里形式上是从消費需求的角度、从部門产品而不是个别产品的角度来談問題的，很有一些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决定价值論的味道，但是他实际是說，如果自由竞争存在的話，商品交换應該是等价交换，即等量劳动的交换。正因为如此，他特別反对貨幣。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商品的真正价值是相等于另一个耗費同样劳动的商品，而貨幣則偏偏破坏了这种比例，即破坏了交换的等价性。換言之布阿吉尔貝尔看到商品的真正价值和它的貨幣表現（市場价格）經常是不相等的。

显而易见，布阿吉尔貝尔虽然提出了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的萌芽，但他却不是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决定价值論者，因为如果布阿吉尔貝尔是有意識地要用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来决定其“真正价值”的話，那他應該得出价值会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价值始終与市場价格相一致的結論，而不應該譴責貨幣，尤其沒有理由譴責貨幣破坏它的“真正价值”的比例了。

法国古典政治經濟学的終結者、小資產階級經濟学創始人西斯蒙第，进一步发展了布阿吉尔貝尔的“真正价值”学說。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在同李加图的直接論战中不仅強調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而且指出：‘我們經濟进步的特征’在于把价值量归結于必要劳动時間，归結于‘全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滿足这种需要的劳动

① 見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98頁；第3卷，第10章及第837頁。《剩餘价值学說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224—225頁；第2卷，第628—629頁。

② 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4卷，第108頁。

③ 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3—44頁。

量之間的比例’。”^①可以看出，西斯蒙第在这里已經初步奠定了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这一概念的基础。当然，他并不懂得劳动二重性。

西斯蒙第的那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把它理解为现实的价值量的决定原則，那么西斯蒙第便不只是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这个概念的奠基者，而且是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决定价值論的創始者了。然而这样的理解是与西斯蒙第的学說体系相矛盾的。西斯蒙第断言資本主义的盲目扩大再生产使生产与消費脱节，終於使經濟危机成为不可避免，原因是购买力不足，有些商品的价值无法实现。如果商品价值是由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决定的，当市場有效需求减少了的时候，商品本身的价值量也比例地下降了，购买力少于待实现商品价值的問題是不会发生的。可見西斯蒙第在这里談的并不是现实的价值量如何决定問題，而是談論价值量在理想条件下应当如何决定的問題。关于现实的价值如何决定的問題，西斯蒙第有过明确答案，他說：“交换价值归根到底总是由取得这种东西所必要的劳动量来确定，但不是实际花費的劳动量，而是在今后生产資料可能改进的情况下将要花費的劳动量。”^②換言之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其次，生产适合于需求的情况，不过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他把这說成是“我們經濟进步的特征”。这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恰巧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他看来不是資本主义比小生产进步，而是小生产比資本主义更加理想得多。此外还有一个旁証，即布阿吉尔貝尔认为貨幣是破坏等价交换的罪魁，因此他反对貨幣；而西斯蒙第知道罪过不在于貨幣，他认为資本主义大工业才是罪魁，因为大工业是与竞争和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相联系的。所以馬克思在轉引西斯蒙第上述那句話之后紧接着就指出：“布阿吉尔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貨幣弄得虛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点所束縛，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貝尔非难貨幣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資本。”^③

总而言之，布阿吉尔貝尔特別是西斯蒙第，他們最先从消費需求的角度來說明創造价值的劳动，他們是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这一概念的最初奠基者；他們表面上都很象是以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来决定价值，实际上他們只是主张生产应当服从于需要，价值量应当决定于适合于需要时所花的劳动時間，即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但是他們并不认为价值在实际上是由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来决定。他們对劳动价值学說的貢獻不是因為他們是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决定价值論者，而是因為他們在法国論証了价值由劳动時間决定的原理，說明了商品要按照它的价值量出售必須是供給适合于需求，即用另一种說法来表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这一思想。

① 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頁。馬克思这些关于西斯蒙第价值学說的引文，摘自西斯蒙第晚年著作《政治經濟学概論》（1838年）。在西斯蒙第的最重要代表作《政治經濟学新原理》（1819年）一书中，西斯蒙第明确地把需求只与市場价格相联系（參閱該书第76、80、84、187—189、278等頁，商务印书館1964年版）。

② 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7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頁。

认为实际上价值就是由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不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而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

二

马克思批判继承并最后完成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首先提出的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他并没有利用它来决定价值，只是利用它来说明价值的实现。

马克思在谈到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时，早就指出：“商品的价值量，表现为一种必然的，内在于商品形成过程中的，对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价值量转化为价格时，这种必然的关系也就会表现为一种商品和在它外面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率。但是这个比率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这更大或更小的量。在一定情形下，该商品会按照这个更大的或更小的量来让渡。价格和价值量发生数量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说价格和价值量发生差距的可能性，为价格形态本身所固有。”^①可见价值怎样产生、怎样被决定是生产过程中的事；已被决定了的商品价值能否或在什么程度上被实现（表现于价格）是流通过程中的事。这种商品是否为社会所需要或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所需要，不是在生产过程而是在流通过程中才被确认的，所以从消费需求观点出发的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能与商品价值的实现有关。如果说它可以决定商品价值，那就恰巧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同资产阶级的“供求论”等庸俗价值理论之间的界限，并且接着必然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似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无法销售的商品，它们并不是价值从而剩余价值无法实现，而是根本就没有创造价值。这样跟着来的结论就是：既然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没有创造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在内），也就谈不上被剥削了。这无论如何不能是马克思的观点，那是很明白的。

关于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笔者赞同骆耕漠卫兴华等同志认为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与价值实现有关的观点。这里想补充的只是马克思把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用于说明价值实现的历史过程及其在劳动价值学说史上的重要意义。

从价值学说发展的历史来看，区分市场价格变动的暂时原因和极终原因，也就是区分价值和市场价格，这是马克思与英国古典学派相同而与“供求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资产阶级庸俗价值学说相异的重要特点。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不是主张全部抛弃价值论，便是把价值与价格的区别变得面目全非，实际上就是取消价值作为市场价格变动的中心这一概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显然跟庸俗经济学有所不同，无论是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或大卫·李嘉图，他们的价值论都以一定的供求关系为前提，把供求变动只视为市场价格变动的暂时原因。他们的价值决定理论恰巧是以寻求与受供求影响的 市场价格有区别的自然价格为特征的。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般只满足于这样的说明：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80—81页。

在某一商品供过于求时，市場价格因卖者相互竞争必然下降；反之，求过于供时，市場价格則因买者之竞争必然上升。究竟市場价格下降到什么程度？上升到什么程度？他們并未能予以科学的說明。能够給予科学說明的只是馬克思。馬克思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在我看来，那正是批判地吸收了法国古典政治經济学中关于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的理論，并把它加以改造，运用于說明价值实现的緣故。

英国古典政治經济学提供了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这个概念的基础，法国古典政治經济学則提供了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这个概念的基础。但这些基础都只是包含有某些科学的合理因素而已，它們原来并不完整。馬克思在这方面的貢獻，就在于他在科学地揭示和說明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完成了它們，把它們联系起来，用它們来分別說明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从而完成了劳动价值学說的严密的科学体系。

三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論述他的价值理論时，确实是把商品的供求关系加以舍象的，但并不能认为他在写作《資本論》第一卷时还没有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这个概念。因为就在《資本論》第一卷，甚至更早一些的著作如《政治經济学批判》中，也已經可以找到有关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的一些論述了，并且还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把它与价值实现問題相联系的。特别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作为一个劳动价值論者，早在1847年所写的第一部經济学巨著：《哲学的貧困》，就是以批判蒲魯东的类似以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决定价值論为其重要內容之一。

一八四七年写的《哲学的貧困》一书，是馬克思作为馬克思主义者与蒲魯东及其他空想家划清了界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馬克思在这本书和同年写的《雇佣劳动与資本》那本书里肯定了李加图的劳动价值論，闡明了李加图价值学說的真正意义，指出市場价格围绕价值而波动不是对价值規律的破坏，恰巧是价值規律在私有制社会里实现它自己的必然形式。市場价格有时高于有时低于价值，这一点英国古典政治經济学家早就指出过，但是他們并不了解价值与价格波动之間的內在联系，馬克思在这方面的貢獻是：揭露了价格波动机构的特殊的历史性质，指出价格围绕价值而波动的必然性是私有制下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决定的，它反映了商品生产的矛盾，又进一步使这些矛盾尖锐化。

《哲学的貧困》給予在工人运动中散布小資产階級反动幻想的蒲魯东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蒲魯东自称有个“伟大的发现”，即发现了“构成价值”或“綜合价值”，又名之为“比例的价值”。什么是“构成价值”呢？据說由耗費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所决定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方构成的綜合体（换言之，这时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已被社会承认了的財富），所以可称之为“构成价值”或“綜合价值”。又因为这种价值好象是由按需求比例分配在各个不同生产部門的劳动构成的，因此又叫做“比例的价值”。不难看出，蒲魯东的“伟大发现”不外是在劳动决定价值的幌子下，混同价值与

市場價格，以價值實現代替價值決定，以第二種涵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偷換第一種涵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把被市場所認可的價值即實際市場價格，稱之為“構成價值”，以便把資產階級學者說過千回萬遍的供求論與勞動價值論糅合起來，冒充為最新發明的“革命”理論而已。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的“構成價值”論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其實是供求論。蒲魯東說：“甚至也應當注意，如果君主不偽造錢幣，但有权把錢幣的數量增加一倍，那末金銀的交換價值由於比例性和均衡的原因，立刻會跌價一半”。馬克思就此指出：“如果蒲魯東先生和其他經濟學家們的這個共同觀點是正確的，那末這也只是有利於他們的供求學說，對蒲魯東先生的比例性卻完全無補。因為根據這個觀點，無論在雙倍的金銀中包含的勞動量如何，只要需求不變而供應增加一倍，那末金銀的價值就會跌價一半。也許‘比例規律’這一次是偶然和很受輕視的供求規律一致起來了吧？蒲魯東先生的這個正確的比例性的確伸縮性很大，隨時都可以變化、配合和移項，下一次很可能又和供求關係一致起來”。^①

馬克思就薩伊利用李加圖貨幣數量論來攻擊李加圖的勞動價值論而發表評論時，再次批判了蒲魯東，他寫道：“我說，這些被讓·巴·薩伊當作價值完全由供求確定的例子的貨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就成了由勞動時間來構成……價值的Par excellence（最好的）實例。”^②

從以上的引證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明確地批判蒲魯東的類似第二種涵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論。

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開始形成，但是並未充分發展，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才是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已經形成了的標志。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並沒有預定專門探討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價值的問題，但是順帶提到它的地方還是有的。馬克思說：“交換價值（價值）和價格的差別，一方面，似乎只是名義上的，……。另一方面，這個差別決不是單純名義上的差別，因為實際流通過程中威脅着商品的一切風暴正是集中在這個差別上。……1夸特小麥（假設它是30個工作日的產品）能否象它的價格所預先標明的那樣事實上變成1盎斯金（假設它也是30個工作日的產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證明。這就要看它能否證明自己是使用價值，能否證明它所含的勞動時間量是社會為生產1夸特小麥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包含在商品中的特殊的個人勞動，必須通過轉移的過程才表現為它的對立物，表現為無個性的、抽象一般的、並且只有在這種形式上才是社會的勞動，就是說表現為貨幣。”^③

有人認為上面那段話指的是價值形成過程中個人實際投下的勞動時間不能決定價值，必須轉化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後才能決定價值。其實這是誤解，因為馬克思在這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4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6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9頁。引文內的方括弧及其內文字，是引者加的。

里不是談价值形成而是談价值与价格的差別談价值的貨幣表現，即談价值實現。筆者認為上面那段話里所說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就是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馬克思在这里利用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來說明价值實現，那是很清楚的。

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論在《資本論》这部巨著中得到了最完善的发展。在《資本論》三大卷及第四卷——《剩余价值學說史》中，馬克思不只是一般地談到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而且列举实例說明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如何决定着价值實現的界限^①。这些已用不着筆者在这里來介紹了，因为每篇爭論的文章不論正面反面都要轉引它們，因而是大家所十分熟悉了的。

總而言之，馬克思用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來決定价值量，用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來說明商品价值實現，这在劳动价值學說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來龍去脈相當清楚，它符合客观实际，因而既符合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原意，也符合馬克思主义的經濟理論体系。

广东史学界討論关于評價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

十月二十九日，广东历史学会邀請了广东部分史学工作者三十多人举行座談会，就当前史学界評價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交換了意見。

在会上發言的同志，分析了罗尔綱同志把李秀成这个叛徒考証成“苦肉緩兵”的英雄，是采取了一种“大胆假設，小心求証”的資產階級实用主义的方法。罗尔綱同志提出，不應該首先根据《李秀成自述》來斷定李秀成投降的說法，而倡言要以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提出的所謂一條教人理解历史人物“有所为而言”的“理論”为指导，用“探微索隱，闡幽發潛”的方法來研究李秀成，这样李秀成从“乞降保命”出发的、对革命力量采取“剿”与“撫”两手的反革命策略的“招齐章程”，便經過罗尔綱一番苦心的“探微”工夫后，竟被譽之为“圖謀复国”的“苦肉緩兵”的具体計劃了。这是主观唯心主义历史研究的一个标本。这种資產階級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是与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論完全对立的。

有的同志还着重分析了一川等人提出的“功过”論，指出他們不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評價李秀成，而是把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綱同志两种鮮明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观点調和折衷起来，說什麼对李秀成的一生，既“不要尽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煞”，即既要承認他是叛徒，又要承認他是英雄，而且英雄是主要的一面，还说只有这样，才是全面的評價历史人物，否則就会片面。一些同志指出，这种貌似持平之論，实际上是抹煞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本对立，也就是“合二而一”思想在历史研究中具体的表現。有些同志还指出，在重新評價李秀成的爭論中，有些人把叛变革命說成是农民階級的局限性，持这种論点的人，实际上是采用了詭辯的手法，用个别代替一般，把农民革命中个别敗类的背叛革命的行为扩大为农民革命中的一般现象，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發言的同志指出，在罗尔綱同志等研究和評價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上所暴露出來的錯誤观点，都是与无产階級的世界观和方法論根本对立的，它必然走到历史研究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的反面。因此，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只有正确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論，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才能进一步提高历史研究水平，發揮历史科学的革命作用。（景）

^① 參見馬克思：《剩余价值學說史》，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卷，第224—225頁。

刘节先生的历史研究是为誰服务的？

杜 式 文

我們主张历史研究要古为今用，刘节先生也大談历史研究要古为今用，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却是根本对立的。我們主张古为今用，是要坚持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則，而刘节先生大談古为今用，只不过是歪曲历史，借古非今，企图在历史研究的幌子下，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論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論，为资产阶级复辟提供“理論”武器。如果說，他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孔子的“唯仁論”》、《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①等文，还頗費苦心地涂上了一层“保护色”，那么，他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②和在广东历史学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的座談会上的发言^③就更明白地道出了他的这种“史意”。因此，对于刘节先生所頑强宣扬的人性論观点，必須展开进一步的討論和批判。

現在，我們就来看看刘节先生在历史研究的幌子下干的是什麼勾当，他的人性論是什麼貨色，这种人性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到底起的是什麼作用？是为誰服务的？

刘节先生借历史研究之名，行販卖人性論之实，

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刘节先生說：“我是研究历史的，对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熟視无睹。”这话本来說得不錯，真正的历史的优良传统，自然“不能熟視无睹。”但是，对于历史的优良传统同对待其他的社会現象一样，都有一个阶级立场的問題，即用什么阶级的观点，从什么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問題。既然刘节先生是从这里提出問題的，那末，我們就来具体地考察一下刘先生所“不能熟視无睹”的“优良传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而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宣扬这个“传统”的。

① 刘节先生的上述三篇文章，分別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第3期和1963年第1期。

② 載《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

③ 載《学术研究》1963年第5期，第106頁。

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刘先生就已经有意識地避开“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而說什么“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刘先生意識到如果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来研究中国思想史，那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地用階級斗争的綫索来研究中国思想史。这显然不是刘先生研究历史的目的。所以，他才“从另外一个角度”，把一部中国思想史歪曲成什么天道、人道、天理、人理、天性、人性、自然規律（先天人性）、人为規律（后天人性中的恶性）等乱七八糟的“天与人合”或者“人与天合”的一种先验的理性的东西，其中心綫索就是如何从“天性”中追回“人性”，或者說从“人性”中追回“天性”，以达到“人性”和“天性”的“合一”，亦就是去掉人性中的某些“恶性”，恢复和发扬人性中所固有的“善性”，使后天人性和先天人性达到“合一”。刘先生說：“‘人性’本来是出于天性而与‘天性’相協調的，‘人道’本来也可以与‘天道’統一起来的，就在人与自然相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許多不合理的人事与制度，造成天人交相胜的糾紛。問題就在必須克服主观方面的缺陷，才能‘哀乐不失’，这样呢，‘人性’与‘天性’就可以有統一希望”，达到“天人合一”；而“这一时代，必須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这样，刘先生便极其巧妙地把一部中国社会的階級斗争史，描繪成一部人性发展史，从而臆造出一条根本排斥和否认階級斗争的所謂历史規律，这条規律就是：中国社会根本不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因此，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以及最后由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都不应当通过階級斗争，通过彻底消灭階級和階級差别，而是不分那一个階級的人，都是如何从“天性”中追回“人性”，或者从“人性”中追回“天性”，即通过人性改良便可以如此这般地进入所謂“共产主义社会”了。如果說，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还只是轉弯抹角地把这个意思說出来，那么，他在座談会上的发言，就說得比較明白了。他說：“人性論就是要使人类社会合于理性，使社会成为人类理性的体现。……社会主义是人性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合于理性的最后体现。所以我的 人性論不仅不反对社会主义，相反的还可以帮助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和发展。”^①这和上面說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原来刘先生“不能熟視无睹”的“优良传统”，正是这种从历史垃圾堆里检起来的腐朽反动的资产階級人性論，而在透过他的所謂古代历史研究表現出来的时候，就把这种人性論涂上了一层中国封建道統的性命之說。可見，刘先生之所以要撇开馬列主义理論来研究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不过是要按照资产階級世界观来設計一个改造世界的“蓝图”，这个“蓝图”就是从资产階級人性論出发，妄图以他的人性改良来实现他的“共产主义”。而他的“共产主义”实际上不过是資本主义的同义語。

随后，刘节先生在《孔子的“唯仁論”》这篇文章里，又随心所欲地抽去孔子学說

^① 載《学术研究》1963年第5期，第106頁。

的階級內容，使孔子服务于他的人性論观点。例如，他把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的“礼”，說成就是“协于天地之性”的“理性”，而“‘礼’（理性）是各种社会共行之秩序”，以“理性”为基础的“仁”，又是根源于“人类之爱”，“其出发点是爱人”。所以，“孔子的‘唯仁論’，实在是一种如何培养对人类伟大感情的教育哲学”。经过刘先生的这一番“研究”，孔子学說就好像不再是反映当时一定階級的政治思想，为一定階級的政治服务，而是一种超階級超时代的永恒的“人类之爱”和永恒的“理性”了。据刘先生說，它不仅适用于过去，而且还适用于現在，它不仅一般地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有用之物”，而且“仁的伟大处：小可以为学，中可以交友，大可以治国”。一句話，刘先生认为在我們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以孔老夫子的“仁”为指导思想，亦即是用封建道統性命之說包裹起来的資產階級人性論为指导思想。

刘节先生在尽情宣扬他的人性論的同时，还极力指責別人不应该用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和階級分析方法去研究孔子的思想，說什么“把古代的历史事件样样都糾纏在階級观点上去，也是不容易搞得通的。”在他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这篇文章里，更不遗余力地反对用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去研究历史，說这样做，就是教条，就是机械；只有用資產階級观点去研究历史，才能够“古为今用”。怎样“古为今用”呢？他从資產階級人性論观点出发，要我們对階級敌人施“仁政”，要我們取消无产階級专政。他說：“如果真正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句話的精神，可能在无形中会减少了許多敌人也不一定。这也不能不算是一种看法吧！”至此，刘节先生的历史研究要“古为今用”的真意，他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最后露出了馬脚来了。

应当引起人們深思的是，刘先生上列各文，主要均写成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之間，即在国际国内階級斗争十分尖銳复杂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所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国内的沒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号召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争，要坚决粉碎一切階級敌人的进攻，而刘先生却在这个时候，在“研究历史”的幌子下，在“古为今用”的掩护下，一方面十分卖力地宣扬他的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一方面公然地指責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論，指責无产階級专政，这难道是偶然的嗎？

我們知道，历史科学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階級的历史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清除意識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发现和說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規律，特别是階級斗争发展的規律来提高人們的認識，进行关于階級斗争的教育；和此相对立的資產階級的历史研究，却是从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千方百計地歪曲和臆造历史，

^① 載《紅旗》1962年第19期。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更企图掩盖历史上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反对当前进行的阶级斗争，为资产阶级复辟服务。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认为，刘节先生在当前的条件下，借历史研究之名，行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之实的所谓历史研究，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刘节先生宣扬人性论， 是为了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里，有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永恒人性，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之中的，所以，人性总是具体的，它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毛主席就曾经清楚地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①

但是，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刘节先生，却持另一种看法，这就是人性根本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是与人有生俱来的，由先天秉赋的超阶级的共有的善良人性。他说：

“‘命’的物性，如果当作自然本质，或自然规律看，应该是有的。‘天命之谓性’，就是指自然所给我们的人性本质，不管看不看见，听不听见，事实是存在的。”这种由宇宙的主宰——冥冥之中的上帝——所赋给人们的人性本质，“是出于天性而与‘天性’相协调的”，且必须肯定这“‘人性’和‘天性’之必为善良的。”正是从这样一种人性论观点出发来考察社会历史，刘节先生便抽去了社会的阶级性和人的阶级性，把阶级社会变成自然社会，把阶级的人变成自然的人，既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的人都没有阶级性，自然就没有阶级对立；没有阶级对立，自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然而，在阶级社会里，尖锐的阶级对立和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刘节先生虽然在主观上想把它抹掉，但在客观上是无法抹掉的。面对着这种历史实际，怎样解释？于是他还是从人性论观点出发，说什么“仁者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如果真正确实是仁”，就可以“克己”，就可以“在巩固以理性指导社会，不以感情鼓动社会的原则之下，朝野共同向前奋进，便是自觉的社会改革”^②，而不会有什么矛盾、斗争了。社会上所以有矛盾、斗争，就在于人们还没有真正做到“仁”，所以便产生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矛盾，清高与卑俗之间的矛盾，有文化的人与没有文化的人之间的矛盾。他说：“所谓‘圣智’是指有个人的‘自觉’，知道有一个自然规律和人为规律的矛盾，而这种原于人类未能真正认识自然规律而掌握这些规律，一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卷，第871页。

② 刘节：《历史论》，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139—140页。

般人就不可能有这种‘自觉’，更談不上天人合一的問題了”。又說：“凡是一个做錯事的人，多半是‘理有所不明，事有所不知’，并非偶然的”。所以，“在封建时代的統治階級，往往因富貴而伤其身，那些貧賤的人，又因为利而累其形”，才造成了混乱。归根到底，这些矛盾都不是根源于剝削与被剝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階級对立，而是由于那些“小人”、“卑俗”的、沒有文化的人未能达到“理性的自觉”，他們的后天人性还不曾做到“仁者”那样的“平靜若水”，“不存一点私見”，而是滲入了一种与“理性”相对立的“慾望”（蛮性），——“这是人性里逐漸添入反乎自然的因素”，“同外界一切接触之后，所学来的”，是“积非成是的因素”^①，于是使“心力上固有蛮性与理性两种力量”^②，产生了先天人性的善性和后天人性所滲入的恶性之間的矛盾、斗争，亦即所謂蛮性和理性的斗争。这样，在刘先生的笔下，历史社会并不存在階級的界限，階級的矛盾和階級的斗争，有的只是蛮性和理性的界限、矛盾和斗争。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刘先生一方面对历史上反抗反动統治階級的階級斗争尽情加以歪曲，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粉碎一切反动階級的进攻的階級斗争表示深恶痛絕，指責这些都是“‘掘泥扬波’，‘伤天害理’，毁灭‘天性’”，指責为这是“在人世間有些政治上負責的人冥行妄作，奋其私智，欲与自然規律爭胜”。认为“凡是混乱、傾軋、斗狠、战争，都是以蛮性为基础”^③的，“社会的改良，若用破坏的方法，是以蛮性对付蛮性，其收效仅及一时，而流毒至于万世，换言之，想用非理性去解决社会事件，是不足为訓的”^④。

刘先生这样公然歪曲历史，无非是妄图抹掉階級对立和斗争的历史事实，以便宣扬他认为“足以为訓”的资产阶级人性論。到底是什么才足以为“訓”的呢？按照刘先生的历史研究，那就是：必須“以理性指导社会……朝野共同向前奋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應該是：（一）提倡个人的道德修养，“克服自己心理上的缺陷”，即所謂“心的质是情，乃就人道言；心的质是气，乃就天道言。再进一步地說，性之体是理，而其用是情。因此，‘緣其理，則知其情’。”这种“緣其理，則知其情”，就是要做到“修身以俟命”，“不要‘猖狂妄行’，不要‘伤天害理’”，并且把“人总是爱自己，爱亲近的人的”“这一点利己心向前推广”，“促进一般人产生‘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心”。这就是說：只要一切的人都努力于各自的道德修养，自然也就不会有敌对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了。（二）提倡超階級的“感情”和“人类之爱”，鼓吹以“仁”作基础的“礼乐”，是代表着不受階級限制、时代限制的超階級和超时代的“人情味”，鼓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原就是‘忠恕之道’，本心出于爱护人”。这种超階級的“感情”、“人情味”和“人类之爱”，是不論什么階級的人都具有的“善良”

① 刘节：《历史論》，第130頁。

② 刘节：《历史論》，第133頁。

③ 刘节：《历史論》，第162頁。

④ 刘节：《历史論》，第166頁。

本性，所以“人类的感情，在一轉念之間便可以為善的，只要自己有誠意。”這就是說，只要一切的人共同擁抱，互相親嘴，當然也就不會有敵對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了。

（三）提倡從個人到社會都必須以理性為基礎，依據“循天之理”的理性原則來協調社會關係，推動社會的“發展”，即所謂“由個人到社會，都必須‘各正性命’，然後才能够在社會上‘保合太和’”；“鼓吹團結人的力量向自然作鬥爭，這是人類社會文化（向）前推進的動力”。這就是說，不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來處理社會關係，不要去揭露社會的階級矛盾，不要去進行階級鬥爭，而以超階級的所謂“理性原則來協調社會關係”，這樣，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封建殘余勢力以及一切牛鬼蛇神都共同團結起來，我們的社會就可以“前進”了。

不言而喻，如果我們以劉先生提倡的這一切為訓，那就會把無產階級的道德與資產階級的道德合二而一，就會把無產階級的感情和資產階級的感情合二而一，就會把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合二而一，一句話，就是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二而一，從而實行“階級調和”和“階級合作”。而一切的“階級調和”和“階級合作”的思想，都必然導致取消階級鬥爭，取消無產階級專政。這就不能不使我們悟到劉節先生的用心之險了。

劉節先生的人性論是為資產階級復辟效勞的

當我們把劉節先生的人性論作了如上的剖析之後，我們就可以考察劉先生借歷史研究之名所宣揚的這種人性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到底起的是什麼作用和是誰服務的了。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历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社會主義這個历史階段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這就是無產階級當前的偉大的历史任務。任何違反這一條歷史經驗的道路，都是一條此路不通的死胡同，其結果就不是社會主義的最后勝利，而是資本主義的復辟。

一切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历史科學研究工作，都必須是有利於這個偉大的历史任務的完成的。可是，劉節先生的所謂歷史研究却根本上同無產階級的這個历史任務針鋒相對的。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通過歷史研究的古為今用來“幫助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

实现和发展”，那就要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历史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从而透过历史的复杂现象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历史地论证阶级斗争的规律是阶级社会的一条普遍的、根本的历史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使人们认识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就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在当前必须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刘节先生却以他的所谓历史研究，大肆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侈谈什么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人类本有趋于社会主义的本性”，来否认历史的和当前的社会存在着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进而指责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人为的“伤天害理”、“亏道而乱德”的行为，要我们对阶级敌人施“仁政”，别有用心地提出只有通过他的人性论，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极盛时代”。这样，刘节先生便在他的所谓历史研究的幌子下，站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方面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妄图以人性改良来抵制社会主义革命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社会的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不是向共产主义发展，而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所以，刘节先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他要“实现和发展”的是资产阶级的复辟。

我们知道，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社会中就沒有统一的共同的道德，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有着各自不同的道德观念，永恒不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沒有的。

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在西方是基督教的道德，在中国则是封建礼教。所谓“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等道德规范，就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金钱成为资产阶级的真正的道德标准。马克思說得好，资产阶级可以这样对自己說：“我是一个恶劣的、不诚实的、沒有良心的、沒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最高的善，这就是說，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免于作不诚实者的麻烦，——所以事前就认为我是诚实的。”^①资产阶级这种拜金主义道德观，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使资产阶级每一块金钱上面都沾滿着血迹。

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集体主义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集中反映，是为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观根本对立的。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說：“我們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卷，第241頁。

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①

所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在肯定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同时，不仅不反对而且提倡人们的道德修养。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②。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它不仅一般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宗法制度残余的影响。因此，培养全体人民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彻底清除几千年留下来的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影响，没有几代人共同对剥削阶级的道德影响进行坚决的斗争是打扫不干净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我们才有可能改造客观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

但是，刘节先生提倡的个人道德修养，从表面上是否认道德规范的阶级性，提倡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道德规范，而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道德观来融化和偷换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以资产阶级的“扩充利己心”的个人主义来融化和偷换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这种热心于鼓吹复兴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就是要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以这种道德观或所谓“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内容的刘节先生的人性论，是只能阻碍或延缓社会前进的步伐，乃至使历史暂时倒退。

我们知道，“感情”、“人情味”，都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存在决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始终处于一定的阶级地位中，过着阶级的物质生活，受着阶级的思想熏陶，因而，人们的思想、感情，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都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决定了不同的阶级对于“感情”、“人情味”等等有着不同的要求，而决不可能有什么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超阶级的“感情”和“人情味”。例如，无产阶级的感情只能是忠于本阶级的阶级利益，贯穿着革命原则，对阶级敌人有着无比的阶级仇恨，对阶级弟兄有着高度的阶级友爱。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一篇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国的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霸占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人没有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吃、穿，受压迫，受剥削。我决不能眼看他们受欺凌，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所有受苦难的人民。”这是多么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我们所需要提倡的就是这样的感情，而决不是背离本阶级的阶级利益，敌我不分，对阶级敌人也“一视同仁”的“感情”。

但是，刘节先生所提倡的，恰恰是抽掉了阶级内容的“感情”、“人情味”和“人类之爱”，说什么“必要全人类都被爱，才算可以说是爱人了”，“只要有一个人不被爱，就是不爱人！”在阶级社会里，抽象地来谈“感情”和“人情味”，这是资产阶级理论家所惯用的手法。他们用这种手法把不同阶级的不同感情抽象为普遍的“人类之爱”，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卷，第6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1页。

从而掩盖了情感的阶级本质，成为维护资本剥削的一种手段。这正如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时所說的，这里“所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調子：彼此相爱吧，大家不分性别和等级都来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飲吧！”^① 现在，刘节先生也是用这种手法，把不同阶级的阶级感情，抽象为普遍的“人类之爱”，来提倡不分敌我而彼此相爱，互相亲嘴和一团和气地痛飲，这正是迎合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需要，有利于他们以所謂“共同”的人性，“人人相通”的“人类感情”，来抹煞各阶级的思想感情的本质的区别和对立，混淆革命与反动的区别，从而融化和偷換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革命原则，使人民群众丧失阶级警惕性，弄得是非不清，敌我不分，思想堕落，意志消沉。以这种所謂“人类的感情”为内容的刘节先生的人性論，只能导致“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我們知道，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前进的动力是阶级矛盾以及为解决矛盾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矛盾的調和。这是因为一定的社会关系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一定的生产关系又总是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因此，处理社会关系只能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而不能遵循什么“理性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处理社会关系的杠杆。我們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保证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們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② 这是因为被打倒了但还没有消灭的剥削者总是存在复辟的希望，并且一有机会就把这种希望变为行动，妄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这正如毛主席在談到全世界将来都要进入共产主义这条真理时說的：“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③ 所以，革命的人民把反动统治阶级推翻之后，不是相信他们也有“趋于社会主义的本性”，不是相信他们也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誠意”，依靠他们的“各正性命”来协调社会关系，而是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坚决对他们实行专政。所以，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一切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我們所遵循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原則；并根据这个原則进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实现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但是，刘节先生从资产阶级人性論出发，鼓吹从个人到社会都必须遵循“理性原则”，不要揭露社会的阶级矛盾，不要进行阶级斗争，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去对待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施“仁政”，并且无产阶级和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卷，第382頁。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1481頁。

③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1473—1474頁。

劳动人民还应该同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以及一切牛鬼蛇神共同团结起来，把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合而为一。据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历史前进”，才是“人类社会文化（向）前推进的动力”。这实际上是要我们承认被推翻的剥削者有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的权利，承认他们有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反革命复辟的自由。以这种所谓处理社会关系的“理性原则”为内容的刘节先生的人性论，只能达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让一切牛鬼蛇神重建他们的“天堂”。

可见，刘节先生的人性论，如果说有什么神妙的话，也不过是在历史研究的幌子下，用封建道统的性命之说包裹起来的而已。刘节先生的这种人性论，从这种人性论出发所宣扬的“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是要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不要去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利于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重新夺回他们的“天堂”，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就是刘节先生的历史研究给自己作出的无可辩驳的结论。

刘节先生在解放前写的《古史辨》第五册的《刘序》和《历史论》中，就曾多次露骨地指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说什么“近来学者好言用唯物史观来创造新历史，这也是螳臂当车的想头。马克思辈发现唯物史观的时候所用的材料，不外乎西欧之部，如果拿来解析世界史总嫌不够”，“而且马克思辈所发现的方法，其实都是社会学的而不是历史学的”^①；说什么唯物史观“是别有用心”，是“政治宣传品”^②，等等。看来，刘先生直到现在仍然是在坚持他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所谓历史研究，如今只不过是把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刻骨仇恨，隐藏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签之下而已。

① 《古史辨》，朴社1935年版，第5册，第2—3页。

② 刘节：《历史论》，第14页。

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歪曲？

——評刘节先生的所謂“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及精义”

张 其 光

刘节先生《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載《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一文，看来并非真正考虑怎样为无产阶级“当前政治服务”的，它的“精义”在于要同历史唯物主义爭历史的“真实”或“真相”。該文着重說：

“所謂古为今用，也不能把它簡單化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規律，但这种規律一直到近代，才被科学的历史家——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如果肯定古代的思想家也有这样的明确的認識，双方旗帜鮮明，你一刀，我一枪，陣脚不乱，这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孔子、墨子时代有孔子、墨子时代的問題，我們不能把我們这时代的問題不恰当地摆在他們身上。足見讲历史必須恰如其分地把事实說出来，才算是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才算是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精义。”

該文結論又說：

“总而言之，阶级斗争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問題。相反地，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是能够古为今用的。”

許多历史唯心主义者都装成“客观”、“公正”的态度，強調过“历史真相”、“历史精义”，力图証明历史唯心主义的“科学性”。刘先生也是如此。現在，我們把刘先生的史学观点、方法和他的历史研究的实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看看他是真正把握住了历史事实的总和及“精义”，还是随心所欲地歪曲了历史。

刘先生认为：“恰如其分地把事实說出来，才算是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才算是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精义。”——这是一个錯誤而含糊的命題。我們认为：即使是“恰如其分地把事实說出来”，也不一定能够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及“精义”，因为記載历史事实、事件、个别历史現象，并不就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規律。历史事实与历史发展規律有着密切的不可分的关系，但也不能混为一談。至于，究竟怎样才是“恰如

其分”？什么是事实？“精义”又是什么？我們还是先从他的历史研究实践上加以考察。

刘先生在《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载《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一期）谈到墨子“非攻”的时候，有說：

“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攻夺事件？因为人人想得利。”

說出了攻夺事实之后，竟然把握住这么一个奇怪的“总和”、“精义”。由于不作阶级分析，結果便使自己陷于替一切非正义的反动的攻夺侵略辩护的地位。这样論断古代的攻夺史实又怎能“古为今用”？何况所謂“說出事实”，究竟怎样才說得“如实”？刘先生論述墨子的“非攻”学說正是由于沒有作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而作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論述，便陷于极端混乱，既未說对事实，也未能把握住历史事实总和、精义。刘先生写道：

“封建統治阶级一方面‘夺民之用，废民之利’。一方面去侵犯別国，貪得胜之名，得地之利，因而損害了別国及本国人民的利益，事实上，国家也无利可得。墨子替他們打了一下算盘，其結果是：‘計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失之多也’。墨子还举出許多事实，告誡当时統治阶级不要互相攻伐，因而損害到人民的利益。（接着引述了墨子“今万乘之国，墟数于千，不胜而入；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一番話）这种情况，正是当时的实际。我說这是封建社会的爭地之战，不是奴隶社会的爭人之战。而当时各国，实际上是缺少人，不是缺少地。……墨子根据这一事实，出来反对攻夺的战争。”

这番論述問題很多，只就历史研究方法論上來說，便有几点：第一、单靠墨子的“非攻”的論据就可以証明当时的攻夺确是对任何方面都有害无利？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所謂“国家”究竟是誰的国家？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國家論——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的理論就不能正确解决这个問題。第二，单靠墨子那些論据便可証实当时的攻夺战争只为爭地而非爭人？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或封建制初期的战争归結为“爭地之战”，来同奴隶时代的“爭人之战”相对立，这样概括历史事实的总和，算是“恰如其分”了嗎？《左传》上許多“获俘”、“献俘”的記載又将作何解释？当时的攻夺其实既“爭地”也还“爭人”，到底是爭物质財富。古代社会的战争固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問題，而从奴隶制过渡封建制时代或封建制初期的战争，对于逐步建立統一的封建国家过程起什么作用，也是个問題。这些都是复杂的問題。如果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論的观点，結合当时历史事实材料作具体分析研究，就不可能真正达到把握住历史事实总和及其“精义”的目的，而只能得出非科学的抽象的概括和违反历史事实、历史发展規律的假“精义”。第三、单靠墨子那些論据能否証明墨子的“非攻”学說是純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出发？然則墨子的“兼爱”、“互利”的双方或多方的对象又何所指？刘先生在結論上 还肯定“孔子和墨子都是为人民說話的思想家”。究竟这些思想家为什么要为人民說話？他們的說話是否真正代表了当时人民的利益？到底所謂“当时人民”又实在包括那些人、怎样的人（刘先生竟然把“士、君子”也算作“人民”）？要解决这些問題就决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論。所有这些問題，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才能解决，只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社会意识及其形态的发生和发展”、“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等等基本原理，才能结合历史事实材料进行真正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才能逐步掌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掌握历史发展各方面的具体规律，从而对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实践发挥指导的作用，要求既认识社会又改造社会，既认识历史又创造历史。

刘先生在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上长时期走入歧途，无疑是他的错误的史学观点和方法所指导的直接结果。历史唯心主义者不是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是把历史规律（法则）神秘化。刘先生的史学观点主要属于后者，但也夹杂着前者。我们从他的《历史论》可以充分得到证明。

所谓“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实说出来，才算是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精义”，这个论点本身是带有资产阶级史学“个别论”的倾向的，就是只承认个别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把它记载下来就是“历史”，把它编排、凑拼起来，就成“史书”。即如刘先生在《历史论》一书所说的：

“所谓史学方法，大别说来，是两步工夫。其一，是考据工夫；其二，是编次工夫。考据时所需要的是观察和分析；编次时，所需要的是贯通和识鉴。合拢这两步工夫，总能够成一部史书。”（《历史论》，第三七页）

这就意味着在方法上把历史看成单纯是史事的记载，成为历史个别现象的编次的陈列，这样决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与精义。问题首先在于历史家“观察和分析”、“贯通和识鉴”的过程和结果，他自己的立场、观点便起着决定作用。用刘先生惯用的术语来说，讲“史实”决不能没有“史意”。请看刘先生怎样利用“史实”来讲历史“精义”：

“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的屠杀民众，清人入关后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以及晚清的洪杨之乱，象这样的大屠杀，史不绝书。但社会上的习惯改过来没有呢？可见社会的改良，若用破坏的方法，是以蛮性对付蛮性，其收效仅及一时，而流毒至于万世。换言之，想用非理性的手段去解决社会事件，是不可为训的。”（《历史论》，第一六六页）

难道这是“恰如其分地把事实说出来”了？“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及“精义”了？第一，把农民革命起义写成“屠杀民众”；第二，把农民起义与清朝贵族入关相提并论；第三，把农民革命斗争说成“蛮性”，而且“流毒万世”；第四，归结为：革命是“不足为训”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歪曲？我们赞成和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可是一定要看看究竟摆什么事实，讲什么道理，和怎样摆、怎样讲。究竟对什么阶级有利？是否对革命有利？历史研究也是这样子，摆事实讲道理，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一讲事实，就联系到道理，一讲道理就联系到事实。要我们只讲“事实”，不要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来讲点道理，我们办不到。历史唯心主义者首先自己也办不到。一讲张献忠、李自成，就必诬为“屠杀民众”，一讲洪杨，就要指为作“乱”，就要讲到“流毒

方世”，“不足为訓”，难道里面沒有包藏着十分坚定的而又明显的階級立場和階級观点？因为任何的历史家本身是階級社会的成員，当然刘先生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也只能是根据自己的階級观点和階級感情去考察史事。所以，我們认为：这无非是在“超階級論”的幌子下，实行剝削階級的（既有封建地主階級的，也有資產階級的）階級欺騙。他們心中有数，那就是他們自己的階級观点；他們口中念念有詞，那就是似乎說沒有階級区别而实实在在有着他們的“階級分析”。他們也不是无条件、无原則地反对“階級分析”的，只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階級分析，而总是不放弃偷偷摸摸的歪曲历史真实、歪曲客观存在的“階級分析”的。他們的历史家、哲学家如果真的游离了自己的階級立場，沒有了自己的階級观点，那就不能成其为他們的历史家和哲学家了。

史学史和哲学史告訴我們：历史唯心主义者有着否认和抹杀历史規律到臆造和伪造历史規律的过程；而其中最險毒的莫如把历史規律神秘化，使之引入信仰主义，一句話，企图使历史变成宗教——历史“精义”变成宗教教义。

請看刘先生怎样論述“历史的本质”：

“历史是一部人与自然、或人与人的竞争过程。若把人与人的竞争再分析一下，察其本质，也是人与自然的竞争。……无非是理性同蛮性的竞争。理性代表人，蛮性代表自然。……少数天才若不拉着大群跟着前进，他們就会落伍。这种行动不仅表現于一个社会里面少数富有創造力者，而且表現于富有創造能力的团体行动。

这种行动的表现过程，即是历史的本质。”（《历史論》，第二页）

把人类历史归結为“理性与蛮性的竞争”，还不是把历史規律神秘化？这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它把历史事实連同历史規律全部彻底地加以歪曲。

还請看看刘先生怎样論述“历史的法则”：

“（人类历史）第一阶段，是从自然法则走向人为法则的时代；第二阶段，是从人为法则反回自然法则的时代，却并未走通。因为利用自然还不是彻底的办法。……‘天之道’是自然法则；‘人之道’，是人为法则。……所謂人为法则合于自然法则的境界，就是从前人所謂天人合一的境界。現在的社会，当然距离这一境界还很远。有心人……务必力促其成。务必放弃現世的快乐，以身作则。……这是一种科学的宗教，也可以說是宗教的科学。”（《历史論》，第一二五——一三四页）

“历史家”原来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薩，是个“天人合一”的救世主！刘先生的史学观点中蘊藏着的宗教的、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的灵魂于是暴露无遺。那种“理論”只能証明任何历史家、哲学家和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归根到底是有着党性立場的。不管自觉不自觉，也不管承认不承认，它总是一种客观事实。这种“理論”同时証明历史学和所有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有党性的有階級性的科学。列宁针对那些企图“补充”馬克思主义的資產階級的学者、教授們公正地指出：

“……这些教授們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專門領域內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談到哲学問題的时候，他們中間任何一个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

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四卷，第三六二页）

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对于在史料考据和某些历史事实有着专门研究的刘先生，当他涉及到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的一般理论时，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自欺欺人之谈。

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事实又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但无论如何，历史事实是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的科学研究才能正确的认识历史事实的总和和历史发展规律。（刘先生所讲的“历史事实的总和，历史事实的精义”，实际上和我们不是共同的语言，那只是他们自己定义下的“总和”与“精义”。）关于这一点，不仅历史唯心主义做不到，就是朴素的或机械的唯物论也不能做到。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开头就说：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二八一页）

所以，要真正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及历史发展规律，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历史，必须依靠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决不能采取别的任何途径，也决不是刘先生企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所能够达到的。

刘节先生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就使自己的历史研究走向了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结果当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历史的歪曲。

历史唯心主义的又一次破产

——試論罗尔綱等同志研究和评价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

史 集 思

早在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訓傳》的時候，毛主席就曾經指出：“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到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①

當前關於李秀成評價問題論爭中所暴露出來的一些錯誤觀點，正是反映了一些史學工作者也同一些文學藝術工作者一樣，存在着毛主席在這裡所指出的對歷史發展和對階級鬥爭的錯誤看法問題，存在着應當稱贊或歌頌什麼人和不應當稱贊或歌頌什麼人的問題。而要正確的解決這個問題，就非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不可，也就是要研究歷史上的這些人物是站在什麼階級立場，為什麼階級服務，從而判定他是值得歌頌的還是應當反對的。歌頌應該歌頌的人物，反對應該反對的人物，就是促進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發揮歷史科學的革命作用。離開了這個根本觀點和方法，就必然要陷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就必然會去稱贊或歌頌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歷史人物，走向維護舊事物得免于死亡的錯誤方向。十五年前的《武訓傳》的作者們是在這個關鍵性問題上掉進了唯心主義的泥坑，歌頌錯了應當反對的武訓；今天的那些把李秀成這個叛徒捧為“英雄”的人們，也是在這個關鍵性問題上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錯肯定了應當否定的李秀成。

我們的這篇文章試圖在關於李秀成的評價問題爭論的基礎上，具體地考察那些錯把叛徒當英雄的人們是怎樣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和走向了歷史研究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反面的。

(一) 罗尔綱同志的“苦肉緩兵”說是以對歷史的臆造 為基礎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又一個標本

李秀成在敵人囚籠里写下了一个傾黃河之水也洗不掉的叛變革命、投降敵人的自白

^① 《毛澤東論文學和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94頁。

书,却被罗尔綱誉之为“保存革命实力”,“实行早已定下的据西北以图中原”的“苦肉緩兵計”^①。一个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居然可以被“考証”成“委曲求全”、“图謀复国”的英雄,不能不使我們严肃地考察,罗尔綱在分析《李秀成自述》的时候,究竟用的是什么观点和方法?

我們知道,在历史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一直貫穿着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中心,就是要不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生活和分析社会问题。毛主席說:“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这就是說,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才能在充满着各种矛盾的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中,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本质,才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评价和正确的解释。

但是罗尔綱在《忠王李秀成苦肉緩兵計考》这篇文章里,抛弃了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思想上严重地受了“曲线救国”論的支配,錯誤地把投降看作“图謀复国”,把叛徒看作革命英雄,从而不惜歪曲史实,牵强附会来“証明”自己的結論。所以他一开始就提出不应该“首先根据《李秀成自传》断定了李秀成的投降”說法,而倡言要以章学誠在其《文德》論中提出的所謂一条教人理解历史人物“有所为而言”的“理論”为指导,用“探微索隐,闡幽发潜”的方法,去发掘“深藏”在《自述》的“表面現象里面”那一条“隐藏的”“苦肉緩兵計”。这实际上是反对根据《李秀成自述》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撇开客观事实,而从个人的主观“意志”出发,去“探索”李秀成当时的心理状态,并从他的心理状态方面作出主观任意的解释,即首先“大胆假設”出一个什么“苦肉緩兵計”,然后再“小心求証”这个强加于历史的“假設”。这就清楚地暴露了,正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使罗尔綱虛构出一整套“苦肉緩兵”說的三部曲,即所謂李秀成当时对形势有清楚的認識,对革命前途具有无限信心;于是产生了“委曲求全”的“招齐章程”,以使太平軍余部得以会师;而会师的最終目的是实现过去早已定下的“让城别走”大計——据西北以图中原。

应当說,罗尔綱在建立自己的这条“苦肉緩兵計”的时候,是頗費苦心的,他花了不少“考証”、“索隐”等等的功夫,但也应当說,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是建立在对历史的臆造的基础之上而經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有些文章已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作了具体分析,指出了这一点;这里只就李秀成自己的言論、行动来作进一步的分析。

李秀成的彻头彻尾的失敗論,証明他根本没有“緩兵”的意图

罗尔綱說,李秀成是一个經得起“失败的考验”的英雄,他对当时“大有可为的革命形势”,不但“心中有数”,“認識非常清楚”,而且“对革命前途具有无限的信

① 罗尔綱:《忠王李秀成苦肉緩兵計考》。載《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又載《人民日报》1964年7月27日第5版。以下凡引自上述二文,均不載明出处。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1491頁。

心”。“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緩兵計，就是根据这样一个当前的形势决定的。”

但是，在李秀成的心目中，究竟有没有那么一个作为“决定”使用“苦肉緩兵計”的根据的“大有可为的革命形势”呢？

事实胜于雄辯。还是看看李秀成自己是怎样說的吧。

在《自述》里，李秀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曾國藩表白說，他早已看出天朝“气数已滿”，“不能久图”，“今国敗尽”，“天国已亡”，“天朝之根已去”，“天朝数滿，天王乱世民之数滿，仍大清再复升平”！从这些絕望的哀号声中，可以看出这时的李秀成已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敗論者，而对于一个彻底的失敗論者來說，“緩兵”是毫无意义的，“苦肉”云云，更是无从說起。

那末，罗尔綱是怎样臆造出李秀成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看作“大有可为”，从而作为“苦肉緩兵計”的根据的呢？原来他从章学誠那里得到了一条教人理解历史人物“有所为而言”的启示，用“索隱”的方法，主观臆造出一条“苦肉緩兵計”，然后对历史材料采取极不严肃的态度，或者把某条史料断章取义以适应自己的观点，或者象魔术师变戏法一样把同一件史料一会說成是真的，一会又宣布是假的，或者把自己凭空臆造出来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硬拉扯来作为自己的証据。例如，罗尔綱从曾國藩幕僚赵烈文和李秀成的談話里，断章取义把李秀成試探乞降的“君視天下遂无事耶”这么一句話，曲解为他“对革命前途具有无限的信心”，又把李秀成建議曾國藩采取“仁爱为刀”的“招撫”太平軍余部的反革命策略中提到“杀之不尽”的一句話，曲解为他“对革命前途具有无限的信心”，把李秀成甘心情愿做反动派的鷹犬，帮助曾國藩鎮压捻軍的“穩（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的話，也曲解为“他对当时捻党斗争的新形势也有着清楚的了解”，把李秀成献議以卑鄙、毒辣的手段来招降太平軍余部的反革命策略，更像《天方夜譚》般地描述为是派广西人說潯梧一带的方言隱語来聯絡长江两岸的太平軍，使其会师，并进而大做文章，說什么李秀成对“革命精忠耿耿”啦，“做他未死以前所能做的事，尽他未死以前所能尽的責”啦，“可見他的立场的坚决”啦。当然，經過了这一番曲解之后，一个历史上的农民革命的叛徒，就在罗尔綱等的心目中变成一个“可敬的英雄”了。不过，这种不顾事实的內在联系，胡乱地拉扯一些所謂“事实”拼凑在一起来論証自己的主观虛构的做法，已經丧失了起碼的科学态度，那里有一点儿象罗尔綱所标榜的透过“表面現象”去发掘“深藏”着的本质的影子呢？我們知道，只有对大量現象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才能正确把握事物的本质。而罗尔綱同志的“探微索隱，闡幽发潜”，恰恰走到了它的反面，与馬克思主义的治学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詆毀，对自己的革命活动的忏悔，和对

清朝“德政”的歌颂，实质上只是一条可耻的“乞降保命”計

一个坚持革命气节、視死如归的革命者，在敌人的牢房里，在絞刑架下，在枪口对

准着自己的胸膛，或者是在敌人的甜言蜜语，金钱美色之前，都不能够动摇他的革命意志，都不能够使他出卖革命，出卖阶级兄弟。反之，一个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贪生怕死的人，面对着敌人的威胁利诱，他可以寡廉鲜耻地卑躬屈节，认贼作父，做出诋毁革命，自污自辱，出卖革命，出卖阶级兄弟的可耻勾当来。李秀成在被俘后的表现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在口供和《自述》里，李秀成不仅对革命前途完全绝望，而且还大肆诬蔑太平天国革命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是“乱星下降，乱及凡间”，是一帮“不良不孝不义之徒”的“作乱”，是一场“害民害众”、“乱坏世民”的“劫难”，而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竟是“忽（屈）悞英雄”、“乱坏世民”和“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的“乱天下”的“匪首”，而对清朝统治者和刽子手曾国藩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则赞扬备至，颂为“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是“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的“救世之人”，值得“满天同歌而颂赞”。李秀成这种出卖灵魂，认贼作父，把革命说成“逆天乱世”，把反革命说成“顺天应人”的叛徒立场，怎么能够说他有“保卫太平天国”的“坚定立场”呢？怎么能够说他是为了“缓兵”而施展的“苦肉”呢？

李秀成除了诋毁革命，卑鄙无耻地歌颂清朝统治者和曾国藩之外，还对自己曾经参加过革命的历史，作了可耻的忏悔。他反复地说：

“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离）宗，离（离）亲别友、去戚离（离）乡……随洪姓而来……造成今日患害……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乎？”

“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而为，实我不知知（之）也！”

“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

极度悔恨参加革命，把参加革命看作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自污自辱，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一点革命气节的卑鄙无耻的小人，象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说他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呢？又怎么能够说他是为了“图谋复国”而不惜“苦肉”呢？

不仅如此，在《自述》里，李秀成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礼待”清朝的将领，把那些死心塌地地反革命到底的汉奸奴才，说成是“英雄”、“义士”；与此同时，又尽情地描述他和那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的亲密关系，说部永宽等叛变时，他如何怂恿，陈德风叛变时，他如何出钱出力，韦志俊投清“得回家之乐”，原是靠他“保全”性命，李昭寿“投大清后”，他又如何“将其在天京所配之妻，瞞我天王而偷送付”，以及自己想投降，却“无有招引之门”，最后还提出天京被陷前，宋永祺如何进行投清活动及劝他投降……。这里，李秀成把自己如何敌我不分，以及纵容、怂恿部下将领叛变的情况，甚至他自己曾企图投降的活动，一一向曾国藩丑表功，人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个早就丧失了革命立场的李秀成，竟然会在被俘后变得忠贞不屈，“对革命耿耿精忠”，一心一意地设想出个什么“苦肉缓兵计”呢？

事实上，无论李秀成大罵太平天国的革命領袖和革命群众也好，无耻地歌頌清朝統治者和曾國藩也好，向曾國藩瀝胆披肝表白自己是一个“懞懞而來”和“騎虎難下”的无可奈何的可怜虫也好，其目的都不外是“婉轉求生，乞貸一命”。他說：“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早至数年，而在部下，亦尽力图报，虽不才智，死力可为”，今“我肯与中堂、中承（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以爵（贖）旧日有罪愚（于）民”。被罗尔綱同志証明为“委曲”求“緩兵”的李秀成的“招齐章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李秀成在这里明白地表示愿向曾國藩投降，并且决心肝腦涂地为反动派效劳，帮助敌人消灭革命力量。李秀成这种叛变革命，出卖阶级兄弟的乞降活动，借用罗尔綱的話來說，真是“毋須千言万語去說明他的立场，他的立场就在这里”，“毋須千言万語去說明他的用計，他的用計也就在这里”！如果硬要說这时的李秀成还有什么計謀的話，那与其說李秀成有一条什么“图謀复国”的“苦肉緩兵計”，倒不如說他正在可耻的幻想一条不折不扣的“乞降保命”計。

李秀成从“乞降保命”出发的“招齐章程”，是对 革命力量采取欺騙与鎮压两手的反革命策略

在对待李秀成的“招齐章程”这个問題上，如同对待其他問題一样，罗尔綱同我們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說：李秀成提出“招齐章程”，是“叫敌人停止进攻，使长江南岸的太平軍，得乘机突过湖北会师，实行早已定下的据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計”。

事实果真是那样的么？列宁曾經說过：“要是一下子看不出那些……人物在为某种提議、措施等等辯护时，那就應該提出‘对誰有利’的問題。”①

李秀成的“招齐章程”究竟对革命有利，还是对反革命有利，这本来是明摆着的事情，只要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真相就清清楚楚了。可是，这样明摆着的事情，經罗尔綱的一番“探微索隐，闡幽发潜”的功夫，就变得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了。

“招齐章程”十条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用“撫”的手段以消灭太平軍余部。另一方面，用“剿”的手段，进一步消灭捻軍。为什么要“撫”？李秀成懂得，英勇不屈的太平軍是“杀之不尽”的，因此，在他看来，只有用“仁爱为刀”的办法，依靠他这个曾經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統帥、对太平軍將領有較大影响的人，来扮演一幕“招撫”丑剧，也就可以“免劳大清財貨，免劳将相之心”而达到消灭太平軍的目的。为什么要“剿”？在他看来，捻軍不是依靠他的“威望”所能“招撫”的，必須凭借反革命武装去实行鎮压。他說：“有中堂如此仁爱收复（服），又有罪将帮筹为引……以义用收复（服）天朝將兵后，穩（捻）匪作乱，举手而平，在安省居南北便易。”

这样一个旨在消灭太平軍余部和捻軍的剿撫兼施，运用反革命两手各个击破的反革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33—34頁。

命行动綱領，到底对誰有利，不是一目了然么！

奇怪的是，罗尔綱经过一番什么“索隐”的功夫，硬把李秀成这个反革命行动綱領，冒充为“图謀复国”的“苦肉緩兵計”的具体内容，说什么“招齐章程”是“要掩护幼天王”啦，是要“使长江两岸太平軍在‘招撫’的掩护下，取得机会，以完成会师的任务”啦。尽管罗尔綱把一个为了保存自己的脑袋可以拿几十万顆革命者的头顱去和反动派作交易的叛徒，說成是“通过曲折的途径”来“保卫太平天国”的英雄，但人們依据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和階級分析方法，却不难辨別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冒牌貨！

在罗尔綱笔下，既然李秀成的“招齐章程”，尚且可以誉之为“图謀复国”的“苦肉緩兵計”的具体内容，那末，明明是向敌人供出太平軍的軍事机密——“让城別走”大計，当然可以被他說为隱瞞“让城別走”大計，而又当然可以把这个“大計”强加給当时的李秀成，并誉之为实践“苦肉緩兵計”的具体行动計劃了。

客观上并不存在“苦肉緩兵”的三部曲，而是罗尔綱在研究李秀成时存在着如下的三部曲，第一，在“曲綫救国”論思想的支配下，首先断定李秀成是“图謀复国”的英雄；第二，为了“証明”这种看法，便任意曲解李秀成投降的事实，特別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招齐章程”；第三，为了曲解“招齐章程”，又虛构出李秀成心目中的一个大“大有可为的革命形势”，以及什么隱瞞“让城別走”大計，等等，从而完成了一整套的“苦肉緩兵”說的三部曲。

歪曲事实，总是为一定的观点服务的。罗尔綱同志的錯誤，就在于“曲綫救国”的思想，实用主义的态度，主观武断的方法。这就是罗尔綱同志整个錯誤的根源所在。显然，罗尔綱的李秀成研究及其結論，都是以对历史的臆造为基础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研究的又一个标本，同时就又一次地証明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

(二)在李秀成評價問題上的“衡其功过”論，是抹煞革命与反革命界限的“合二而一”观点

有些同志一方面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李秀成是叛徒，另一方面又硬說李秀成是英雄。他們从这种調和折衷的观点出发，指責把李秀成扔进历史垃圾堆的做法是錯誤的，是沒有衡其功过，沒有分清功过的主流与支流，沒有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来評價李秀成，而是“用无产階級的革命气节观来要求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領袖”，是“用无产階級革命战士的标准来衡量李秀成”。这种千方百計要为叛徒立功的“功过”論，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又一种表現，亦即“合二而一”的观点，因為他們主观任意地把对革命者在其革命活动中的功过問題硬套到革命叛徒的身上，抹煞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在李秀成的問題上，必須划清的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而不是功过的界限

持“衡其功过”論的同志說，評價李秀成應該“全面考慮其功績与过失的統一”^①；

① 一川：《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革抹煞》。載《光明日報》1964年8月24日。

“应当把功績和投降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衡量一下”^①；“不能因为他有过重大作用”而肯定一切，也“不能因为他最后有过乞降变节举动而否定一切”^②；“評定他一生的功过”，“不能够因他的晚节有亏而否定他十余年血战之功，也不能够因他卓著勛績而曲諒他最后向敌輸誠的罪过。任何片面的說法，都是不科学的。”^③ 这些同志“衡”出来的結論是：李秀成的晚节不終是他一生的“污点”和錯誤，但总的还是“功大于过”，“成績是主要的”，“仍然不失为伟大的革命英雄”。这种貌似持平之論，实則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观点。这种論点之所以是錯誤的，就在于他們背离了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和階級分析方法，无視制約着功过的界綫的更根本的界綫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綫。

毛主席說：“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点的界限。記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則就会把問題的性質弄混淆了。”^④

按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在評价李秀成这个具体問題上，我們應該首先考察他在被俘后是否投降变节，如果投降了，那他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也就属于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問題；如果沒有投降，那他就还是革命者，也就属于成績与缺点的界限問題。既然持“衡其功过”論的同志也不否认李秀成已經投降变节，那末，在李秀成問題上，我們必須划清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不是什么“衡其功过”。因为功过問題是革命者在为革命事业而斗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成績与缺点、正确与錯誤的問題，它属于人民內部的問題；而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則已經轉化为敌我問題，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本对立問題，它完全失去了人民利益根本一致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失去了評論功过問題的條件，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謂“衡其功过”。用評价革命队伍中的成員的标准来評价叛徒，并誉之为“依然不失为伟大的革命英雄”，正是抹煞了两条根本不同性質的界限。

誰都知道，在两个对立階級之間进行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争中，革命气节就是忠于本階級革命事业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死亡的威胁吓倒过，反动势力的屠刀从来阻挡不住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怒潮。席卷大半个中国，坚持了二十多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中国工人階級誕生以前的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在这次革命运动中，无数的革命农民和許多革命領袖都始終坚持革命的立場和气节，为革命奋斗到底，表現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在中国历史上放射着永不磨滅的光芒。例如，在太平天国的領袖人物当中，陈玉成、洪仁玕、賴文光諸人之所以名垂青史，首要的問題就在他們始終坚持革命气节，大义凛然。对于这些人來說，即使他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錯誤，但在他們忠于革命事业的一生中，这毕竟只是第二位的東西。因此，在評价这些英雄人物的时候，我們完全應該把他們的功过分为主流和支流或者主导方面与非主导方面。“把成績为主說成錯誤为主，那就完全錯了”^⑤。太平天国的这些至

① 苏寿桐、吳雁南：《略論李秀成》。載《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

② 朱仲玉：《英雄一世，糊塗一时》。載《光明日报》1964年8月8日。

③ 祁龙威：《試論李秀成》。載《文汇报》1964年8月15日。

④⑤ 均見《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1445頁。

死不屈的领导人物的革命立场和革命气节，的确不愧为伟大的农民革命英雄！

誰都知道，一切革命叛徒都有过一段自己的革命史，或者曾經为革命立过或大或小的功劳。但是原先是革命者的人物，一旦背叛了革命的阶级，背叛了革命事业，而向反革命卖身投靠，成为叛徒，他就不再是革命者了。叛徒活动絕不是作为革命者而犯的錯誤，而是作为反革命的人物而干下的罪恶勾当。一个曾經是革命者的人物墮落成为叛徒，就是对他底过去的否定，走到了自己原来立场的反面。不管他从前在革命活动中立过多大的功劳，都不能減輕他叛变革命事业的罪过，不能掩盖这条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譴責和批判。因此，对于革命叛徒，根本不存在什么功过的問題，而应当从阶级观点出发，加以否定。李秀成曾經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他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不肯为革命而牺牲，在敌人面前做出了奴顏卑膝的下賤事情，干出了出卖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亲手毁灭了自己过去参加过革命的光荣历史，走向了他原来的反面，墮落为可耻的叛徒。对于这样的败类，怎么可以說他的一生是“功大于过”，“成績是主要的”，“仍然不失为伟大的革命英雄”呢？！

这是一个原則問題。“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剝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还輕。”^①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是懂得珍視自己的生命的，但更懂得珍視他人——广大人民的生命，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們可以洒热血、抛头腦，而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决不会因个人的生死存亡，而丧失气吞山河的革命气节。因为在革命斗争中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革命的胜利必須付出的代价，沒有个人和部分人的牺牲，就不可能有全体的永久的保存，就不可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为革命而死的先烈，他們的确死得比泰山还重，他們的硬骨头精神，永远激励着人們，永远活在人們的心中。我們应该热情地歌頌的是为革命赴湯蹈火，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如果把李秀成这个为了保存自己生命而出卖革命，出卖阶级兄弟，决心肝腦涂地为清朝卖力而死得比鴻毛还輕的叛徒，尊之为死得比泰山还重的英雄，这就沒有了是非，沒有了真理。这样，革命还有什么光荣？叛徒还有什么可耻？

持“衡其功过”論的同志，你們在这个問題上究竟是怎样想的呢？你們为什么要抹煞两种不同性质的界限，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辯解呢？

“防鬼反”是李秀成为了乞活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反侵略思想”

有些人虽然承认李秀成投降了，但还要从“防鬼反为先”这句话給他立一点所謂“反侵略”之“功”，說什么被俘后，“防鬼反为先”成为他的“主导思想”，坚持了太平天国一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爭取民族独立的立场，“当他身陷囹圄为敌人的阶下囚时，还一再委婉启发曾国藩，希望曾国藩防鬼反为先”，所以李秀成“不愧为反对外国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卷，第1003頁。

資本主义侵略的英雄”^①。

到底李秀成的“防鬼反”的实质是什么呢？他真的有反侵略思想嗎？

誰都知道，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这个时候，中国已由一个封建的国家逐渐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外国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但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而且反对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实际上是由太平天国担負起来的。与此相反，清朝政府为着勾引外国侵略者，帮助自己进行反对太平天国的内战，不惜訂立屈辱的卖国条約，犯下严重的卖国罪行。当时的形势，显然是清朝統治者与外国侵略者共同地站在一个极端，而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因此，中国民族与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只能依靠农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去求得解决，而决不可能是要革命人民取消革命，轉而依靠清朝統治者去“攘外”！李秀成既然决心向清朝統治者投降，决心用反革命的两手来消灭革命力量，这就不单是阶级投降，而且实际上是民族投降。在这种条件下，不管李秀成說的是“防鬼”或防什么都不可能是反侵略思想。

那末为什么李秀成会提出“防鬼反为先”呢？李秀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为了乞活。早在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和李秀成談話时，李秀成就曾提出“今天京陷，某已縛，君視天下遂无事耶？”“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余年必見。”“天下有事”的意思是指当时还有数十万太平天国的余部和捻軍，这些武装力量还繼續进行頑强的斗争；“夷务不靖”的提出，是李秀成錯誤地判断了清朝統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不知道这是走狗与主子的关系，从而幻想利用它們之間的矛盾，来为自己的活命寻找出路。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自述》里就更为明白地表现为提出“招齐章程”和“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說：如果开“恩”容我“出力”，太平軍余部就可“早日完功收复（服）”，“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既“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今为虑者，洋鬼定变动之。”这就是有些同志大作文章的所謂“防鬼反为先”的问题。

其实在《自述》里面，李秀成向曾国藩提出的所有献議，都是为他自己的求降乞活服务的。他所提出的“招齐章程”是以消灭革命力量来換取他自己的头腦，他所提出的“防鬼反”也不过是作为叛徒卖身投靠的一种“本錢”而已。当时甚至连曾国藩都看出他的“婉轉求生，乞貸一命”的焦灼之情。

《李秀成自述》里面談到“防鬼”办法那一段，完全可以証明这一点。他說他的“防鬼”办法，就是“去广东先行密中多买其大炮”，并买其炮架，寻好匠人，照式制造。而这些，“我在太仓搶得炮样，业經制（造），与其一样无差，今南京城内上（尙）有此样。……我天朝已末，我乃大清民根”，可以而且应该为此效劳。还有，“欲同（求）

^① 苏寿桐、吳雁南：《略論李秀成》。此外苑书义、呂翼祖的《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評價問題》，一川的《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周衍发：《評李秀成》等文，均持同一看法。

步战之利”，还要到香港买其抬枪、手枪等等。而这些，“我”也熟悉，“我与其战过，方悉其由”。总之，留下我李秀成大有用处。可见，在李秀成看来，生怕提出“招齐章程”只帮清朝消除“心腹之患”还难于保住性命，于是又想从“防鬼反”方面再多寻一条活命之路，说自己对内有为清朝出力镇压革命的“本事”，对外也是一个可以为清朝卖命的精通洋枪洋炮的洋务通。这同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的反侵略思想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李秀成根本没有什么“防鬼反”的反侵略思想，他有的只是妄图消灭革命力量以达到“保清”求得“保命”的叛徒思想。因此，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上不涉及这个问题则已，如果具体地考察他的所谓“防鬼反为先”的问题，那就只能说明李秀成不仅公然背叛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正在与中外反革命势力作殊死战斗的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也非常明显地从根本上背叛了中国民族的根本利益，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的罪人。

有人硬把李秀成错误地判断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而提出的“防鬼反”，看作是站在争取民族独立立场上的反侵略思想，只不过是对清朝统治者认识不清罢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李秀成对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都没有清楚的认识，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必须判明李秀成是从农民阶级的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而认识不清；还是从求降乞活出发，站在背叛农民阶级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立场上的认识不清。李秀成当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抹煞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抹煞立场问题，硬把立场问题叫做认识问题，并费尽心机要从“防鬼反为先”这个问题为李秀成立一点“反侵略”之“功”，是绝对办不到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在为李秀成辩解的种种说法中，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对于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领袖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否则就会夸大农民革命的弱点，实际上必然否定了时代、阶级的局限性”^①；“我们……反对以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来作为肯定或否定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的历史人物的标准，因为那样将要一笔勾销许多值得我们尊重的前辈，并且把祖国的历史描绘成‘错误的堆积’。”^②

要求李秀成不要投降变节，坚持革命到底，就是没有注意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就是没有尊重我们的前辈，就是把祖国的历史描绘成错误的堆积么？

毛主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

^① 周衍发：《评李秀成》。载《光明日报》1964年7月25日。

^② 一川：《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

用了去，当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①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这就是科学地总结出来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难道历史上农民革命及其参加者和领导者的局限，就是对于农民阶级和革命事业的叛变嗎？这不是什么历史的阶级的局限，而是对于历史的歪曲，对于农民革命及其参加者和领导者的污蔑！

由此可见，所谓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好，所谓尊重我們的前辈和尊重祖国的历史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实际上这些都是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为叛徒辩护的具体表现。

认为要求李秀成不要投降变节，坚持革命到底，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标准去要求古人的看法，同样是以历史主义之名，宣扬“合二而一”观点。

在评价李秀成問題上，有誰要求李秀成象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那样，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阶级立场，为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为实现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到底呢？我們所要求李秀成的仅仅是象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农民革命战士那样，忠于自己阶级的革命事业，坚持革命立场，坚持革命气节，在反动派面前宁可倒下去，也不肯屈服的革命品质和英雄气概。就以太平天国革命而論，早在一八五一年太平軍在永安时，洪秀全就向全軍发布詔令，要求全軍上下“立志頂天，（真）忠报国到底”，只能“把心坚”，不能“半路差”^②。以至当周錫能叛变案被揭发时，全軍上下“共怒切齿，伏求天父上帝下令，即将謀反妖魔凌剔焚灰”^③。

洪秀全在这里对于农民革命的参加者和领导者的这些要求，总不能說是用无产阶级的标准去要求太平軍吧。而作为太平軍的主要将領的李秀成，不但沒有“立志頂天”，沒有“报国到底”，而且在被俘之前就已怀贰心，被俘之后更是彻底地叛变了革命，当了可耻的叛徒，能够說这些行径是符合太平天国所提倡的革命气节的标准嗎？难道要求李秀成不投降敌人就是无产阶级标准嗎？那么，我們再来看看太平天国的其他一些将領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陈玉成被敌人誘捕后始終威武不屈，高呼“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④；洪仁玕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法文丞相”^⑤而牺牲；賴文光在天京陷落后，仍坚持奋战四、五載，被捕后“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⑥，等等，他們不都是鮮明地表达了太平天国时代中国农民阶级那种“立志頂天，真忠报国到底”的革命气节的农民革命的英雄嗎？

事实上，要求忠于自己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一切革命阶级的起碼的道德标准，也是我們评价一个革命者的起碼标准。因为忠于革命阶级的革命事业，就是和本阶级的革命者一道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叛变革命阶级的革命事业，就是阻碍社会历史的前进。

无产阶级是同最进步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最大公无私，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最富有組織性、紀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它的历史任务是要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卷，第619頁。

②③ 分別見《太平天国》，第2冊，第66、17頁。

④ 罗尔綱：《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載《历史教学》，1953年4月号。

⑤⑥ 分別見《太平天国》，第2冊，第847、863頁。

最后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无产阶级要求自己的革命战士要为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到底，同时也要以历史上的革命先烈来教育自己的革命战士，发扬中国人民的革命光荣传统，完成革命先烈所未曾完成的革命事业；而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科学地考察一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出科学地判断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所以，无产阶级一方面决不以要求自己的战士的标准去要求前人，另一方面，也决不允许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可以漫无标准，弄得是非不清，敌我不分。我们对于李秀成的评价，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从而对他加以否定。应当说，用忠于革命阶级的革命事业，坚持革命气节，不投降敌人这个标准去要求李秀成，从而决定歌颂他，还是反对他，这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用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准去强加于古人。

有些人在历史主义的幌子下，企图拿“苛求古人”的帽子来吓唬人，从而任由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历史唯心主义的解释，这是办不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而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贯彻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主义，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的历史主义，这也就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并不是我们违反了历史主义，用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而恰恰是那些持所谓“衡其功过”论的同志离开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歪曲或偷换为根本排斥阶级观点和阶级内容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实际是使叛徒与英雄、革命与反革命“合二而一”的反科学的历史主义。

（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

就必然走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反面

在历史科学研究中，能不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而正确地解决什么是值得称赞或歌颂的，什么是应当反对的，这是历史科学研究能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前提。过去在对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上，当前在对李秀成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上，那些拼命歌颂武训、歌颂李秀成的人，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都走向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反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們认真考虑的。

从当前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凡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就会根据李秀成在敌人法庭上的口供，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同李秀成的谈话，特别是《李秀成自述》这些最重要的历史材料，并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问题作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然后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对李秀成这个叛徒给以严厉的谴责，并且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这就是：一个人只有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有着忠于革命的理想，才能成为一个革命到底的坚强战士，才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经得起考验；同时也使人们懂得，从来在革命运动中，总有那么一些经不住考验的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会从革命队伍中淘汰出去，从而加强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警惕性。

与此同时，也就必然会大力歌颂历史上坚贞不屈、革命到底、前仆后继的革命者，用革命精神、革命气节教育人民。使人们更好地懂得祖国的光荣的革命历史，懂得中国人民从来就是革命英雄主义者，一个人倒下去，千千万万个人站起来，革命人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的事业最后必将胜利。这样，革命先驱者伟大的崇高榜样，就必然成为后来者的极为可贵的鼓舞力量。这样的历史研究，也就必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利于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利于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反之，象罗尔纲等同志那样，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不顾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把自己的历史研究建立在历史臆造的基础上，主观地抽去阶级社会中一切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阶级内容，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把白的说成是黑的，黑的说成是白的，这样，历史就变成了任由他们雕琢的大理石，变成了任由他们摆布的铜钱，变成了一个任由他们打扮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于是乎在他们那里，真正坚持革命到底的太平天国的英雄们遭到了贬抑，而投降变节的李秀成却受到了特别的恩宠：什么《李秀成自述》是一部革命历史文献啦，什么李秀成在《自述》里写的“天朝十误”是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啦，什么李秀成是“图谋复国”的“苦肉缓兵”英雄啦，什么李秀成具有崇高的“爱民思想”“反侵略思想”啦，什么李秀成是“伟大的农民革命英雄”、“民族英雄”啦，等等，不一而足。

显然，这种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非界线、阶级界线、革命者与叛徒的界线、革命者的革命气节与叛徒的活命哲学的界线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把叛徒当作“革命先烈”、“革命英雄”来向人民群众推荐。这样的所谓历史研究，不仅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相反的倒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可是有些人硬说歌颂历史上的革命叛徒和现实斗争无关。例如《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一文的作者一川就这样说：“适当地肯定一个历史人物，与树立当前广大人民的学习榜样并不是一回事”。他所说的“适当地肯定一个历史人物”，其实是极其错误地肯定叛徒，歌颂叛徒。而他却认为肯定叛徒，不过是“历史主义”，并无鼓励叛变的作用，这同无产阶级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各不相干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有意抹煞历史科学的强烈党性原则和阶级内容，躲在所谓“历史主义”的幌子下教人们去“尊重”叛徒。在一川的笔下，所谓“值得尊重的前辈”不正好就是李秀成之流吗？要我们的后辈去尊重这样的“前辈”，这就无异是要我们的后辈去向这些临危变节，出卖革命，出卖阶级兄弟的叛徒“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从来就是贯彻着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从来就是革命的历史主义，那里有什么尊重和歌颂叛徒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一直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而在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无数次交锋之中，历史唯心主义总是要遭到破产。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的论争，又一次宣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这对于所有的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又一次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資產階級美學觀點的藝術標本

——《北國江南》的思想實質和美學理想解剖

蕭 殷 藍 宜

近半年來，在文化領域中展開了一系列的大辯論。哲學上的“合二而一”論，美學上的“無差別境界”論以及影片《北國江南》所宣揚的人性論等等，都引起了熱烈的爭辯。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這三者却有個共同的基調，都是以資產階級思想反對無產階級思想，以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而《北國江南》其實就是“合二而一”這種反動的哲學思想和“無差別境界”這種反動的美學觀點在創作實踐中的體現。因此，這場大辯論，不僅关系到“興無滅資”在思想戰綫上的勝利，也关系到無產階級文化的發展前途。

現在，我們只想通過具體分析，探討一下《北國江南》的思想實質及其作者的美學理想。是否恰當，還望文藝界同志和讀者給予指正。

一

電影《北國江南》塑造了三個主要的正面人物。他們是：黃土屯高級農業合作社主任兼黨支部書記吳大成；大成的妻子銀花；縣委書記張忠。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在黃土屯“改天換地”的事業中，他們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影片的故事，圍繞着他們展開；全劇人物，圍繞他們活動——作者的美學理想借他們來體現。他們是影片構思的核心。

吳大成是影片里的“英雄”人物。

作者是怎样塑造吳大成的形象的呢？

序幕除外。吳大成一開始就是以一個十分關心生產的社主任的姿態，出現在銀幕上。對於吳大成來說，生產建設就是最重要的任務，生產建設就是一切。然而，吳大成不懂得和忘記了：階級鬥爭勝利才是生產鬥爭勝利的保障和基礎。他對於黃土屯存在着的、複雜的階級鬥爭無所感覺。反革命分子錢三泰近公開地進行破壞，他沒有覺察；老汪頭再三再四提醒：有人移動了井標，他不了了之；小旺開小差的行動計劃已經瓜熟蒂落，他還瞠目結舌，不肯置信；資本主義思想已經滲透到他的親族之中，錢三泰和董子章的兩雙黑手，已經把小旺拉過了階級界綫，他還是沒有理解到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當然也就更沒有去思謀對策。他和反革命分子錢三泰，是有過不少次直接、間接的接觸的，但是，敵人的陰謀和挑釁，並沒有引起他起碼的警惕和注意。

但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他和董子章遭遇的四個“回合”。而對着這個仇恨

新社会、仇恨集体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并且和社会主义争夺青年一代的资产阶级分子，吴大成不战而败，败了又败，节节退让，忍气吞声。请看，第一次，董子章弄坏了社里的大车轴，群众意见纷纷，董子章不唯不接受意见，还回过头来倒咬贫农老汪头一口，骂他是“老穷鬼”。身为社主任的吴大成站在一旁，一语不发，权当没有听见。董子章得势，以请假进城来进一步威胁集体，吴大成反而给以软语抚慰，说：“这是干什么哪，大伯？这不小心出了事，大伙有意见，这有什么不对？不要一不高兴就请假进城。”说罢，还支使小旺把“大伯”小心翼翼地扶了回去。第二次，董子章乘社之危，公开到农业社逼债，强支牲口钱去做投机生意。在这个明显地带两条道路性质的冲突面前，吴大成笑容可掬，让坐，倒茶。一个劲儿说什么：“咱爷儿俩面对面、心对心地谈谈……”敌人恶狠狠地进攻，支部书记却尊之为“爷”，还要和他以心换心，促膝深谈。副主任老郑当面指出董子章想搞投机，大成却置之不理，转而安慰董子章：“大伯，你要真有困难，社里再难也不能不管。”这种毫无原则的退让，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为敌人组织更猛烈的进攻火力提供了条件。到了第三次，钱三泰的投机买卖被群众识破了，这个不法之徒，欺负大成软弱，根本拒绝检讨。老郑要他挖思想根子，连个别老实、怕事的贫农都看不过眼，发表了意见，吴大成却连忙制止他们“别嚷！”同时为董子章“下台”制造阶梯，叫他回去。事后，也不见他再作任何处理。这就注定了他在和董子章遭遇的第四个“回合”里，也连续地吃了败仗。第四次的情况是这样的：董子章引诱小旺的那面资本主义大网已经收紧了，小旺已经成为网里的鱼。吴大成在忽然发觉之下，如梦初醒，气急败坏，竟然毫无准备地跑到董子章的面前提出质问。由于他出师无名，目的不清，以至仓卒交兵，言不及义。他开始责备董子章当初不该拒绝收留小旺，及至对方狡猾地以“这是我们董家的事”来作挡箭牌时，他却又智尽才穷，无话可说了。结果，只好顺风转舵，反过来要求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好好教育”小旺而鸣金收兵。

这，便是《北国江南》中首屈一指的“英雄人物”吴大成。

大成的妻子银花，也很值得我们注意。这个人物身上，灌注了作者更大的希望与“热情”，是一个曾经精心雕琢的艺术形象。

从电影故事情节看来，银花是一个不居任何要职的普通家庭妇女，但她却又是一个共产党员。银花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入党的？影片没有交代，我们无从知道。在序幕中，我们看见她流着悲伤的眼泪，目送逃荒的人群；默默无语地为童年的小旺加衣；在大成被褚占奎绑走的时候悲痛攻心，昏厥过去，双眼失明……。后来，故事发展到解放以后农业合作化的年代，发展到银花明确地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的时刻，这个人物的形象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她的性格仍然是温柔、贤淑、逆来顺受的；她的表现，仍然是忧戚、沉默、时时流泪的。她的思想与行动的基调，和解放前那些苦难的日子比较，仍然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黄土屯的阶级斗争没有引起她的注意，生产斗争她似乎也漠不关心。她只是象一个普通主妇那样，缝缝补补，烧茶煮饭，嘘寒送暖。亲人的工作失利，她耽心、焦急；群众有了争论，她好心地调解；弟妹们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

她溫存地劝导，以感情来感化他們。仅此而已。

在打井抗旱的工作中，群众对大成的领导作风有意见，不少人在打井的陣地上撤退下来。銀花一急之下，重新双眼失明。可是，为了怕影响大成的情緒，又“痛苦地克制着自己”，极力避免和大成发生論爭。后来，大成生气走开，她又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跌跌撞撞跟过来安慰他，劝他莫为自己耽心，根本不敢提工作問題。

由銀花一手撫养长成的小旺，追求资产階級生活方式，好逸恶劳，貪心忘本。銀花却对他十分爱惜，生怕別人触动他一根毫毛。小旺不做功課。她說：“让他多玩一会儿吧！”小旺脑子里的资产階級思想越来越严重，她說：“唉，小旺呵，太年輕！”明新不同意小旺走資本主义道路，俩人爭执得动起手来，小旺卷起鋪盖就要走。她說：“明新就不該动手打他！”最后，小旺不仅置社会主义新农村于不顾，也置和銀花一家的患难情誼于不顾，提起脚就走了，她仍然追到村边，为这个社会主义的敗子加衣！

这就是共产党员銀花的形象。

县委书记张忠出场不多，然而他在影片里体现着党的最高领导。他的言行，也是检验黄土屯地区无产阶级思想作用和党的领导作用的試金石。

除序幕外，张忠在影片里一共出现了五次。其中，首、尾两次都是充当陪送銀花治愈眼睛回家的角色。第一次，县委书记和銀花坐在双套馬車里，扑扑风尘地駛向黄土屯。之后，我們就只看見他在那个滿天星斗的晚上，嘱咐大成：“要挖掉这个穷根子！”除此而外，再也沒有听见他說什么和黄土屯全村人民利益有关的話。

黄土屯党支部深夜召开支委会之后，我們第二次看見了张忠。他为了不愿打扰乡亲们，在农业社办公室的桌子上打开了简单的行李卷。他給了人們以勤俭、刻苦的印象。但是，人們仍然不得不提出疑問：前此不久，黄土屯发生了一场风灾，反革命分子利用特大风砂，放走社里全部牲畜。这件事不曾引起吳大成及其他党员、干部的怀疑，难道竟也同样沒有引起县委书记的警惕？张忠所参加的支委会，影片虽未作正面描写，但从大成向銀花所作的传达里可以看出，县委书记除布置打井、扩大防风林等任务外，半个字也沒有涉及階級斗争。在他的脑子里，和吳大成一样，一切为了抗旱，为了挖“穷”根子！

事实无情：黄土屯的階級矛盾在急剧发展，敌人的进攻日益猖獗；生产斗争因而处处碰壁，很不順利。而我們看到的张忠却始終游离于这些矛盾斗争之外。举行支委会以后，他虽然两次为“解决矛盾”而出現在村里，却没有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他也曾有一次向大成談起“今天还有階級，还有階級斗争”，但那无非是抽象、空洞的寥寥数語罢了。他既沒有根据黄土屯的实际情况，分析研究敌人的动向；也沒有针对党员、干部所存在的問題給予教育。这当然很难給敌情观念淡薄的吳大成以什么帮助。

张忠最后的出現，仍然是伴送銀花治愈眼睛回家。和第一次相比，只不过双套大馬車換成了吉普車。而在这场戏里，主角是銀花，人們关心的是銀花的眼睛，张忠所能够說的，也不过是有关銀花的眼睛的話。因此，在观众的印象里，这位县委书记是关心人的，但他关心的却是象銀花这样的少数人，甚至是个別的人。对于和广大群众生死攸关

的階級鬥爭大問題，他却既不關心，也毫無辦法。

二

黃土屯三個主要正面人物在影片中的表現如上，他們的精神面貌究竟如何？他們體現了作者的一些什么思想？

吳大成，作者是把他在矛盾衝突的尖端來寫的。這個人物面臨不少複雜的矛盾衝突。他的最突出的特點是：一、在階級鬥爭十分複雜的情況下，本末倒置地把人和自然的矛盾上升到主要的地位；仿佛在他的心目中，從來不曾想到還有階級敵人存在，還有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鬥爭；還有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建設成果的必要。二、在真正的敵我矛盾面前，他總是抬不起頭，伸不直腰，不能理直氣壯地進行鬥爭；在大風大浪里躲躲閃閃，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於和敵人針鋒相對。正因為這樣，人們都看得很清楚：一直到影片的故事終了，錢三泰所代表的反革命勢力和董子章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絲毫也沒有服輸；吳大成所代表的正面力量，也根本沒有取得任何勝利。而吳大成這個形象，所能給予觀眾的，卻絕不是什麼共產黨員的光輝和力量，相反，不過是一堆站不穩階級立場的“軟骨頭”罷了。

這種情況，對於一個作為黨支部書記和社主任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可原諒、也不可理解的。

通過吳大成，我們可以隱約窺見作者的意圖——他熱衷於塑造一個埋頭領導生產建設的農村幹部形象，通過這個形象說明，階級矛盾既不是我們——無產階級製造的，也不是我們——無產階級挑起的。從而，他以麻痺為“坦蕩”，以階級軟弱性為“善良”，以對敵人的退讓為“通情達理”。並對它們進行大力的歌頌。為了不致有損人物的“溫良敦厚”的性格，作者筆下的吳大成就被描寫成看不見階級矛盾、不敢於進行階級鬥爭的、政治上的“低能者”。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確乎不是無產階級製造的，這種階級矛盾是客觀存在著，也確乎不是無產階級挑起的。但是，自覺掌握這種階級矛盾的發展規律，作為矛盾的一方，通過鬥爭，戰而勝之，促成矛盾的解決，卻是無產階級作為人類最先進的階級的首要任務。在這方面，任何強調“天真”、“善良”的想法都無異於把整個階級送到敵人的砧板上，作為他們的刀下之肉。

然而，電影《北國江南》恰好是從這一類“天真”、“善良”、“坦蕩”等毫無階級內容的概念出發，塑造了吳大成這個人物。以致把他的太平麻痺、敵我不分，寫成為“溫良敦厚”、“知情達理”。這就大大宣揚了超階級的“人性論”，也歪曲了階級鬥爭的實際。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銀花這一人物的身上。

銀花的特点，簡而言之，是：“以情動人，以情制勝”八個字。作者塑造這個人物，以精勝多，從關鍵處見其顯要，從平凡中示其“巨大”，從而，賦予銀花以“化干戈為玉

肩”的力量。

郑二嫂因为大成不关心群众生活，发誓再也不出工了。銀花的瞎眼，却使郑二嫂受到感动，也使那些“落后”的群众受到感动；群众和领导的关系因而得到调整，工地上忽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和谐、生动场面。小旺决心离开他所厌恶的农村，党、家庭、朋友、爱人，都没能打消他的主意，可当他听到銀花那一系列充满“真实”感情的“自白”，他的迈向资本主义歧途的双足就立刻收回了。

銀花的“情”在影片中所起的这些作用，反映了作者对这种“情”的估价，也反映了作者所期望、所要求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性论”者一味强调超阶级的、“人所共有”的至情至性，提倡什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强调“感情就是力量”。《北国江南》的作者也把影片故事中好几个发展转折的关键所在，放在銀花这个人物形象喷射出来的大量的“情”上。这就说明，“感情万能”已经成为影片进行具体艺术构思时的指导思想。当作者塑造这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形象时，他不是期望她在黄土屯那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综交织的恶战里，成为持戈带甲的无产阶级战士，而是要求她以“感化者”、“和事佬”的姿态出现。这样，蕴藏在銀花心胸深处的，也就不会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坚强意志，人类解放的伟大情怀，而不能不是“亲人”之间的温暖，邻舍之间的和睦，以及诸如棉衣、眼泪之类的琐碎事、儿女情了。

大成的精神面貌如此，銀花亦复如此，那么，县委书记张忠又是怎样的呢？就影片提供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看来，他不过是众多的人物当中，一个代表着党的领导符号，这个符号的作用，实际是为影片大量地描写“人情”、“人性”作掩护——您批评影片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不强吗？张忠就是党组织的代表；您认为影片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吗？张忠出来提醒大成：“今天还有阶级斗争”。这样，那些“至情”和“至性”之类的东西，在县委书记的“障眼法”之下就能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

影片里的张忠在解决黄土屯的敌我矛盾中，诚然似有还无，但是就在这个人物身上，也绝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情”之所钟。瞧，县委书记从来没有主动地揭示过黄土屯的政治形势，他一心督促大成挖“穷”根子，如果不是钱三泰和董子章“逼人太甚”，县委书记决不会嘱咐大成“今天还有阶级斗争！”这个县委书记，不也很“天真”、“坦荡”么？此其一；在五次出场中，一次在农业社的办公桌上睡觉，两次为了伴送銀花，县委书记克勤克俭和对群众关心入微的描写，较之关于他的思想领导的描写更能给观众以突出的印象，此其二；县委书记参加黄土屯的支委会，和大成讲阶级斗争的道理，都被隐没到银幕背后，成为抽象而空洞的“幕后戏”，而谈家常、送銀花等生活琐事却被纳入镜头，他给人的感觉，又是多么懂得“人情”？此其三……。总之，作者着力描写这个县委书记的人情味，小心翼翼地排斥着他的原则性和斗争性。这样，怎能在银幕上出现一个真实的、令人满意的县委书记形象呢？

显然，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指导着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使之不能正确地、准确地反映黄土屯的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和改天换地的生产斗争，使他笔下的人物

不能認識到階級鬥爭的存在，從而掌握它的規律，通過鬥爭，獲得令人信服的勝利。電影《北國江南》中的三個主要正面人物，無論是吳大成、銀花和張忠，他們形式上置身階級矛盾之中，實際上游离於階級鬥爭以外：敵人磨刀，他們陪笑；敵人講階級顛覆，他們講階級調和；在他們身上，看不見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精神；在他們頭腦里，沒有黨的政策和群眾路線。他們所有的，不過是朋友之情，養育之恩，個人關係，面子威信，情感良心。

三

黃土屯的政治情況和經濟情況都很複雜，在這裡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有着重重的困難。要戰勝這些困難，首先必須在黨的領導下，調整兵力，組織好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樹立其政治優勢，着重扭轉政治上的被動局面，挖掉錢三泰之流的反革命壞根子，挖掉董子章之流的資本主義臭根子，然後，才談得上挖掉黃土屯的“窮”根子。

但是，按照影片塑造既定的吳大成、銀花、張忠等人物的性格，他們既看不見階級鬥爭，自然也就無從重視什麼貧下中農階級隊伍的力量，他們眼里看得見的，心里記得住的，從理智到感情都認為是可以依靠的，根本不是什麼廣大的階級兄弟，却是“抱成一團”的“吳氏一家”。

黃土屯陷入旱災，黨支部決定打井抗旱，黨支部吳大成既不徵求群眾意見，也不發動群眾起來行動，而是要求自己的一家人“抱成一團”，為的是：“可不能讓人說咱一句閑話，丟全家的臉啊！”當下，全家來了個“誓師”，各個表示態度。在嚴重的旱災面前，愁眉苦臉的黨支部書記歡笑開顏了：“好，記住就干。咱們來他個改天換地！”

接着，銀幕上就出現了這一家人奮不顧身，積極帶頭，投入勞動的許多鏡頭。大成總是把“重活”派給自己的弟妹；當井打不出水來，群眾失去信心的時刻，大成帶着明新，在空曠無人的工地上孤軍作戰。不久，井標被反革命分子悄悄移動了，困難一個接一個擺在面前。就在這樣的窘迫的條件下，無論大成、無論關心大成的銀花或是領導着大成的張忠，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去听听群眾的意見，和大伙兒一同找找克服困難的辦法。一句話，他們根本忘記了還有群眾存在！

黨時時刻刻教育我們不要忘記走群眾路線。為什麼吳大成、銀花、張忠他們竟然不相信群眾的鬥爭力量，不理解群眾在鬥爭中的偉大作用？回答很簡單：他們不愛群眾。他們是“感情”的化身，然而他們卻缺乏階級的感情；他們愛自己的親人，他們却不愛廣大的貧雇農群眾。例證之一，就是貧農鄧天祿借了董子章的錢，被綑了手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為他跑腿搞投機。黨支部書記兼社主任的吳大成對此不關心，而對小旺的伯父、不法分子董子章卻是那麼關切備至。

這就難怪影片把所有解決矛盾的關鍵都放在“吳氏一家”以及與這一家有關的人們的“感情基礎”上；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由於“親人”的兩行眼淚，

消逝得无影无踪；黄土屯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由于“妻子”与“朋友”的疾病，就不存在了；錢三泰反革命面目的暴露、董子章与革命人民群众的阶级矛盾的解决，主要是依靠资产阶级分子的“天良发现”。而这“天良”之所以能够发现，与大成的尊之为“爷”、与銀花的轻松的“算了”也并非绝无关系。由此看来，感情的力量，亲族的力量，真是何其巨大！这一点，只怕也就是电影《北国江南》所要宣传的中心思想了吧？

但是，从作者思想感情出发而不是从生活真实出发的虚构，决不能掩饰作品先天带来的致命伤。本来，挖掉黄土屯的“穷”根子，理当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胜利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毫无疑义应该来自党的正确领导，来自广大贫下中农群众的团结一致和坚决斗争；来自他们巨大的智慧和气吞河岳的干劲。在影片里，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我们看见的，只是“超阶级”的“感情”，制约着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超阶级”的“良心”，成为调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指挥棒；“家族”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如此而已，一大堆虚假的现象。就在这些虚假的现象包围下面，影片借助于资产阶级分子突然的“天良发现”，结束了“骑虎难下”的阶级斗争；借助于变质青年因受感动而“幡然悔悟”，为社会主义思想毫无根据的胜利自圆其说；最后，还借助电影“蒙太奇”的“急变”手法，象耍魔术那样，令人眼花缭乱地，把一个百孔千疮、风雨飘摇的黄土屯、变成了“草原千里绿、遍地见清泉”的米粮仓。

明眼人不难发现这里的许许多多的漏洞。例如，和反革命分子共穿一条裤、对农业社“什么都使得出来”的董子章，并没有经过任何教育和改造，他血管里的颜色，真能由黑变红吗？他眼见没什么“便宜”好占的农业社日益兴旺，他那“吊上半只羊、烫上一壶酒”的“小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真能发出衷心的欢笑吗？谁能保证他不再有“我也不让他们（指农业社）好脱生”的恶谋呢？又例如，銀花的眼泪和叹息，真正留得住思想已经和劳动人民分家的小旺吗？脑子里没有半点社会主义思想，原有的观点立场、思想感情分毫未动，一时的感情波澜，能够化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吗？不要斗争，只要“良心”，只要“感化”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呢？如果说它也能“改天换地”的话，那么，被改掉的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天，换来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地；如果说它也能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也只能是“合二而一”的解决，让资产阶级来溶化无产阶级，让资本主义道路来战胜社会主义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四

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作者世界观的反映。作者的立场、观点、态度，总是顽强地表现在他认为是典型的形象里；表现在他所肯定的和否定的形象里；特别是表现在他有意識予以突出刻划的形象里。电影《北国江南》塑造的三个主要正面人物，无论是阶级观点模糊的吳大成，无论是“以情感人”的銀花，也无论是似有如无的张忠，他们都是作者所肯定的形象，他们身上都有着明显的、被作者美化的痕迹。就连他们否认阶级斗争，实行阶级调和，否认群众力量，实行家族办社等一系列错误思想行为的结

果，也被美化成为“改天换地”的胜利。

通过这些人物及其思想行为所引起的結果，作者告訴我們一些什么呢？作者告訴我們：一、搞生产斗争，可以不必搞阶级斗争。只要领导作风不简单，不生硬，生产斗争自然取得胜利。二、阶级矛盾的解决，不必经过斗争、转化的过程。阶级敌人自会“天良发现”，举手投降。三、对于那些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而举步歧途的人，要想他们“回头是岸”，温情厚爱的“感动”就是“灵丹妙药”，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都是徒劳无功的，伤感情的。四、感情就是力量，亲族就是骨干，党组织可有可无，群众，是靠不住的。

这正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的体现。“人性论”是资产阶级、也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代替具体的人的阶级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同时，也以它作为道德标准、艺术标准和作家创作的基础，从而否认文艺的阶级性，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他们眼里，作品的是否成功，形象的是否能够在作品中站起来，关键就在于是否表现了这种“共同的人性”。他们热衷于描写那些“天伦之乐”、“亲子之情”、“人的血性”、“人的侠义”……，并且尽力使这些抽象的概念披着“超阶级”的外衣，鼓吹阶级调和的论调。他们的目的十分明显，无非是企图模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线，麻痹人民的斗志，取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周扬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文中说：“……以历史唯心论反对历史唯物论，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人性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高尚的人性”，这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实质。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在中国新文学中也可以找到它自己的历史。梁实秋就是这种“人性论”的提倡者，他说：“文学一概都以人性为主，绝无阶级的分别”，继他之后不久，又出了个标榜“文艺自由论”的胡秋原，主张把什么“高尚的情操”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胡说什么“文艺的最高目的就在于消灭人类间一切阶级的隔阂”。无论“以人性为主”也好，要表现“高尚的情操”也好，花样变换了千种万种，它们的目的还是一个：要求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许文艺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工具。

文艺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的精神状态标记，它怎么可以脱离阶级社会的性质而孤立起来？文艺是不可能排斥感情的反映的，然而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又怎能反映那种“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既然如此，抽象的人性和抽象的感情都是不存在的，所谓“超阶级”也者，本身就是骗人的幌子，在这种幌子后面，修正主义者和梁实秋、胡秋原之流希望作家、艺术家们宣扬的是什么东西，也就一目了然了。

其次，这也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使情成体，以情动人”的美学观点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使情成体”是把感情当作艺术的唯一的源泉，而实际上是要艺术离开生活的实际，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来表现“超阶级”的感情。周谷城先生所主张的所谓“艺术作品，只要是体现了真实感情的，都是可以动人的”就是本于这种资产阶级的 美学观点。而电影《北国江南》所描写的故事、人物、情节，乃至整个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则是这种“使情成体”的美学观点指导下的创作实践。

周谷城先生在他的关于艺术的见解方面，根本否定了现实生活斗争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的真理，硬说什么艺术是“以情感为其源泉”，主张作家、艺术家只要“使情成体”就是完成了创作任务。这种观点，显然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反映现实的基本观点。按照周谷城先生的主张，艺术作品中必然完全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剩下的只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不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这样，也就否认了社会上有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存在。周谷城先生的这个主张，在电影《北国江南》里得到很贴切的印证。由于“使情成体”，一切从“情”出发，这部影片虽然也罗列了千头万绪的阶级矛盾，然而，牵制全剧的却是争夺小旺的这条“主线”。而在这条主线里，作者抽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大量地代之以个人的恩怨，于是就把一场在实际生活里原是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改变了性质，写成人性的冲突；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改变了性质，写成为伦理关系的纠缠了。同样的原因，影片里的三个主要人物——大成、银花、张忠，也不是作为阶级的人在活动，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不是阶级矛盾的反映，而只是作为独立的、自然的人，在受到外界刺激后的“生理性”的反应。银花和郑二嫂争吵后瞎眼，是这种反应；银花追赶小旺时的伤心痛苦，也是这种反应；大成觉得家里人不理解他，痛苦地走向另一间房子，是这种反应；大成在工棚里回答钱三泰的挑衅，也是这种反应。从“情”出发，从“超阶级”的“人情”出发，并把这种观点具体运用到作品中来，用以解释人物的思想活动，当然只能使他们成为超脱社会、超脱阶级，而只凭情感来独立活动的“超人”了。

周谷城先生在他的对艺术的见解部分，对艺术品的社会功能的理解是：“以情动人”。是什么样的情呢？他认为，必须表现“真实的情感”，反对提“阶级感情”。他说：“真实感情范围大于阶级感情，我们讲艺术理论，当取范围大者”又说：“……个人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是具体的，决不是含糊笼统的阶级感情四字所能代替”。简而言之，就是主张艺术作品以“超阶级”的“共同人性”来教育读者和观众，来解决作品自身提出的矛盾。这一点，也在电影《北国江南》中得到了体现。为什么影片的作者把黄土屯党支部书记吴大成写得在敌我斗争面前那么软弱无能呢？这正是因为有着“以情动人”的宗旨，抽掉了人物身上的阶级性，凭空加上了“人所共有”的“人性”的缘故。吴大成在序幕里原有的反抗性、斗争性等鲜明的阶级特征，在正片里完全消失了，影片甚至不敢于稍稍涉及这个人物在解放后，走向阶级自觉、走向政治成熟的过程，却多方强调他的“善良”、“谦恭”和“懂人情，识大体”，以这样的“情”来打动观众，也以这样的

“情”来解决出现在人物面前的、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在銀花身上，这种“范围大于阶级感情”的“真实感情”，表现得更为突出。作者以富有感情色彩的笔触，揭示銀花那“美好”的心灵中的“慈爱”和“贤淑”，歌颂她的“教化”成功，正是极大地体现了“以情动人”的意旨。就是在县委书记张忠身上，也由于回避“阶级感情”而没有给予这位党的领导人以应有的阶级觉悟。电影《北国江南》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周谷城先生的美学观点、美学理想是如此的息息相通，水乳交融，这难道是一种偶合的现象吗？

我们说，怎样理解现实生活，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也就有着对现实生活的不同理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情或性，是人类主观的产物，是第二性的东西；而产生这种情或性的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什么阶级的人，有什么阶级的情或性。周谷城先生援引“农民对天灾所生之感，渔民对海浪所生之感”，来说明这些情感和“阶级情感”无关，事实上，任何人都知道，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人，对于自然灾害从来都是抱着积极的、乐观的、实事求是地战而胜之的态度，不论天灾或者海浪，吓不倒无产阶级的英雄汉。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人则恰恰相反。这正是不同阶级的不同世界观的反映，正是第一性——“阶级性”的伟大作用。同样，在电影《北国江南》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超阶级”的、“人所共有”的“至情”“至性”，其实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才是藏在“超阶级”帷幕后边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拿銀花来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她对黄土屯的阶级斗争熟视无睹，不闻不问？为什么她对损害社会主义集体利益的思想行为毫无感觉，而对于个人的一点点微小的创伤都痛不欲生？这难道也可以叫做“共同的感情”吗？

但是，周谷城先生他们偏偏无视艺术作品里这种鲜明的阶级倾向，还硬要宣传什么“真实的感情”，并且强调各敌对阶级思想意识的“汇合”是“广泛流行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很显然，电影《北国江南》的作者，倒是愿意通过作品来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只是，这个作品的失败恰恰说明了这种“时代精神”的虚伪性和它的彻底破产。因为，在影片中，泛滥成灾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根本找不到一丝一毫无产阶级的精神；由此可见，不加批判地为那种抽象的“人性”大唱赞歌——无论是引据立论地唱赞歌，是抒情写意地唱赞歌——实际都是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道德观念文过饰非。在这一点上，周谷城先生和《北国江南》的作者决不比梁实秋之流更高明。而《北国江南》遵循着错误的资产阶级美学观，不仅在内容上歪曲了阶级斗争，在艺术方法上，也成为一部反现实主义的作品。

资产阶级文艺通过理论和创作实践，向社会主义大举进攻。它们采取的，是迂回曲折的进攻道路，“使情成体”、“以情动人”、“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以及由它们指导所产生的作品，都是以“含糊笼统”的“感情”为借口，暗中运输着危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毒药，企图使革命的文艺变色变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辨别是非，不懈地进行斗争，才能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才能在“兴无灭资”的战斗中夺取最后的胜利。

《指物論》譯釋與批判

林 振 環

現存公孫龍子六篇，除了《述府》一篇系屬一種“別傳”性質以外，其餘《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和《名實論》等五篇都是有關邏輯學上某一項問題的著作。其中《指物論》一篇實包涵着全書中全部邏輯思想各種基本理論的因素，其應用貫穿到其他各篇。

據我所見，《指物論》這篇作品原是公孫龍子為了闡明其關於“實在”或“存在”上的各種問題，依於邏輯上的見地所建立起來的各種基本理論，作為他在《名實論》等篇中所進行的各種邏輯論證的理論根據而寫作的。而過去一般的注家大率卻傾重在向認識論方面的問題上來尋求它的意義。如對在整篇作品中占居着一種最根本的重要地位的“指”字的意義，過去各家所作的所謂“是非”、“能所”、“境識”、“名”、“表德”、“概念”、“共相”等等一類的解釋，都可以看作主要是從這一方面上來尋求的結果。當然，關於“實在”或“存在”上的問題和關於認識論上的問題的談論是可以有一定的關聯的，但兩者究竟是不同的問題。下面就自己的一些看法，試為《指物論》進一解。

關於幾個基本概念的說明和全文譯釋

《指物論》開端第一句話：“‘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提出了三個基本概念。它在下文接着反復進行分析和論證的都無非是關於這幾個概念彼此之間各種互相關系的問題。我們必須首先把這幾個概念真正涵義弄清楚，在解釋這篇作品各種意義時，才不至陷於先入的成見，或者聽憑自己一時的感觸，隨便望文生義，以致發生“進退無據”，“多所牴牾”等等一類的現象；才可以按照作者自己思想的原樣，達到前後互相照應，上下一致貫通，“怡然理順”的效果。這三個基本概念是：（一）“物”，（二）“指”和（三）“指”。下面分別簡單說明這幾個概念的涵義。

（一）“物”：“物”是“‘物’莫非‘指’”中的“物”。公孫龍子所謂“物”是什麼？在《名實論》中他自己下了一個很明確的定義。他說：“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這是指着任何一種表現出有所“存在”的東西而說的。因為既非“天地”本身，又非它“所產”的東西，它就根本無從表現它的“存在”。它不僅包括了任何一種普通所謂物

质的现象，也包括了任何一种普通所谓精神的现象，以至于包括了任何一种物质上精神上的现象所具有任何一种特性所构成的任何一种关系，表现出任何一种运动或作用等等的“存在”。在《坚白论》中，他把“白”、“坚”、“目”、“手”、“火”、“捶”、“神”、“见”、“知”等等的现象混同并列起来，把它们都当作是各各分离而独立的“存在”，（见“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这也可以说明：他对于任何一种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存在”都是一样看待的。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公孙龙子所谓“物”的涵义。

（二）“指”：“指”是“‘物’莫非‘指’”中的“指”和“而‘指’非‘指’”中的第一个“指”。对这个概念中的涵义的正确了解，可以说是正确了解《指物论》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什么是“指”？它的意义本来也是没有什么玄奥的。王琯认为“指”字当作常义的“指定”解。这种说法在字义上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这所谓“指定”，却不是像他自己和其他许多人所设想那样是在我们的言语或思维中，用以指称各种事物的“名词”，而是存在于任何一“物”本身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是一种“有所指定的东西”）。所谓一种“指定的存在”，具有三项重要的内涵。首先，一种“指定的存在”是“存在”。“存在”是对于“思维”或“认识”而说的。过去的注家关于“指”字的意义所谓“表德”、“名”、“概念”、“共相”以至于“境识”、“能所”、“是非”等等的解释，都是倾重在“思维”或“认识”上的内容来求理解的，所以都不符合于“指”这个概念的真正涵义。依照上面所说公孙龙子对于“物”字所下的定义，“物”是可以包括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现象而说的。因此存在于“物”中的“指定的存在”也可以是一种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存在。但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在它作为一种“存在”时，它就是客观性的，而不是构成主观性的思维或认识的内容。这就说明，上面所说“表德”等等东西，在一种意义上，即在它们各别作为一种“存在”的这一点上，都可以属于“指”字所能应用的范围，但我们却不能就用这东西来解释“指”字的全部意义。其次，一种“指定的存在”是“指定”的，具有“规定性”的。这种特性是一种“指定的存在”要实现其自身所必不可缺少的。如果“无所指定”，则所谓一种“存在”就没有着落。如果没有任何的“规定性”，则一种东西就与任何另一种东西没有区别，这样它又怎能实现只是自己那一种而并不是其他任何一种“指定的存在”？再次，所谓一种“指定的存在”的“一种”又是与其他种种的“一种”同时存在着才能成立的。如果没有种种的“一种”同时存在着，就没有东西划出彼此的界限。如果没有界限，则任何“一种”的“存在”也就不能成其为“一种”“存在”了。在这种意义上，一种“指定的存在”又是具有“杂多性”的。所谓“‘物’莫非‘指’”的话也说明了这种意义。“物”是“杂多性”的。任何一“物”既然都是一种“指定的存在”，则后者当然也具有“杂多性”的。关于“指”字的意义做这样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把以上所说三项的内涵彼此交互结合，有机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理解所谓一种“指

定的存在”的意义。

(三)“指”：“指”就是“而‘指’非‘指’”中的第二个“指”。它的意义是“指定的存在”的自身。一种“指定的存在”和“指定的存在”的自身是不同的，所以说“指”非“指”。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在《指物论》中一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下面我们将有详细的解释。现在，只说明这一点：“指定的存在”自身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是它的“单一性”。这是不难理解的。“杂多”的东西，它们的所在就不是“指定”的，因而“指定”的东西本身也就不能具有“杂多性”，而只能具有“单一性”。

“单一”和“指定”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有关上项问题的解答。在上面说过一种“指定的存在”是具有“杂多性”的。具有“杂多性”的东西和具有“单一性”的东西是不同的。这不就可以说明“指”非“指”的意义么？关于“指”字的意义，这是我们所必须理解的一个要点。

以上是关于《指物论》中三个基本概念的涵义的简单说明。但在这里还须附带说明一点：过去的注家，有些人把《指物论》中“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和“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这两句话中“物指”两个字看成是表达一个单一的概念的，从而把它当作另外一个基本概念来处理。依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欠确切的。首先，《指物论》第二大段（从“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句起，到最后“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句止）中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承接着第一大段（从开端“‘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句起，到“‘指’与‘物’非‘指’也”句止）中所提出过的几个基本概念，而再加以某种阐明或申论的，但在第一大段中并不曾有过“物指”这样一个名词。其次，在第一大段中曾经有过“‘物’非‘指’”和“‘指’非‘指’”这样两层的论证，如果把“物指”这两个词当作一个单一的概念来看待，则在第二大段中至多也只能说是承述了“‘指’非‘指’”这层意义，它显然遗漏了“‘物’非‘指’”这层的意义。这是不适当的。因此，“物指”这两个词必须当作“物”和“指”来解释才行。它是把“物”和“指”这两个基本概念联系起来谈的，并非另外一个基本概念。

根据上面所作各种说明，我们可以看见本篇内容都无非是为着证明第一大段中一个基本大论题和建立第二大段中两个基本大论断而展开的。由于在第一大段中那个基本大论题的内容包含着两个部分，因此，关于在这篇作品中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基本理论可以归结为下列四个基本大论点，这就是：（一）“‘物’莫非‘指’”，（二）“‘指’非‘指’”，（三）“‘物’、‘指’和‘指’”这三者是彼此共同存在的；（四）“物”、“指”和“指”这三者又是彼此独立而分离的。按照我们上面说的关于三个基本概念的涵义，试把这四个大论点中的意义综合来考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约略看见了在公孙龙子的心目中关于整个世界内容的一幅简单的画图：包括了任何一种个别“存在”现象的种种的“物”，跟存在于它们各各本身中的种种的一种“指定的存在”，以及“指定的存在”的自身，以无限各别不同的态况，都“各据一方”，互不侵犯地共同存在着。这样地显现出来，也隐藏起来一个无量无边，风平浪静的“存在”的大海洋，这就是构成他的一种绝对多元

論的世界觀的骨架的几根很粗糙的大綫条一个很簡單的剪影。由于他的“物”包括着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存在”的現象，他的这种世界觀当然不能說是唯物的，但說它是純粹唯心的，似乎同样也未能适当。把它說为“心物多元”的，可能比較确切一些吧。当然，由于它的这种世界觀事实上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的面貌，它也就到底同样不能免于一种唯心虛构的性质。不过它同一种純粹的唯心主义世界觀，明确地主张只有一种精神上的存在才是真正实在的，似乎还是应当有別的。关于这项問題，这里暫且不再多談。这里想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指物論》中所构成公孙龙子这种絕對多元論的世界觀这四个基本大論点連同他在論証这四个論点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重要的基本大論据，实奠定了他的全部邏輯学說中各种最基本的理論基础，并貫穿到其他的各篇中。为了对于《指物論》这篇作品中的內容作出一种比較更为詳細的解析，現在接續着分段逐句再做一番譯释：

任何一物都无非一种“指定的存在”，但在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却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所以說任何一物都无非一种“指定的存在”，因为如果世界上沒有一种“指定的存在”，則任何一物都无从可以叫做該一物了。（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謂“物”。）如果說任何一物不是一种“指定的存在”就等于說它沒有它自己的規定性，也就是說它同任何別的东西都沒有区别。这样，我們当然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只把这一物叫做該一物了。比方，如果“馬”这一物沒有它自己的規定性，則它就同“牛”、“羊”或“猪”等等都沒有区别，这样我們就沒有理由可以只把“馬”这一物叫做馬了。

所以說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却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首先試問世界上所有的随时随处都是物，物可以叫做“指定的存在”么？（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可以叫做“指定的存在”这样东西是世界上所沒有的。（“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由于世界上所有的都是物，而物乃是随时随处都存在着的，所以可以叫做“指定的存在”这样东西是世界上所沒有的。（參看关于基本概念的說明节中关于“物”的“杂多性”和“指”的“单一性”的說明。）而物則是世界上所有的。（“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当作世界上所沒有的东西来看待，这是不可以的。（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这就是說由于世界上沒有叫做“指定的存在”这样东西，因而任何一物都不可以叫做“指定的存在”。（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也。）而說任何一物都不可以叫做“指定的存在”就等于說任何一物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从上面所作关于“任何一物都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这种論証的內容中就可以分析出“任何一物都无非一种‘指定的存在’”这样的蘊涵。（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因为根据世界上沒有叫做“指定的存在”这样东西，所以可以推論任何一物都不可以叫做“指定的存在”，其中就包含有“在所有一切的物之中都並沒有非一种‘指定的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意义。（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

也。)这因为:如果在物之中有非一种“指定的存在”的,则这些物就是在世界上寻找不到的,也就是世界上所没有的。这样一来由于“指定的存在”这样东西是世界上所没有的,而有些物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则我们就不能断然决定地说任何一物都不可以叫做“指定的存在”了。而说在所有一切的物之中都没有非一种“指定的存在”的,就等于说任何一物都无非一种“指定的存在”。(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既然任何一物都无非一种“指定的存在”则在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就都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这是因为:既然任何一物都无非一种“指定的存在”,则一种“指定的存在”之所在就是“无所指定”的,也就是同“指定的存在”的自身涵义相背反的。所以在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都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参看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节中关于“指”和“指”的涵义的解释。)

让我们再从另外两个方面来说明在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说世界上没有“指定的存在”这样东西,由于任何一物都各有其自己的专名,而没有专名为“指定的存在”的。(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任何一物都不名为“指定的存在”,而又说它是一种“指定的存在”,则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都是兼有不为“指定的存在”的。(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把兼有不为“指定的存在”的东西看作是不兼有不为“指定的存在”的东西,这是不可以的。(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这里所谓不兼有不为“指定的存在”的东西是指“指定的存在”的自身而说的,因为“指定的存在”的自身当然是不兼有不为“指定的存在”的。整句话中的意思就是说明在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的意义。

并且一种“指定的存在”乃是世界上的物所兼有的。虽则说世界上没有叫做“指定的存在”这样东西,但在物之中却不可以说没有一种“指定的存在”。(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所以在物之中不可以说没有一种“指定的存在”,由于在一切物之中没有非一种“指定的存在”的。而说在一切物之中没有非一种“指定的存在”的,就等于说任何一物都无非一种“指定的存在”。(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定的存在”的自身本来并不是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但在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既然与物相兼就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了。(“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由于任何一物都无非一种“指定的存在”则在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就是与物相兼。根据上面所说“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不可”的规律,这同样说明在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的意义。

最后谈谈关于“物”、“指”和“指”这三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设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物和在任何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谁径说起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的话?设使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物,谁径说起一种“指定的存在”的话?(使天下无“物”、

“指”，誰徑謂非“指”？天下无“物”，誰徑謂“指”？）設使世界上有“指定的存在”的自身而沒有任何一物和在任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誰徑說起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的話？徑說起沒有任何一物非一种“指定的存在”的話？（天下有“指”无“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无“物”非“指”？）对于“物”或“指”才說它非“指”，設使“物”和“指”都根本不存在，則由于說話的主詞失却对象話便无从說起。对于“物”才說它莫非“指”，設使“物”根本不存在，話也同樣无从說起。由于世界上沒有“指”而有“物”和“指”，才說“物”或“指”都非“指”，才說无“物”非“指”，設使世界上只有“指”而“物”和“指”都根本不存在，同樣由于說話的主詞失却对象話也便无从說起。由此可見，“物”、“指”和“指”这三者之間的关系是有彼此共同存在的意义的。

可是在任一物中的一种“指定的存在”本来自己就成为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它又何所待于任一物而始与之成为一种“指定的存在”呢？（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当任何一种“指定的存在”存在的时候，自然就有种种的一种“指定的存在”与之相并立而存在着，否則沒有东西来为彼此划出界限，即任何一种“指定的存在”都不可能存在了。（参看关于基本概念的說明节。）既然有种种的一种“指定的存在”相并立而存在着，則一种“指定的存在”之所在就是“无所指定”的。一种“指定的存在”既然是“无所指定”的，則它就自然跟“指定的存在”的自身涵义相背反，也就是說它自己就自然作为一种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的東西而存在着。而一种“指定的存在”既然自己就自然这样地存在着，它当然也就无有所待于任一物而始与之成为一种“指定的存在”了。由此可見，“物”、“指”和“指”这三者之間的关系又是具有彼此独立而分离的意义的。

把《指物論》的全文作了如上的譯释，我沒有从文义以外任意增刪或篡改了原文的任何一个字，自觉頗能达到一种“怡然理順”，整篇脉絡貫通的效果。质諸讀者，未知以为如何。

关于《指物論》的基本論点如何貫穿于其他各篇举例

在本文开端时，我們曾經說过，在《指物論》中包涵着公孙龙子全部邏輯思想各种基本理論因素，其应用实貫穿到其他各篇中。关于这样一桩事实的一种詳細的說明，当有待对各篇的内容分別再作一番精確注释的工夫。这不是本文的目的，也非个人現在綿薄的能力所能容許。在这里只能举出几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談談。比如：“白馬非馬”，是在《白馬論》中一个最主要的論題，这显然就是“‘指’非‘指’”这样一种理論在邏輯学中应用的一个典型。在这里，“白馬”就是第一个“指”，而“馬”則是第二个“指”。“白馬者馬与白也，馬与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馬与白”（或“馬与白馬”）是“有不为馬，而馬則是无不为馬”。“馬与白”（或“馬与白馬”）非“馬”，这恰是“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这一論据的应用。又說：“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

馬者无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应。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定所白者非白也”的說法，正好符合于“一种‘指定的存在’非‘指定的存在’的自身”这样一种公式。“无去取于色”，說明了“指定的存在”的自身的“单一性”。“有去取于色”表現出一种“指定的存在”的“多数性”。（参看关于基本概念的說明节。）“无去者非有去也”，这也就是“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这一論据的引用。“二无一”是在《通变論》中一个最主要的論题，这也无非是“‘指’非‘指’”这一論点的内容。在这里，构成“二”中的“一”是第一个“指”，而“一”的自身是第二个“指”。“二非一”的意义是說，参加构成“二”的“一”非“一”的自身。这是什么道理呢？参加构成“二”的“一”，由于它已参加构成为“二”，則它就兼有不为“一”的特性，而“一”的自身則完全沒有不为“一”的特性。因此，“二”中的“一”就非“一”的自身。所以說：“二无一”。经过这样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理解，在这項論题的建立中，分明也是包含着“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这一論据的应用的。在《坚白論》中，多方論証“坚”与“白”是相离的，“坚”、“白”与“石”、“物”也是相离的，以至于世界上一切都是相离的（“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在《名实論》中，則努力強調“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这样一条規律。这些情况，更表現出《指物論》中所主张的“物”、“指”和“指”这三者都是共同存在而独立分离的。在这些篇的内容，都是《指物論》的理論，讀者們从較多方面去寻求，当可以得到更为滿意的解答。

关于公孙龙子的邏輯思想在我国古代邏輯思想史中的地位

最后，簡單談談关于公孙龙子的邏輯思想在我国古代邏輯思想史中的地位問題。从上面所說明关于公孙龙子的邏輯思想中的基本理論以及这些理論在各篇中各种应用情况中，我們可以看見，公孙龙子的全部邏輯思想显然貫徹着一个“同一律”的精神。“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这样一条規律实质上就是一个“甲是甲”的公式。因为那时庄周一流倡导“两行”論，邓析一派传下“两可”之說，以至各种各样的“无名主义”、“相对主义”的思想正在流行，公孙龙子把一个“同一律”的招牌高高掲举起来，提出了“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的命題，这对于冲击当时流行的“两行”論和“两可”之說是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的。可惜的是：他把这条規律的一方面絕對化起来了，竟至完全抹煞了它的不可缺少的另一个方面，致使他自己的邏輯思想就不免于脱离了现实，而陷于詭辯之一途！原来同一律中的所謂“同一”，应当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思維的自我同一，二是思維的相互同一。前一意义可用“甲是甲”的公式来表达，例如：“白馬是白馬”。后一意义則可用“甲是乙”的公式来表达，例如：“白馬是馬”。必須把这两种意义在不同的关系下相互补足起来，同一律才可以真正發揮其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的效能。由于公孙龙子片面強調了思維的自我同一这一方面，而根本否定了思維的相互同一这一方面，把同一律的“同一”絕對化起来，就把矛盾律的“矛盾”

絕對化起来，竟致把“白馬非馬”（“个别非一般”），“二无一”（“整体非部分”）以至于“石非坚白”（“实体非属性”），“石的坚（白）非坚（白）”（“实体的属性非属性”），等等一类的命题都絕對化起来，僵硬地坚持不放。这样，在一种意义上就使他自己的邏輯理論完全丧失了帮助人們正确認識客观现实的作用，而只能流为一种概念上的游戏了！他的这种邏輯思想同他的絕對多元論的世界观是密切联系着的。这种世界观主张一切事物都是絕對分离独立的，这也是片面地突出了各种事物間的間断性的一个方面，而把它們間的非間断性的另一个方面加以完全掩沒，因而也就与客观现实世界的实际不相符合。不过，尽管这样，公孙龙子的邏輯思想的价值还是不可一笔抹煞的。比如“个别”跟“一般”这两者間存在着“一致关系”这一方面的意义是人們所习知的，但这两者間也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一方面的意义，却容易为人們所忽略。公孙龙子把后一方面的意义突出地強調了出来，这对于促使人們在进行思考时注意概念內涵上的縝密分析，提高对于全面考察問題的重要性的認識上，是可以产生一定的作用的。而这种的作用确实也曾产生过来了。据我看来，“墨辯”的作者显然就是由于接受了公孙龙子这种影响，因而能够比較注意更为全面地来考察各种問題，結果才帮助他們把我国古代的邏輯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試看在“墨辯”中，它既承认了“‘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經說下》）。这样一条規律，也容許了“‘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字旧重，吳鈔本不重，据正。）也”（同上引）。这样的一种的补充关于“同”与“异”这两者間的相互关系問題，“墨辯”中也表現出一种比較全面的態度。它說：“‘同’：异而俱于之一也”（《經上》）；又說：“同异交得，知有无”（同上引），諸如此类，我們显然可以看見公孙龙子的影响。公孙龙子的《名实論》中的邏輯思想，实以《尹文子》中“名以檢形，形以定名”的理論为其濫觴。而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學說，又可以視為对于《指物論》中“‘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一論点具有启发的作用。不过惠施是从异偏同而归于“万物一体”的結論，而公孙龙子则是从同偏异，以达到“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的結論罢了。关于公孙龙子的思想，在我国古代邏輯思想史中的地位，我們可以說，它是上推尹（文子）、惠（施）之波，而下疏“墨辯”之流的。

还必须指出：上面曾經說过：公孙龙子的絕對多元論的世界观，虽然跟一种純粹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不尽相同，但到底同样不能免于一种唯心虛构的性质。这样一种世界观，由于它歪曲了客观现实世界的真相，只能是为反动統治階級服务的。特别是，它的絕對分离主义的观点，根本否定了一切事物的轉化，就是从根底处鑄定了保守，取消了革命，这是极其具有反动性的。从邏輯思想上說，由于它片面地絕對化了概念間內在矛盾的一方，而完全抹煞了其他方面，这就使思維脱离了现实，致認識与客体不相适应，也就使他的各种理論不能不流于詭辯。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考察，由于它突出地揭露了概念矛盾的一方，就在这一方面不能不說它尚具有“一粒真理”。并且，他大力倡导概念分析的方法，在古代邏輯思想史中也不能不說是一种有价值的貢獻。

广东經濟学界就生产价格論問題举行討論会

最近，广东經濟学界連續举行三次討論会，討論杨堅白、何建章等同志关于平均利潤、生产价格的观点。討論中，在如下几个問題上，就杨堅白、何建章等同志的錯誤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

一、杨堅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生产价格論”的实质是什么？发言者指出，杨堅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关于生产价格論的观点是錯誤的，因为杨堅白何建章等同志离开了一定的生产关系来研究經濟問題，單純从社会化大规模生产这个角度来論証生产价格形成的必然性，从而违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濟学的党性、阶级性原則，实质上就是唯生产力論。生产价格論者的着眼点不是一般的价格如何形成問題，而是如何看待利潤問題，即企图以資本主义的利潤原則来取代社会主义的計劃原則問題。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从杨堅白、何建章等同志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他們的“理論”貫穿着如下的四个观点：1.唯利是圖論，2.利潤评价論，3.利潤刺激論，4.利潤調节論。一句話就是把利潤当作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把平均利潤規律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来調节生产。因而关于平均利潤、生产价格問題的論爭，是一场大是大非之爭，实质上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經濟建設要坚持計劃化还是要走經濟自由化道路的根本問題，是过渡时期两条道路的斗爭在經濟研究領域中的反映。

在討論中发言者还指出，杨堅白何建章等同志关于平均利潤、生产价格問題的理論，是根本违反党的方針、路綫的，违反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的經濟思想的。在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中，如何正确处理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原則問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在一定的物質条件的基础上充分發揮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亦即如何充分利用非資金因素的作用，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們強調的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必須坚持政治挂帅的原則。但杨堅白、何建章等同志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完全归結于物質技术条件的作用，归結于資金占用量的多少，而排除人的革命的能动作用，排除非資金因素的作用，因此，他們強調的是物的因素，即企图以利潤刺激来代替政治挂帅，以資本主义的方法来調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实际上就是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觀来观察社会主义經濟問題。如果按照他們的观点办事，必然会腐蝕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革命意志，会使社会主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經濟逐步变质。由此可见，这样的理論是极其荒謬的，对于实际工作的危害是十分明显的，必須严肃批判。

二、生产价格是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价格形成的基础？在討論会上，有的同志认为，“生产价格”是資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所特有的經濟范畴。价格的形成只是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才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可能产生“生产价格”的范畴。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生产資料是全民所有的，企业赢利多少并不取决于企业占有的資金量，而且不存在部門間的自由竞争和平均利潤的趋向，因而也就不存在等量資金取得等量利潤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的价格是計劃价格，是根据国家的价格政策和社会的需要，参考历史上形成的比价和差价，自觉地运用价值規律的作用而制定出来的。如果以生产价格为基础，按生产价格来改造现行的价格体系，那么在理論上就意味着承認物化劳动也能創造价值，在实际工作中就会引起大量商品的大幅度降价和提价，造成价格上的混乱，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发展。因此，生产价格論者的这种观点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三、能否以資金利潤率作为评价和考核企业的綜合性指标問題？发言者认为，生产价格論者把資金利潤率作为评价和考核企业的綜合性指标，是违反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准則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滿足社会的需要。“利潤服从政策”这一原則，正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計劃管理和計劃考核，而不是利潤评价。国家下达給企业的計劃指标是全面的，利潤指标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利潤指标也不可能是不分企业的不同情况而“一視同仁”的。因此，评价企业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标准，只能是根据企业是否全面地、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的計劃来判断，絕不能以資金利潤率来评价，否則不仅不能正确反映企业活动的真正成果，而且会迫使企业盲目追求利潤，破坏国家計劃，使利潤成为自动調节器，代替計劃經濟，其恶果是十分严重的。

除上列三个問題外，与会者还批判了杨堅白等同志把生产价格看成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的論点。

学术研究 1964 年第 1—6 期 总 目 录

(括弧内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页数)

哲 学

- 列宁論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李又华 (1 · 1)
-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 关助夏 (1 · 6)
- 露点的哲学 陈 琳 (1 · 12)
- 比学赶帮的辩证法初探 刘述之 (2 · 1)
- 在比学赶帮运动运用抓两头带中间的领导方法 产克柔 (2 · 10)
-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 华 明 (2 · 19)
- 比学赶帮运动是贯彻执行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法 孙 孺 (3 · 1)
- 再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张江明 (3 · 7)
- 我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高 钻 (3 · 15)
- 学习态度、目的和方法 (学术评论) 路修远 (3 · 19)
- 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一点感想
- 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方法 严克柔 (4—5 · 2)
- 《反对本本主义》学习笔记
-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 习传东 (4—5 · 7)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学习笔记
-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若 文 (4—5 · 12)
- “合二而一”论就是矛盾调和论 林 琇 (4—5 · 22)
-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反对革命的哲学 胡汉平 (4—5 · 29)
-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分歧 张江明 (4—5 · 34)
- “一分为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梁 钊 (4—5 · 40)
- “合二而一”是保护旧事物的“理论” 杜 雷 (4—5 · 42)
- “合二而一”否定通过斗争解决矛盾 馮 瑜 (4—5 · 43)
-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合二而一”的吗? 群 策 (4—5 · 45)
-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不能调和 刘露德 (4—5 · 46)
- 反辩证法的矛盾分类法 叶汝贤 陈长畅 (4—5 · 47)
- 这是什么样的“全面性”? 施蔭民 (4—5 · 49)
- 什么是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目的? 房 松 馮海燕 (4—5 · 50)
- 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吗? 李锦全 (4—5 · 51)
- 略论伦理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 夏书章 (4—5 · 58)
- 批判宗教与科学结合论 熊茂生 周方全 (4—5 · 62)
-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创立时期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关助夏 (4—5 · 67)
- “综合经济基础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孙 孺 (6 · 1)

評楊獻珍同志所謂“兩種範疇的同一性”的觀點	嚴克柔 (6 · 10)
就紅專關係駁“合二而一”論	王致遠 (6 · 18)
“合二而一”論是為反動階級服務的哲學	劉 嶸 齊 云 (6 · 26)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根本道路	李又華 (6 · 31)
——讀《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筆記	
《指物論》譯釋與批判	林振環 (6 · 106)

自然辯證法

從達爾文進化學說談生物發展的根本矛盾問題	杜 雷 (1 · 20)
關於生物發展的內部矛盾問題	王 元 麥煥南 (1 · 29)
關於有機界發展的动力問題	庄 豪 許錫揮 (1 · 35)
對基因論的唯物主義成分的一些分析	吳世宣 (1 · 31)

經 濟 學

農業現代化的體系問題初探	李小櫻 (1 · 39)
略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與需要的統一性和矛盾性	周成啟 (1 · 44)
農產量抽樣調查方法的幾個問題	陳應中 (2 · 53)
關於《資本論》方法問題的商榷	卓 炯 (2 · 63)
關於農產量抽樣調查方法的商榷	祖延安 慶 華 (3 · 23)
關於糧食產量抽樣調查方法問題的探討	許 隆 (3 · 31)
在農業生產中發揚自力更生精神	孫凌云 (3 · 37)
改造山坑低產田的主要措施及其經濟效果	鄭國基 (3 · 103)

(廣東省清遠縣南沖公社白芒大隊的調查)

農村人民公社的“勞動日”初探	何國文 (4—5 · 91)
試論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穗經農 (4—5 · 101)
農牧結合經濟效果的評價問題	侯曉昌 (4—5 · 108)
農業剩餘勞動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嗎?	張志錚 (4—5 · 115)

——與汪旭莊同志商榷

利潤率不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	黃標熊 (4—5 · 123)
生產價格與社會主義經濟不相容	何宇同 高天放 (6 · 44)

——與楊堅白、何建章等同志商榷

論穩產高產農田建設問題	廖建祥 (6 · 52)
略論第二種涵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起源及其在 馬克思價值理論體系中的地位	蕭步才 (6 · 61)

歷 史 學

論錢江	陳勝彝 (1 · 69)
評劉節的“天人合一”史觀	陳 華 李錦全 (1 · 79)
中國農民不是以封建思想來反抗封建統治的	李蔭農 (2 · 72)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是階級矛盾的產物	楊榮國 (3 · 40)
略論農民起義的政權問題	關履權 (3 · 51)

美帝国主义对广东教育事业侵略簡史	黃廷柱 (3 · 56)
刘节先生人性論的实质	黎 滨 (4—5·125)
用什么观点研究农民起义的政权性質問題	蔣祖緣 (4—5·130)

——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容闳不是近代中国資产階級改良主义者嗎?	張其光 (4—5·139)
---------------------------	---------------

——兼論改良派与洋务派的性質及其关系

刘节先生的历史研究是为誰服务的?	杜式文 (6 · 68)
------------------------	--------------

历史的眞实还是历史的歪曲?	張其光 (6 · 78)
---------------------	--------------

——評刘节先生的所謂“眞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及精义”

历史唯心主义的又一次破产	史集思 (6 · 83)
--------------------	--------------

——試論罗尔綱等同志研究和評價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

考 古 学

宋代吉金书籍述評(續)	容 庚 (1 · 85)
-------------------	--------------

广州汉墓群西汉前期陶器文学汇考	陈 直 (2 · 79)
-----------------------	--------------

文 学 研 究

評周谷城先生的“无差別境界”說	陆一帆 吳文輝 (1 · 53)
-----------------------	------------------

刘熙載的詞品說	丘世友 (1 · 61)
---------------	--------------

不推陈就不能出新	吳劍青 (2 · 37)
----------------	--------------

推什么陈, 出什么新?	何爵三 (2 · 38)
-------------------	--------------

现代文学教学也要推陈出新	廖子东 (2 · 39)
--------------------	--------------

从文学教学三个方面出新	管 林 (2 · 40)
-------------------	--------------

推陈出新是文学教学的革命化	曾敏之 (2 · 40)
---------------------	--------------

出社会主义的文学史体系之新	吳文輝 (2 · 41)
---------------------	--------------

推陈出新方針对文学教学有直接指导意义	黃展人 (2 · 42)
--------------------------	--------------

跳出老圈子, 打破旧框框	陈則光 (2 · 44)
--------------------	--------------

古典文学教学怎样推陈出新?	傅思均 (2 · 45)
---------------------	--------------

清除思想障碍, 才能推陈出新	芦 荻 (2 · 46)
----------------------	--------------

文学教师必須懂得社会主义之新	王 超 (2 · 48)
----------------------	--------------

在古典文学教学中不可能出社会主义之新	黃海章 (2 · 50)
--------------------------	--------------

推陈出新的精神必須在文学教学中体现出来	吳宏聰 (2 · 51)
---------------------------	--------------

評周谷城的“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論	毛 軍 (3 · 68)
-------------------------	--------------

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	王季思 (3 · 73)
--------------------	--------------

美化小資产階級思想感情的作品	饒芃子 吳世枫 (4—5· 77)
----------------------	-------------------

——略評《三家巷》、《苦斗》的創作傾向

略論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	叶 秀 (4—5· 83)
-------------------	---------------

——重讀《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筆記

資产階級美学观点的艺术标本	蕭 殷 藍 宜 (6 · 96)
---------------------	------------------

——《北国江南》的思想实质和美学理想解剖

語 言 学

- 談現代漢語的受動詞 何 融 (1 · 103)
廣州話无介音說 黃家敦 (2 · 92)
潮州方言詞考源 李新魁 (3 · 91)
關於中國語言學史上一些方法論問題的探討 方孝岳 (4—5·149)

民 族 学

- 黎族合亩制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研究 王穗琼 (2 · 82)

教 育 学

- 學生階級教育在德育中的地位 and 內容 何 辛 (1 · 48)
半工 (农) 半讀应当成為我國一種根本的教育制度 劉美藩 (6 · 37)

短 論 与 隨 筆

- 科學家和社会主义戰士 丘谷間 (3 · 64)
——學習馬克思治學的革命精神
一定要在基本功上過得硬 鍾 夏 (3 · 66)
從趙括的故事想起的 何家言 (4—5· 87)
再談一定要在基本功上過得硬 鍾 夏 (4—5· 88)

其 他

- 關於唐寫本《經典釋文》殘卷的音切問題答問 (1 · 112)
關於“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問題的討論綜述 (4—5· 54)

附：《学术动态》目录

(括弧內前一數字是期數，後一數字是頁數)

- | | |
|-------------------------------------|--|
| 中山大學討論歷史觀和方法論問題 (1·19) | 廣東省經濟學界探討農產量抽樣調查的理論問題 (3·55) |
| 廣東經濟學會舉行關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問題學術座談 (1·47) | 討論祖國醫學陰陽學說的哲學問題的一些論點 (3·63) |
| 廣東經濟學會一年來舉辦十多次關於現實經濟問題的報告會 (1·78) | 文學教學工作者座談重新學習毛主席文藝思想問題 (3·102) |
| 《人民日報》開展關於“桌子的哲學”的討論 (2·9) | 廣東經濟學界討論社會主義再生產的理論問題 (3·110) |
| 廣東哲學界和經濟學界開展對比學趕幫運動的研究活動 (2·18) | 經濟學工作者到新會縣環城公社調查訪問 (4—5·6) |
| 廣東教育科學工作者年來積極開展教育調查研究工作 (2·36) | 圖書館學工作者到新會縣調查農村圖書室工作 (4—5·61) |
| 廣東自然辯證法研究組舉行首屆年會 (2·52) | 《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展開關於《三家巷》、《苦斗》是好作品還是壞作品的討論 (4—5·封三) |
| 廣東教育學界部分會員參觀新會縣棠下中學 (2·101) | 廣東史學界討論關於評價李秀成的方法論問題 (6·67) |
| 廣東史學界討論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問題 (2·102) | 廣東經濟學界就生產價格論問題舉行討論會 (6·114) |
| 廣東教育學會舉行第三屆年會 (3·6) | |

学术研究

一九六四年第六期（总第十八期）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訂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0.50元
本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